

马恩原著导读

——欧洲革命四部曲

2024 年重排版

群众出版社

说 明

本书是《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4 本书的导读合集。

目 录

说 明.....	i
目 录.....	1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读.....	1
01-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总的说明.....	1
02- 《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导读（一）.....	5
03- 《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导读（二）.....	18
04- 《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导读（三）.....	35
05- 《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导读（四）.....	47
06-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一）.....	54
07-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二）.....	60
08-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三）.....	67
09-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四）.....	75
10-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五）.....	82
11-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六）.....	88
12- 《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七）.....	105
13-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一）.....	115
14-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二）.....	127
15-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三）.....	132
16-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四）.....	139
17-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五）.....	163
18-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导读（一）.....	168
19-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导读（二）.....	174
21-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导读（三）.....	18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导读.....	191
0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说明.....	191
0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1869 年第二版序言”.....	195
0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1885 年第三版序言”.....	200
0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上）.....	203
0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中）.....	210
0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下）.....	215
0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上）.....	233
0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中）.....	238

0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 (下)	250
1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 (上)	257
1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 (中)	264
1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 (下)	271
1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 (上)	284
1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 (中)	290
1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 (下)	298
1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五 (上)	304
1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五 (中)	315
1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五 (下)	321
1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六 (上)	333
2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六 (中)	344
2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六 (下)	357
2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七 (上)	364
2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七 (中)	374
2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七 (下)	387
《法兰西内战》导读	393
01-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笔记	393
02- 《法兰西内战》1891 年德文版导言导读 (一)	397
03- 《法兰西内战》1891 年德文版导言导读 (二)	410
04- 《法兰西内战》第一部分导读 (一): 卖国政府	417
05- 《法兰西内战》第一部分导读 (二): 梯也尔	424
06- 《法兰西内战》第一部分导读 (三): 议会与巴黎	430
07- 《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导读 (一)	435
08- 《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导读 (二)	439
09- 《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导读 (三)	444
10- 《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 (一): 新的国体和政体	448
11- 《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 (二): 公社的政体	454
12- 《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 (三) 对公社的评价	458
13- 《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 (四): 公社的价值观	466
14- 《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 (五) 两个巴黎的对比	473
15- 《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 (一): 缓兵之计	479
16- 《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 (二): 原型毕露	485
17- 《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 (三): 对公社的诽谤	492
18- 《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 (四): 国际主义	498
19- 《法兰西内战》附录说明	503
20- 《法兰西内战》初稿 (摘录) 之“公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导读.....	508
21-《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公社的性质”.....	514
22-《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农民”.....	528
23-《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各阶层、公社和共和国”.....	534
24-《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公社（社会措施）”.....	541
25-《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548
26-《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孔德派的观点”.....	554
27-《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社”.....	558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导读.....	568
01-《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简介.....	568
02-《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571
0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普鲁士邦”.....	584
04-《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三“德国其他各邦”.....	597
05-《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四“奥地利”.....	604
06-《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五“维也纳起义”.....	613
07-《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六“柏林起义”.....	618
08-《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625
09-《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632
10-《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九“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638
11-《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644
12-《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一“维也纳起义”.....	650
1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658
14-《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三“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669
15-《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676
16-《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685
17-《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692
18-《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七“起义”.....	698
19-《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八“小资产阶级”.....	704
20-《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九“起义的终结”.....	711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读

01-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总的 说明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法国 1848 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大事件，剖析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由此出发分析了 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历程，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论述了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六月起义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了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战斗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以此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

然的过渡阶段”。因此，本著作代表了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开始提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形成。

这部著作是由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写的一组文章组成的，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马克思原计划写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该杂志第1、2、3期上只发表了三篇文章，题目为：《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这三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总标题为：《1848年至1849年》。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他们合写的时评中作了阐述。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了导言，题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篇导言见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我将放在后面进行导读）。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这篇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深刻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思想。在编校过程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

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3—596、602—613页）。恩格斯还给这一章加了标题：《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他在1895年2月13日给理·费舍的信中说，这样“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85页）。在单行本中，前三章的标题改为：《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前三章仍沿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采用了1895年版的标题。本导读将采用1895年单行本的标题。

先看一下马克思原计划撰写的四篇文章前的总论部分：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

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证明这一点就是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并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会失败，因为二月革命的性质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这场革命使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显现出来了；

第三，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

02-《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导读

(一)

《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后面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样，只要有足够耐心就不会感到难读。有些读者之所以感到难读，原因一是人物和事件众多，比较难记、更难贯通。二是涉及一些历史背景，读者可能不太熟悉。只要这两方面注意了，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为了便于掌握，建议大家读两遍，第一遍读时做一些标记，读第二遍时把人物和事件串起来。至于历史背景，留意一下《文集》的脚注和尾注（最后面的“注释”）部分，通常都能够把握。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篇（原标题是《1848 年的六月失败》）第一部分。为了能够把 1848 到 1850 这段时间串起来，1895 年单行本用的标题是《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我们采用这个标题，以便跟后面的各篇在时间上连起来。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二月革命前的七月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结构：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银行家“从今以后，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

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 1832 年、1834 年和 1839 年各次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后，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鲁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喉舌，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代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

需要注意：

第一，“七月革命”指 1830 年 7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面的“七月王朝”是指这次革命之后直到 1848 年二月革命前统治法国的王朝。

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旧的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第二，七月王朝是一个资产阶级君主制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不存在普选权。其统治阶层是金融贵族，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是其官方反对派，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知识分子则要么属于官方反对派，要么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没有选举权。

有些人既不读经典，又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却冒充马克思主义专家。我谈到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其实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政体上有多种形式，例如本篇谈到的资产阶级君主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两种典型形式。但无论哪个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民主到资本主义大众民主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形式曾经做过专门研究。在本篇中，我们将看到，“普选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普选权并非一直存在，而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巩固下来。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到资本主义大众民主阶段的标志。不仅

如此。资本主义大众民主的确立，既给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机遇，也给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挑战。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这是一个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区分开来的重要问题。试图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这种学术研究的做法，对马克思的相关著作表现出缺乏应有的敬意。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二月革命的原因，即七月王朝的政策导致的财政困难和世界经济环境对法国的影响：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没有达到预算平衡，没有达到国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开支，即不损害那些恰好构成现存统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调整捐税的分担，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达到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国

债券的大众，而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是了解交易所活动的秘密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机密，有可能制造国债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会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符合掌握统治权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利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在发行国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国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份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份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相反，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施加影响而遭到失败。**邮政改革**就是一例。路特希

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能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与此同时，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景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掌握统治权的

集团高叫“腐败！”“打倒大盗！”人民大声疾呼：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等《路特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的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做任何事情！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国债券跌价！这就是交易所犹太人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方面的时候，法国人的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虚张声势的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则像电击一样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

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使得到处民怨沸腾。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冲突。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

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关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与过剩经济时代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同，在短缺经济时代，预算平衡、收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金融贵族的利益却希望不平衡以便能够从中渔利，因此七月王朝试图使债务扩大化，为金融贵族的炒作提供条件。这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由于统治权只在它的选民中间分配，话语权也只属于金融贵族，使得矛盾不断累积，缺乏宣泄和平衡机制。

第二，由于统治者所得极为轻易，因此与普通群众省吃俭用不同，他们形成了挥霍浪费的习惯，其道德状况与新教伦理的要求截然相反。统治者表现为穿上华服的社会渣滓，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所以不仅是人们群众痛恨的对象，而且是轻蔑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极适合被打倒。人民无法照

旧生活下去，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为二月革命提供了内因。

第三，二月革命除了内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外因：

一是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粮食危机是指“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当时老百姓的生活降低只能吃马铃薯的水平，这次天灾让他们连马铃薯都吃不上了，只能饿死，这必然导致民怨沸腾。通货膨胀指“1847年的物价腾贵”，它使危机由普通百姓阶层向整个社会蔓延。

二是英国的工商业危机。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使得无法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的竞争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由此把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业资产阶级推向了革命者一边。

再次，关于二月革命的过程：

【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而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

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被解除了武装，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不过，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诞生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从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他认为，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篡夺权力而玷污自己的胜利。

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 2 月 25 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像 1830 年 7 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强迫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 20 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两小时的期限未滿，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二月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选举改革阶段，资产阶级通过宴会运动等形式，试图分享权力，结果遭到镇压；二是街垒战阶段，人民解除了军队武装，从而建立了临时政府；三是共和国阶段，资产阶级试图垄断临时政府的权力，遭到工人反抗，工人阶级代表人民群众逼迫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实行普选权。

第二，关于运动的细节，特别是宴会运动，《文集》有注释：**宴会运动**指 1847 年 7 月—1848 年 1 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 1847 年 7 月 9 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从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 1847 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 70 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 17 000 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 1848 年 2 月 22 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的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 1848 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

第三，为了能够保持《1848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视野，以免读到后面章节时忘记前面的这些内容，关于组成临时政府的各个派别需要读者能够记住，它们分别是：《国民报》方面的代表人物、王朝反对派和工人代表。

其中，第一，《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国民报》派的领导人进入了临时政府（1848 年 2 月 24 日—5 月 4 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 月 5 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第二，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该派也被称做议会反对派。第三，除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派别外，临时政府中还有两个工人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但他们没有掌握任何实权。

临时政府中的权力分配对于无产阶级显然是极为不利的。那么整个共和国情况又如何呢？下一次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

03-《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导读

(二)

现在我们看一下二月革命以后建立的共和国是如何逐渐暴露自己的资产阶级本质的。我们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普选权并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只能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所谓“民主”，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换言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形式同样可以采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君主制和僭主制到贵族制和寡头制，再到共和制和民粹政治的过程。而这一点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二月革命建立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这使资产阶级统治采取了普遍性的形式、大众民主的形式，从而表现出折衷和含混的特征：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

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从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怪乎《法兰西报》同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过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过赞同革命。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什迫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几天以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向市政厅进发，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

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做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在寻找点金石，市政厅里却在铸造着通用的钱币。

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

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的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宫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旁边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旁边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研究了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其中不仅谈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而且谈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本篇集中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如何逐步获得政治统治。

第一，七月王朝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统治，二月革命本来按照顺序应当是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一致起来。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逼迫，临时政府不得不宣布成立共和国，从而使“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

第二，由于无产阶级不是仅仅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跑，而是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要求，不是致力于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企图建立一个全民国家，因此它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认为，共和国可以视为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取到的一个斗争基地，

因为它在为所有阶级争得选举权的同时，也为自己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准备了条件。

第三，由于这样的原因，它便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要想获得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另一方面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

第四，但在当时，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对自己解放的客观条件缺乏认识。例如，对七月王朝和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无产阶级就缺乏明确的认识，马克思则指出：“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不理解这一点，从而误解自己斗争的目标。

第五，马克思分析了这些目标中的两个方面：“组织劳动”和“成立专门的劳动部”。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到，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有其特殊的组织劳动的方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决定的。不消灭这种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消灭这种劳动组织方式。

这段话中涉及一个派别，即正统派，《文集》后面的注释：**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

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其次，马克思研究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说明一方面条件不具备，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由于不具备条件，无产阶级无法形成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形成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

【一个一旦奋起反抗便集中体现社会的革命利益的阶级，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资料，这种生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工业更发达，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革命。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

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禁止性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一等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之中。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一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惨重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宫委员会总算还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 19 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

《通报》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的假寐中惊醒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 2 月 24 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

从临时政府这方面来说，它既然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那就要尽力使这个共和国能为资产阶级和外省所接受。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来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在报刊上可以自

由发表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掌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来说，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建立丰功伟绩的途径不在于去恐吓别人，而在于自己总是诚惶诚恐，依靠自己的柔顺和不对抗的生存方式来谋求生存并消除对抗。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政权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它的座右铭。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于是，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做是自己创造的，自然赞同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措施。它心甘情愿地接受科西迪耶尔的委派，去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的财产，就像它让路易·勃朗去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一样。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反映（成熟的无产阶级能够“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而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马克思分析了法国无产阶级不成熟的表现和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法国还是一个小农的国度，连资产阶级的统治都还没有确立，与之相应，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范围也只是限于像巴黎这样的个别城市。“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按，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面临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 1832 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 18 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所用的蓝白红三色旗，这种旗帜直到 1848 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绦。这确切地表明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无产阶级必须能够团结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二，尽管巴黎工人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当作自己的要求，为此逼迫资产阶级成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但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统战意识，无产阶级被“博爱”的口号所蒙蔽，于

是整个巴黎陷入了一种折衷主义的氛围。再加上法国二月革命涉及其他国家，形成了对法国有利的外部环境，所以缺乏激发起坚决斗争的对抗性刺激。显然，这种过渡性的混沌未分的状况是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的。

再次，马克思研究了资产阶级是如何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为清除工人阶级的影响准备条件的：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解决这一任务的。

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公共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犹太人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反对的首先是金融贵族。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可见，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流通已经不畅，生产已经停滞。革命危机加剧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受到侵犯并且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奴役的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宫的斯芬克斯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又该产生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

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制度。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必须设法保证这个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再度上升。

为了使人不致怀疑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偿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虚张声势的手段。法定偿付期限未到，临时政府就向国债债权人付清了五厘、四厘五和四厘息国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骄矜自负的态度就立刻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拮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费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拮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者、仆役和工人就不得不掏出钱来，为政府赠给国债债权人的这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 100 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今后不得提取现款。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兑现的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持有的已经不是储蓄银行

的存折而是国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的宰割，而他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人才进行二月革命的。

银行是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高教会。正像交易所操纵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银行的生存；银行一开始就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以图使共和国丧失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然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贮藏在银行地下室里的钱提出来。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赶到银行出纳处去挤兑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可以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破产，它只要冷眼旁观，让银行听天由命就行了。银行破产就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转瞬间把金融贵族，这个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银行一旦破产，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自身就只得把这看做是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络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

签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恳求大家为爱国主义作出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开征新税。然而向谁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债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征税吗？这不是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同情的办法。一方面，这样做意味着危害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力图用很大的牺牲和屈辱去换取这种信用。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谁来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出牺牲呢？是笨伯雅克，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非法攫取的 10 亿巨款占有者的身上。而实际上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反革命由此就得到了他们的主要物质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

1789 年的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 1848 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给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用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离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描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犹太人、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

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份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账，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新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意味着不断反对恢复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清除出去。】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共和国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

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因此它必然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一，它的财政政策暴露了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社会上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服务的。它不是把矛头对准二月革命的敌人，即资产阶级中原来独占统治权的那一个阶层——金融贵族，相反，它的财政政策是有利于金融资产阶级的，为此，它不仅要牺牲工人阶级利益，而且牺牲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政府决定增加税收，但它的税收政策仍然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只不过，这回遭到牺牲的是农民。农民被强加了每法郎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

第三，马克思总结说：“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份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账，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资产阶级认识到真正对它构成威胁的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它必然反对以上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要求宣告资产阶级信用制度的破产。

因此，这回轮到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进攻的对象了。

(三)

现在我们来看法国六月革命的全过程。

首先是资产阶级积蓄力量的过程：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而且，国民自卫军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也不得不逐渐地、部分地开放自己的队伍，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进来。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组织了 24 营别动队，每营 1000 人，由 15 岁到 20 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 72 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给他们 1 法郎 50 生丁，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

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作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人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迷住了他们。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他们自己当中招募的年轻力壮、好勇斗狠的 24000 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向列队通过巴黎街头的别动队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马利部长把 10 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场。在这个响亮的名称之下不过是以 23 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从事枯燥、单调和非生产性的掘土工作罢了。国家工场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临时政府以为这样就组建了第二支反对工人本身的无产者大军。这一次资产阶级把国家工场看错了，正如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不过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场——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场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场同卢森堡宫的设想完全相反，但因为名称相同，就往往给人提供机会，去别有用心地制造误会，就像描写仆人的西班牙喜剧所制造的那种误会一样。

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因为国家工场的预言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了。在巴黎资产阶级半天真半故意地混淆这两种东西的过程中，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操纵的舆论中，这些习艺所竟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于是，社会主义就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这些国家工场上。同时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场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把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场当做发泄自己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计算着这班无产阶级懒汉耗费的钱财，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装装样子的工作竟可以获得国家年金，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嘟囔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场，就在于卢森堡宫的浮夸之词，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阴谋诡计的，莫过于这些濒临破产而又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个大陆高

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时而从意大利，时而从德国，时而从最遥远的欧洲东南部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不断地给人民带来胜利的证据，使人民普遍地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之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胜利。】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无产阶级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当他们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资产阶级已经在积蓄力量了。资产阶级做了三件事：

第一，成立别动队作为镇压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件事资产阶级不仅成功了，而且是超级成功，因为别动队由流氓无产者组成，而无产阶级误认流氓无产者为自己的同路人了。

第二，成立国家工场，准备作为镇压无产阶级的另外一支队伍，这件事失败了，因为国家工场的工人同流氓无产者不同，其生活方式使他们本能地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

第三，通过国家工场嫁祸工人领袖，硬把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增加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负担说成是为了救济国家工场的工人，实行挑拨离间。这件事也成功了。

其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初次交锋的过程，即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

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让临时政府回到革命轨道上来，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清除出去，并且迫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在“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呐喊声中涌向市政厅。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不得不抗击资产阶级，以维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屈服于自己，反而加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临时政府内外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许多工人聚集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以便筹备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事宜。突然有一个谣言迅速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工人们^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武装集合，打算从那里向市政厅进发，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全体紧急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竞相表白，说首先发出警报的殊荣归于自己——，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待发，市政厅的所有入口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的口号响彻巴黎全城，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

府表示效忠，所有的人都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惊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在周密筹划的虚假战斗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这出拙劣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示威游行的借口。】

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斗争做准备的过程中，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都巩固了临时政府的统治，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第一，无产阶级本来应当推翻临时政府，但由于临时政府中的中派（小资产阶级派）遭到攻击，无产阶级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保护中派上去，而为了保护中派，在三月十七日连临时政府一起保护下来了。

第二，四月十六日有人把工人阶级的无害集会误会成或故意说成是工人要向临时政府进攻，借机把军队召回巴黎，并作为在全国各地举行反动示威的借口。

再次，5月4日以后，资产阶级在为立宪召开的国民议会中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正式被迫展开反击，结果失败了：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开会了。普选权并不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的那种人民崇拜。

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资产者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不是共和主义庸人所想象的那种法力无边的魔杖，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迅速地产生幻想又迅速地陷入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有选举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本身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只有借共和国的名义，才能发动斗争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对它实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重新加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

一切共和派的和反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不产阶级的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立即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

然而还不止这些。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他们在斗争中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就注定要失败。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同王权进行

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手中的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加速了决战的到来：它在5月15日涌入了国民议会，徒然地试图恢复自己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79 *Il faut en finir!* 这种局面必须结束！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决心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直接向工人发出挑衅，辱骂和嘲弄工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攻击对象，还是国家工场。制宪议会命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场，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既定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阻挠工人进入国家工场，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赶到索洛涅，说是让他们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谓掘土工作，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来掩饰驱逐工人这一行动的花言巧语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把一切未婚工人强制逐出国家工场，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

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

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五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5月4日召开的国民议会是制宪议会。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选出“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代表他们，这使得整个议会成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其中共和派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占据绝对优势，而资产阶级的其他派别，如前面的导读中提到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等，则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假面具出场。于是，这个名义上的全民性的“共和国”就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把无产阶级视为自己的敌人。

第二，马克思区分了二月革命宣布的共和国同5月4日以后的共和国区别开来：二月共和国形式上是全民的共和国，因此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同其他各阶级的利益一起强加给资产阶级；而五月的共和国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马克思认为，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还披着全民共和国的外

衣；尽管实质上它已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但形式上却并非如此：“二月共和国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第三，通过前面的导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法国已经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团结（或者不如说是“勾结”）起来，准备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进攻，而立宪国民议会则成为整个法国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的机构。“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不仅立即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而且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这就是说，要把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上面的社会机构彻底革除掉，要把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成果完全废除掉。

第四，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做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需要来一场反对无产阶级的战斗，由此决定了，

资产阶级必然会强加给无产阶级一场彻底的失败。马克思介绍了无产阶级的这个六月失败的过程：先是，无产阶级5月15日涌入国民议会，试图恢复自己的革命威望，结果使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被捕。资产阶级不仅借机限制无产阶级的权利，通过挑衅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以便进一步镇压无产阶级；而且试图破坏和解散象征着劳动权利的国家工场：“执行委员会开始阻挠工人进入国家工场，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赶到索洛涅，说是让他们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谓掘土工作，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来掩饰驱逐工人这一行动的花言巧语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把一切未婚工人强制逐出国家工场，或者编入军队。”于是，无产阶级被迫在6月22日举行起义。起义坚持了五天，最后被镇压下去。马克思对这次起义的评价是：“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随着起义的失败，“共和国”的面纱被撕破了，赤裸裸地露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本来面目。“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

(四)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法国六月革命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指出，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没有意识到六月革命的本质，尤其是它与二月革命的区别，只有共产党人才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引用了他在《新莱茵报》中对六月革命的评论：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了几星期，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简直被冲散他们共和国幻觉的硝烟熏得头昏眼花。

请读者允许我们用《新莱茵报》中的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的消息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正式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 2 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 6 月 25 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

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

拘守 1793 年旧的革命传统的人，社会主义的空论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实行整套旧的、不过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呐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亚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 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

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马克思指出：

第一，二月革命的所谓博爱，就是六月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内战；它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现。“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过了这段时间，所谓的博爱就被烧毁了。

第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本身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派（参见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中对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所加的注释），他们被法国大革命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所愚弄，而无产阶级的那些同盟派别实际上是自己的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法国无产阶级没有搞清楚这一首要问题，这就决定了六月革命的必然失败。第三，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要的都是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所谓“秩序”，而六月革命却侵犯了这个秩序，因此在整个旧欧洲看来，“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其次，马克思阐述了六月革命的意义：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

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认为，六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无产阶级认识到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因为无产阶级要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是不可能的。

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并不是由于像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攻击的那样，说什么是马克思病态心理的表现。相反，这是历史本身给出的真理，只不过马克思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真理而已。

再次，马克思研究了六月革命的后果：

【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

——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恐怖。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现在则认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而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

刻超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法国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上了资产阶级的当，本来应当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却在六月革命中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无产阶级的失败将使它们成为牺牲品和资产阶级的下一个猎物。在以后的斗争中，它们将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既然资产阶级与自己的敌人即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它的胜利自然也是它的敌人的胜利。无产阶级本来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的同盟军，现在这个同盟军被镇压下去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必然由此受到削弱。

第三，由此会使各国的封建王权认识到，它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镇压各弱小民族的反抗斗争，不必担心法国资产阶级会联合其他阶级起来反对。第四，法国下一次无产阶级起义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要反对封建王权。它必须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中寻找同盟军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以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从这里可以看出，其

实本文也是对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战略策略的重大发展。

06-《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

(一)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二篇评论的是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事件，因此无论是人物还是派别都同前一篇相联。在导读时将不再重复说明。不了解的读者可以参看文集的注释。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法国 1848 年六月革命以后形成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阶级结构情况。

马克思首先指出，推翻一种国家形式或特定的政体，同推翻一个社会 and 它所要求的特定的国体，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1848 年 2 月 25 日法国被迫实行共和制，6 月 25 日革命被强加给法国。在 6 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 2 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请注意：二月革命前，法国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二月革命建立了共和制。无论是资产阶级君主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制，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六月革命则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六月革命不再是一种政体变革，而是一种国体变革。

其次，六月革命后，政权赤裸裸地暴露出其资产阶级的属性：

【六月斗争是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斗争胜利了，政权当然归他们。戒严使手足被缚的巴黎毫无抵抗地倒在他们脚下，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精神上的戒严气氛，获胜的资产者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农民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财产的狂热情绪。因此，在下层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在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出版界是《改革报》。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一派赖以成为一股力量的背景，因为小资产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自己已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堕落成了三色旗派的仆从，他们不可能迫使三色旗派作出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派的统治以及整个共和国看来受到反对共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开始就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自己只有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法国一度把卡芬雅克当成自己的

救星来欢迎，而当反共和派在六月事变后不久重新取得独立地位时，军事专政和巴黎戒严只容许这一派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需要注意：

第一，无产阶级被镇压以后，由于农民“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财产的狂热情绪”，因此整个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随着工人阶级被镇压，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共和派即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

第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虽然还存在，但只能畏畏缩缩地跟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屁股后面。

再次，马克思反驳了一种误解，即六月革命后的政权是保皇派政权：

【自 1830 年起，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他们的著作家、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专门人才、他们的野心家、他们的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报纸即《国民报》的周围。

《国民报》在外省，设有自己的分社。《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官职——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同时，他又以司礼官的身份在自己的沙龙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国的宾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丧失殆尽，制宪议会就越是坚决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了。】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分析了六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权的组成，指出要职都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占据。

第二，法国著作家误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相反。

第三，马克思认为造成误会的原因在于保皇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都属于资产阶级，只不过它们分属于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因此，资产阶级政体的内容和形式会有不同的表现。保皇派不过是腐烂了的共和派。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历史剧的时候，在后台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做罪犯来审判，而是当做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和五月十五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各派和民主主义各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情况。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派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复仇了。这个人是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自由主义的化身，妄自尊大的小人，浅薄无能的庸才，他不仅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同那些使他丢掉内阁首相职位的革命家算账。这保证他决不会手软。于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完整的案件，这个案件可以概括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杀，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深奥的刑事调查工作延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对《辩论日报》此作了回答：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就是创建罗马。国家的起源湮没在神话之中，而对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

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清洗自身的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被废除；负债者监禁制度重新施行；占法国人口大部分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为什么干脆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报刊交纳保证金的制度重新施行，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资产阶级“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做罪犯来审判，而是当做敌人来消灭”，这确切地表明了这个形式上是全民共和国的政权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

第二，资产阶级政府找了一个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来控诉六月起义者，表明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在面对无产阶级时充分认识到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尤其是，调查委员会仅仅把工人的“罪行”追溯到3月17日，而不去追溯二月二十四日，是由于二月二十四日是从资产阶级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政权必须把自己的起源掩盖起来，以便抹煞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中的革命作用。

第三，六月资产阶级政权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人民的。

问题是这样一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也会受到侵害。

07-《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

(二)

现在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在上一篇评论（《从 1848 年 2 月到 1848 年 6 月》）的末尾所做的分析开始一一应验：六月革命失败，无产阶级被镇压，随后就轮到小资产阶级，至于其他阶级，也先后受到损害，只有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利益得到保障；在对外关系上，资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向旧势力妥协，从而使法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损害。

首先看一下小资产阶级是如何受到损害的。马克思指出：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急忙给旧日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日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种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者——开咖啡店的、开餐馆的、开酒店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主们奋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而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小店主们在胜利的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时候，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这位代理人拿着威胁性的通知单迎接他

们：票据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为了对付他们，人们才需要去拯救这种财产，这样做为的是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的是那些为他们贴现票据的银行家，为的是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的是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的是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重新变得稳定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干练的神，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子儿女一起逐出了住所，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威风凛凛地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他们从2月起就像慢性病一样拖延下来的、似乎没有人去注意的破产，在6月以后被正式宣告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以财产的名义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现在，既然已经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和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在巴黎，过期的票据总值在2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100万法

郎以上。巴黎有 7 000 多家商店老板，自 2 月以来就没有交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 2 月以来的政治罪责，那么小资产者则要求调查 2 月 24 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聚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威胁地提出要求：任何商人，凡是能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到 2 月 24 日以前生意仍然不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并强制债权人在取得适当利息的条件下撤诉。这个问题曾以“友好协议”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在圣但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者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又板起了面孔。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可见，在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的共和派代表早已把小资产者的民主派代表压了下去，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使资产阶级获得了现实的经济利益，因为小资产者作为债务人被交给资产者这个债权人去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只许在完全成为资本奴隶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 年 8 月 22 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协议，而 1848 年 9 月 19 日，即在戒严期间，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万塞讷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汇兑业者和

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大批破产造成的后果势必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而持续发生作用，因而势必再次破坏资产阶级的交易，同时因六月起义造成的耗费加大了国家的赤字，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因生产停滞、消费紧缩和输入减少而持续下降。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别无他法，只好靠发行新公债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短视让他们去反对自己利益的维护者：工人阶级，“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者”，他们没有认清这里的“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的涵义。他们没有理解，这里的“财产”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点生活资料，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即资本；这里的信用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能使他们生活下去的信用，而是资本获取利润的信用。一旦通过镇压无产阶级确立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秩序”，虾米被吃完了，自然就轮到小鱼了。小资产阶级终于遭到了报应。

第二，小资产阶级自以为通过二月革命而取得统治权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应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于是在立宪国民议会试图从政治上镇压无产阶级的时候，却要求仅清算二月革命前破产的那

部分债务，为此提出了所谓“友好协议”。这种软弱的要求在没有无产阶级支援的情况下注定要落空。于是，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对者。

其次看一下军队和农民是如何成为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反对者的。马克思指出：

【小资产者得到的六月胜利果实是破产和依法清账，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酬劳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社会的这些“年轻的救主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骑士——的沙龙里备受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通过自己的报纸《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阶级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充当调停者，以便伙同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仅仅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 18 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必须被消灭”这句话过日子的；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的。历史的讽刺竟使《国民报》的前外事编辑巴斯蒂德当上了

法国外交部长，让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阶级曾一度相信，有了军事专政，同时就会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现在需要的士兵只是宪兵。卡芬雅克在恪守古希腊罗马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肃面具下隐藏着这样一个真相：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的官位而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也像制宪议会那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刽子手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过高的薪俸使军队感到恼怒。

第二，卡芬雅克对外的软弱让部分军队和农民阶级感到丢脸，尤其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二月革命前和六月革命后的截然相反的表现，更让军队和农民失望。

第三，在卡芬雅克那里，武装力量不是用来对外的，而是用来对内的。这赤裸裸地暴露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本质：它并不是全民国家，而只是资产阶级国家。全民国家的形式只是外表，资产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政才是本质。

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必然体现在立宪国民议会将要制定的宪法中。下一次我们就来看马克思是如何分析这部自相矛盾的宪法的。

(三)

现在我们来查看马克思对制宪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新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所进行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可以预见到法国后来的发展会如何展开这些矛盾。

首先，马克思指出，制宪国民议会制定的新宪法不过是换了个全民政权包装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已：

【制宪国民议会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洛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宪法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它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的事实，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从而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专政的事实。同样，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 5 月 15 日和 6 月 25 日的惊吓后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成了根本法。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原任《国民报》总编辑、现任宪

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才华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像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准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当制宪议会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常规、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来维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宣布延长戒严期。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达到一个停顿点，新形成的阶级关系已经固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各派彼此已经求得一种妥协，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继续斗争而同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之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与此相反，这次的宪法却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新宪法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由资产阶级君主制改为资产阶级共和制，即世袭的君主改为任期四年的总统，其他方面则只是承认事实，如赋予议长以非常权力。问题是这样一来，使新宪法自相矛盾。

第二，新宪法之“新”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用马克思的说法是换了服装或标签，“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

第三，制宪议会并没有认识到由于宪法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总统和议长的矛盾，它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的任何问题。相反，它的共和主义形式是依靠使用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的。第四，通常情况下，立宪都是在由各方妥协所达成的相对稳定时期制定的，而以上特征表明，这次宪法却不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之后的稳定，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其次，马克思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新宪法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实质：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即劳动权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劳动权换成了 droit à l'assistance，即享受社会救济权，而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 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准绳——中删去，把“劳动权”斥为异端。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

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六月革命前的宪法草案规定了劳动权，而新宪法则把它改为“社会救济权”。马克思认为，虽然“劳动权”是一个“笨拙公式”，但它的内容反映的是劳动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制宪议会已经宣布革命无产阶级不受法律保护，革命无产阶级的“公式”必然也被删除。

第二，制宪议会排除了累进税。在马克思看来，同“劳动权”的公式不同，累进税并不是什么激进的口号，而是一种不仅能够行得通，而且能够真正解决资产阶级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有效手段。但资产阶级居然连这种保守的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措施都取消了。这确切地表现了六月以后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属性。

再次，新宪法没有采取保护小资产阶级的措施，在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利益相互的时候，新宪法不是在他们之间寻找妥协，而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了小资产阶级：

【在友好协议问题上，三色旗共和派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税，就把这件个别事

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良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那么，还有哪个阶级留下来做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的共和派来重新巩固经济生活中的旧关系，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则打算利用重新巩固起来的旧社会关系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早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经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安做共和国的部长，而不顾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拼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也没有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却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最狂热地拥护旧国家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把临时政府企图否定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于是，它所罢黜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裁定合法性的终身任职的宗教裁判官身上大量地复活了。】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累进税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且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它只是不利于大资产阶级。但是共和派立法禁止征收累进税，就把一个个别的措施变成了一个原则问题。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拒绝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也拒绝了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要求。他们只是把大资产阶级当作自己的同盟军。

第二，问题是大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六月胜利，它要求回到二月革命之前去。于是共和派不得不妥协，把二月革命前旧王朝的大臣纳入政权。

第三，这表明，资产阶级共和派只愿意与大资产阶级妥协，不愿意与其他任何阶级妥协。为此它甚至把临时政府所反对的法官终身制作为宪法的内容确定下来。

最后，马克思总结分析了新宪法中包含的各种自相矛盾：

【法国报刊多方面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的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一国二主——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等等。

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赋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它认可其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大理会这些矛盾。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只有在充当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急先锋时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

大阴谋。他们认为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别的统治，总统应该由卡芬雅克继续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延续。他们希望能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降低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同时又能充分玩弄这种权力，借以威胁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让他们时时面对六月事变时期的那种两难选择：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当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新宪法的自相矛盾，如总统和议会一国二主并存，就被报刊所指出过。

第二，马克思认为，所有矛盾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新宪法不仅没有解决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反而以普选权的民主形式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的结合为这种矛盾的展开准备了舞台。资产阶级要想保住其阶级统治的实质，就必须废除普选权。（这正是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们会在恩格斯加的最后一篇评论中看到）。

第三，资产阶级共和派短视和无能使他们把这些矛盾放到一边，就像一只只顾盯着食物的老鼠，完全没有看到途中的陷阱和老鼠夹，资产阶级共和派只知道盯着权力，而不顾支撑权力的背后力量。他们开罪了自己所有的支持者，却以为人民群众只能在容忍他们掌握权力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间做选择。他们看不到，普选权将把他们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报应很快就会到来。下一次我们将看到资产阶级共和派让卡芬雅克继续担任总统的愿望是如何落空的。

(四)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路易·波拿巴上台的过程。

首先，新宪法的自相矛盾导致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9 月 4 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在 10 月 23 日结束了。9 月 2 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在颁布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在 12 月 10 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造就的人物一定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 200 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

真是枉费心机！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 100 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 600 万选票，是扫罗—卡芬雅克的六倍。】

前面谈到，在新宪法中存在议会和总统的矛盾。资产阶级共和派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是过于自负，以为能够通过议会控制总统。

第一，制宪工作开始之前（9 月 2 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等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则完成后再解散。制宪工作从 9 月 4 日开始，10 月 23 日

结束，但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还没有完成。制宪议会决定在12月10日就要选举总统。资产阶级共和派自以为能够控制局面，确保卡芬雅克当选。“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可见，他们担心的只是选票分散，无法使最有可能得高票的卡芬雅克当选。在这种情况下，制宪议会就可以直接控制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人得票有可能超越卡芬雅克。

第二，结果完全出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预料，卡芬雅克果然没有得到200万选票，但有人得到了。这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马克思把卡芬雅克比作扫罗，把路易·波拿巴比作大卫，是因为根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路易·波拿巴上台背后的阶级根源：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的野蛮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

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 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高呼：“Plus d’impôts, à bas les riches, à bas la république, vivet l’Empereur!”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取消法国的一个政府而给了它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巴黎。他们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来说，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推翻制宪议会，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宣布六月胜利无效。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一旦这个集团想把暂时性的地位作为宪法认可的地位固定下来，他们就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

端，是向奥尔良派羞答答地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的阶级基础是农民。问题是农民的愚蠢使他们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他们只能从历史记忆中搜寻选择的可能性。唯一曾经给过他们好处的是拿破仑，于是拿破仑就成为唯一寄托着他们幻想的人物。路易·波拿巴作为拿破仑的侄子，被农民们移情到他的身上。这标明农民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然而愚蠢的）主张。

第二，其他阶级为什么不选卡芬雅克，而任由路易·波拿巴上台？这有多种原因，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不同反应：一是无产阶级，如果必须在路易·波拿巴和卡芬雅克之间二选一，他们宁愿选路易·波拿巴，以便推翻自己的敌人；二是小资产阶级，如果必须二选一，他们同样宁可选路易·波

拿巴，因为制宪议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三是**大资产阶级，由于二月革命使他们失去了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共和派在镇压六月起义以后，拒绝恢复到二月革命以前的状态，所以宁愿选一个让他们想起皇权统治的人物，而路易·波拿巴就代表这样的人物；四是军队投票给路易·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想起军队在拿破仑时代的荣光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下的屈辱。

再次，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没有全部投路易·波拿巴的票，其中的先进分子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致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用集中选票的办法剥夺制宪议会的最后决定权。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词，前者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词。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代言人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完全是一种示威；这既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抗议，同时又是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脱离了民主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派，即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山岳党在提名赖德律—洛兰为候选人时倒是一本正经的，这是它在愚弄自己时的一种庄严的习惯。而且，这也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派别

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派别，而且还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即拉斯拜尔和赖德律—洛兰，他们两人在六月起义以前分别代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表明了两个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试图坚持其独立性。

最后，马克思对总统选举结果作了评论：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使用1793年词句摆出蛊惑家姿态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戴着皇冠打着鹰旗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于是，历来对1793年的迷信和历来对拿破仑的迷信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显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现代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角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12月10日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在这一天，农民以不体面的逗趣兴高采烈地打破了对旧革命的经典式模拟。

12月20日，卡芬雅克卸职，制宪议会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撤销自己不经法

庭审讯而判处 15000 个起义者流放的 6 月 27 日的法令，岂不就是否定六月屠杀本身吗？】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路易·波拿巴，都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前辈的拙劣模仿。一旦其结果显露出来，必然会打破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拿破仑的迷信。但这种可能的结果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共和派醒悟过来。相反，制宪议会否决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表明它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来越远。它必将走向进一步的失败。

10-《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

（五）

前面我们谈到，新宪法在议会和总统之间的规定存在自相矛盾。但在路易·波拿巴指定了保皇派内阁后，这种矛盾首先在议会和内阁间爆发。现在先看一下保皇派内阁如何排斥资产阶级共和派，下一次再来看资产阶级共和派如何反击保皇派。

首先，路易·波拿巴选出巴罗担任总理，表明了他并不是立宪议会所期待的那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而是一个潜在的君主：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 12 月 10 日，而是始于 1804 年的元老院法令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内阁不是始于 12 月 20 日，而是始于 2 月 24 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缓和政府的更迭，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的这个选择是资产阶级保皇集团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昔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过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阶梯，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阶梯，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1804 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建立，1848 年 2 月 24 日则是巴罗被任命为路易—菲力浦王朝的首相，所以马克思讲的是：路易·波拿巴自认为是继承了拿破仑第一帝国，而巴罗自以为他本应是路易—菲力浦王朝的首相。而路易·波拿巴之选择巴罗，恰恰是由于资产阶级保皇集团的领袖们的提示。

其次，马克思对巴罗本人、巴罗内阁的组成作了分析：

【奥迪隆·巴罗是那个总是徒然争夺内阁位置而还没有精疲力尽的唯一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否认自己旧日的言论，并且最终成为一堆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被人民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 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持重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瞥，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和人的自负。在他面前的镜子里照出的是基佐，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并经常把他当做小学生看待的基佐；镜子里的形象简直就是基佐本人，然而这个基佐长着奥迪隆的前额，即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的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迈达斯的耳朵。

2 月 24 日的巴罗，只是通过 12 月 20 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会士的法卢

又作为文化部部长跟他这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沆瀣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务部就交给了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法、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都齐全了，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充当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一路维杜尔。】

一般读者只要了解这个内阁的组成（总理巴罗、文化部部长法卢、内务部部长福适）和它的总理的特点（保皇派特征）就行了，不需要了解细节。比如“迈达斯的耳朵”这个典故来自希腊神话，不想了解细节的人只要知道它代表“某人所讳言的丑闻”就行了，想了解细节的人可以查一下这个神话：传说阿波罗和潘比赛音乐，请迈达斯当裁判。阿波罗相当于文化部部长，下辖九个司呢；而潘不过是个民间艺人，只会吹箫。外行的迈达斯判决潘神胜出，结果阿波罗一气之下把他的耳朵拉长了。为了遮盖自己这对难看的驴耳，迈达斯整天戴着帽子。可是这个秘密瞒不过国王的理发师。可怜的理发师知道自己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但这个秘密在胸中宛若百爪挠心，恨不能一吐为快。后来，理发师想了个好办法，他跑到河滩上挖了个洞，对着洞口说了声：“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说完了，轻松了，他将洞口用泥土封好，走了。没想到这个地方后来长出了一丛芦苇，每当有风吹过，芦苇就会重

复：“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迈达斯处死了这个理发师。故事虽短，但是留下三个成语，“迈达斯的裁判”讽喻“外行的裁判”；“迈达斯的驴耳朵”讽喻那些讳言自己丑事的大人物；“迈达斯的理发师”则比喻那些守不住秘密的人。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保皇派是如何向资产阶级共和派进攻的：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官职。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君主制走卒的手中。正统派尚加尔涅一人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员的任免，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全都变样了。只有老掉牙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地没有动。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大地已经创造出来，它的造物主除了逃到天上去，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效法造物主，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它即使已经被夺去了行政权的

一切杠杆，它手中不是还握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权岗位，并从这里出发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国民报》派内阁取代了巴罗内阁，保皇派的人物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制宪议会提供了一个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再合适不过的攻击机会。】

需要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内阁的三个重要职位确定后，资产阶级共和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官职”，所有重要职位都被正统派或保皇派所占据，“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

第二，除了制宪议会外，一切重要职位都被保皇派所占据。这表明二月革命的成果几乎完全丧失。只要制宪议会被解散，法国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倒退到资产阶级君主国的道路就铺平了。

第三，制宪议会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它“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权岗位，并从这里出发去夺回失去的阵地。”为此，它想的只是如何推翻内阁并取而代之，却忽略了它真正的对立面其实是路易·波拿巴。

由此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政体的最终定型是多么困难。如果考虑到直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颁布，资产阶级共和制才最终定型，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变革之艰难也就可以

理解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斗争。而现在所面对的则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11-《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

(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制宪国民议会是如何惨遭内阁蹂躏的。

首先，议会抓住了内阁的一个失误：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刚坐了六天，到第七天，即 12 月 27 日，他的内阁就提议继续保留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盐税和葡萄酒税一起享有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在农民的眼中更是如此。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的盐，变得淡而无味了——农民起义所拥戴的拿破仑就像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派资产阶级阴谋的非常陌生的人物。而巴罗内阁把这种不明智的令人失望的蛮横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方面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从而使 56000 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 6000 万。它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

待内阁辞职。它对自己周围的新世界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实在是太不理解了。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 600 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又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那个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期的长期决斗从此开始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正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马克思指出：农民误以为路易·波拿巴会像他的伯父拿破仑一样，保护他们的利益，可是巴罗内阁却做出了“恢复盐税”这一损害农民利益的决定。这使农民感到非常失望。制宪议会以为只要否决内阁这一提议，就一方面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这一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于是，“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从而使 56000 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 6000 万。”议会没有意识到，它本身已经比总统和内阁更早地失去了民心。人们之所以投波拿巴的票，原因正是由于对议会的失望。所以，议会已经变成了纸老虎，“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后面的三个事件，即“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使议会惨遭内阁蹂躏。

其次，马克思对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分析。这一段很长，但很容易看懂：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表现：矛盾一方是享有主权、不许解散、通过实行普选权而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是总统。按照条文，总统应当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际上，总统不仅同样是通过实行普选权而获得批准，并把分配在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从而百倍分散的全部选票集中于一身，而且，总统还掌握着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悬浮在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讲坛上、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的对立并不是宪制权力中一方同另一方的对立，不是行政权同立法权的对立，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同建立共和国的那些工具的对立，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的对立，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而现在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像一个复辟的君主国，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及其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强行保持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完备的和典型的形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回归到它中间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着尚未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着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选举给一个名字加上它的各种不同的意义的时候，只有当这种选举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12月10日废除了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方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成立共和国，才能用巷战和恐怖统治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方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派大众，唯有他们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才能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个1月份当中蓄积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辞职。但巴罗内阁作为回敬，却建议制宪议会对自己投下最终的不信任票，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交给制宪议会，交给这个早在8月间就已经决定在它颁布一系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内阁中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为恢复遭到破坏的信用”，制宪议会必须解散。的确，制宪议会延长临时状态，而且

使波拿巴跟着巴罗、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波拿巴都重新受到威胁，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巴罗这位奥林波斯山上的神变成了疯狂的罗兰，因为共和派让他等了整整一个“Dezennium”即十个月之久才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眼看又要被夺去，而他连两个星期的福也没有享到。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他所说的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议会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巴罗又以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它没有能力在共和国周围确立那些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同它的资产阶级毅力同时受挫，它对保皇派的敌视态度同它的共和主义狂热一起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无法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指使拉托提出建议的同时，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其中都或多或少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让人们要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波拿巴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主张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式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事后注释。这种鼓动在整个1月份一直持续不断。

制宪议会在同总统的冲突中，不能再说是普遍选举的产物，因为别人正是用普选权来反对它。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就在

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尝试过的那样用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俱乐部。别动队，这些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正如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场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在必须彻底取消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残暴地攻击国家工场一样，波拿巴的内阁在必须彻底取消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遣散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从民主制的组织被改成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境地，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又怎样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聚集起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制性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改造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各派。已经发生的就

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革命运动的结晶又重新融解了；这些派别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又成了性质模糊的二月共和国，而对于二月共和国的性质，他们本来就各持己见。转瞬之间，各派又采取了它们在二月时期的旧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又来依靠《改革报》的民主主义共和派，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派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派（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联合），并在俱乐部里奠定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有理由把《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看做复活的六月起义者。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领导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福适部长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取缔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做紧急事项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这项紧急提案，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把内阁交付审判这样的行动，不是冒失地暴露出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软弱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软弱无力的抗议；在这种时候竟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危机的每个紧要关头打出的那张大点数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也针对这个议会，准备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重演一遍，

想强迫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被告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扮演保皇派的布朗基角色反对制宪议会，而制宪议会已开始在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者方面，从布朗基派方面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特别最高法庭，以此来刁难制宪议会。令人惊奇的是，怕失去内阁总理位置的焦虑竟从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杀人犯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对付总统和部长们时不得不诉诸起义，那么总统和内阁在对付制宪议会时就不得不诉诸政变，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去解散制宪议会。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取消自己的共和制的合法名义。于是他只好拿出帝制的合法名义，而帝制的合法名义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合法名义，但这两种名义同正统的合法名义比起来是相形见绌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与它势不两立的一方即正统君主国重新抬头，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2月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君主国的名义。正统派知道时机对他们有利，就公然进行阴谋活动。他

们有可能指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把一次起义顺利镇压下去，内阁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合法性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如果发生一次起义，人们就可以借口维护公共安全来解散制宪议会，就可以为了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态度，建议解散俱乐部，大张旗鼓地撤销 50 个三色旗地方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派，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虐待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混不下去的勒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是起义毫无动静。起义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而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到了 1 月 29 日，这一天要对马蒂厄（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进行表决。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密谋活动，既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协和广场检阅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排场很大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这个交织着各种希望、疑惧、期待、愤慨、紧张和阴谋的中心——猛如雄狮的制宪议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时代精神的

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好像是一个不仅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士。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它自己已处于戒严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作为必要界限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 1 月 29 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它也只配采取这种报复办法。山岳党暴露出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理解力，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充当这出阴谋大喜剧中参与争吵的叫喊者。《国民报》派最后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在介绍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之前，马克思分析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必然失败的原因：宪法中包含的总统与议会的矛盾。在以前的导读中已经谈到，这里不再分析。

第二，马克思分析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过程：“1 月 29 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个 1 月份当中蓄积起来的。”议会以为否决了财政部长恢复盐税的提案，内阁就会辞职。与议会预期的相反，内阁却要求议会解散。不仅如此，内阁还掀起了全国请愿运动，要求制宪议会结束自己的使命。

第三，议会只剩下一条路：起义。于是，马克思分析了议会起义的依靠力量：“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俱乐部。”结果这些

力量纷纷被取缔，而面对它们被取缔的局面，议会束手无策。它的办法就是在 1 月 27 日由赖德律—洛兰“提出了一项由 230 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

第四，为了对付赖德律—洛兰的议案，巴罗一方面试图把 1848 年 5 月 15 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冲进议会试图解散议会的罪犯们交给议会所许可的共和派特别法庭，另一方面准备激起一场起义，以便找借口动用军队发动一场政变。而迫切需要获得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居然接受了巴罗的提议，因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本来就是议会交由巴罗去处理的。

第五，为了能够激起一场起义，巴罗不断挑衅，但是议会却没有勇气发动起义。于是，巴罗得寸进尺，在议会准备无条件否决内阁提出的解散议会的提案时，“波拿巴骑着马在协和广场检阅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排场很大的战略演习”，从而用军队包围了议会。议会怕得要死，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内阁胜利了。到第二天，回过神来的议会又试图对头一天内阁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装模作样的调查。

再次，关于三月二十一日事件：

【一月危机关系到制宪议会的存亡，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机则关系到宪法的存亡；前一件事涉及《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件事涉及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宁愿放弃他们

超凡脱俗的意识形态，也不肯放弃在尘世间执掌政府权力的乐趣。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八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取缔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且制宪议会还得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密谋活动场所。国民议会自己就曾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者。而俱乐部不就是要让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不就是要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者的国家吗？俱乐部不就是十足的无产阶级制宪议会和十足的起义军备战部队吗？

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点笼统，那么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为了在各个具体场合对宪法进行解释和运用吗？既然在共和国初创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经因为戒严而被取缔，那么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难道就不能用法律来取缔吗？三色旗共和派只能用宪法中的堂皇辞令来反对这样生硬地解释宪法。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帕涅尔、杜克莱尔等等，投票拥护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取缔俱乐部

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专用的办公大厅里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经不再具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票数。这时克雷米约先生在办公大厅里及时提醒，说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尾随其后。山岳党一直苦于革命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同样，它也一直在寻求合乎宪法的途径；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唯一恰当地实现宪法条文的精神。】

3月21日议会审议内阁部长提出“解散俱乐部”的议案。马克思指出，“宪法第八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取缔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所以这是一个保卫宪法，还是让宪法名存实亡的决定。仅仅因为俱乐部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议会中的共和派中就有一部分人投票支持内阁，从而使议案获得了多数。于是，“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经不再具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票数。”

最后，关于5月8日事件：

【只有一点还需要调整一下，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气氛异常激奋。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

军事上丢丑，法兰西共和国暗杀罗马共和国，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大点数王牌，赖德律—洛兰免不了在议长桌上放上一份控告内阁——而且这一次还控告波拿巴——违反宪法的起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舰队到奇维塔韦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送到法国。教皇的任务是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利用教皇来拉拢神父，利用神父来拉拢农民，再利用农民来谋取总统职位。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来说是为选举做广告，同时也是对罗马革命进行抗议和威胁。这次远征包含着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在内阁，这就意味着教皇在罗马，并且是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稳住教皇，以便稳住总统的农民。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上了总统。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会怎么样呢！要恢复国王，必须先恢复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

在于他们的保皇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没有宗教，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享有的对天国财富的抵押权，保证了资产者享有的对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统治。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经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询，内阁予以否认，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始终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不过，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的本分，那么假装相信这种谎言，并以此挽回共和国的体面，就是国民议会的本分。

这时，皮埃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退位，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以激烈的语气提出质询。但是内阁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作为

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不是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一并陷落，就是法国必须向奥地利，从而也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做旧日的救国委员会了吗？或是把自己当做国民公会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前往奇维塔韦基亚；4月16日，国民议会同意给内阁拨款120万法郎，作为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地中海三个月的经费。这样，国民议会就给了内阁干涉罗马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做是让内阁去干涉奥地利。它对内阁不是观其行，而只是听其言。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已经落到了无权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所作所为的境地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幕上演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远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大加赞扬。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内阁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穿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基埃——坦维尔的角色，但这岂不是在借来的国民

公会的狮子皮底下露出了天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吗!】

5月8日事件涉及的是法国的对外政策。波拿巴及其内阁欺骗议会，派远征军到罗马，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标，受到议会控告。5月8日，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远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远征军首领大加赞扬。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但在5月11日，胆小如鼠的立宪议会却否决了弹劾波拿巴及其内阁的控诉书。这再次表明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怯懦。

马克思的总结是：

【制宪议会的后半期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首脑；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就是实现宪法；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正在奋斗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立宪议会已经名存实亡，终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了。

12-《从 1848 年 6 月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导读

(七)

现在我们来看制宪国民议会的终结与立法议会的建立。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终结：

【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纪念日即 5 月 4 日的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给自己一点补偿，此后它便退出了舞台。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引起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的反感而被粗暴地、轻蔑地扔在一边，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建树而将来又毫无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么，它就只能通过经常重提六月的胜利、重温六月的胜利，通过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以证实自己的存在，来镀饰自己的尸体。这些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因镇压六月起义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补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使赤字增大了；制宪议会在临终时才决定取消葡萄酒税，它活像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庆幸给自己欣喜的继承者加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信誉债。】

马克思指出：制宪国民议会除了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它死后只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立法国民议会内部三大集团中的第一集团——秩序党：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鼓动。有两大集团相对垒：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派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直到12月10日以后，当它可以摆脱《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只有在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么，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

《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并不代表本阶级中拥有经济基础的庞大集团。他们的作用

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是把它当做自己小集团的统治来欢迎。《国民报》派看见在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派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派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么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必然互相中和。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只得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派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在怒气冲冲、切齿咒骂中保存了共和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享有统治本身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复辟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个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

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以薪金豢养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家，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对革命运动还很疏远，把地位显赫的大财主看做是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天然代表。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拒绝选举其候选人当做造反来惩罚，能够解雇造反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职员、文书、一切日常生活中从属于它的工作人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这样一种错觉，即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真正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伤残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向立法议会输送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马克思指出，立法国民议会中有三个集团：一是秩序党即大资产阶级政党；二是民主主义党或红党；三是宪法之友即资产阶级共和派。其中秩序党由波旁王朝保皇党人和奥尔良王朝保皇党人构成。前者代表大地产资产阶级，后者代表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他们本来相互对立，但在资产阶级共和制下却联合起来，形成立法国民议会中的保守派。秩序党直截了当地宣布资产

阶级的统治，它的口号是“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但它却占据了立法国民议会中的统治地位。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立法国民议会中的第二大集团——红党，或“联合的民主派”：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即山岳党，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言人接近，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由于资产阶级利益被蛮横坚持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他们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会上他们又再次采取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跟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痛苦挣扎一度陷于瘫痪，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10月14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症似的动荡。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日的案件，这一案件使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与总统、联合的保皇派、正直的共和派、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就像是一些只是被大洪水遗留在社会表层的，或者只能引领社会大

洪水的史前世界的巨人；选举鼓动；处决那些打死布雷亚的人；接连不断地对报刊提出控告；政府派警察对宴会运动进行暴力干涉；保皇派的放肆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与制宪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迫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随时都使战胜者变为被战胜者，被战胜者变为战胜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地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下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动荡的痛苦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戏剧性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不能不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他们已经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况且，红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税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 10 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的行动。

军队本身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波拿巴的票，原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可望成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小军士，而他给军队带来的却仍然是那些只具有普通军士水平的大将军。毫无疑问，红党，即联合的民主派，即使得不到胜利，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外省都会投票拥护它。赖德律—洛

兰这个山岳党的领袖在五个省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派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如果说，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无产阶级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胜利重新振作起来，又由于其余各阶级的发展使它无力实行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入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即投入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那么，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于是，山岳党就成了革命营垒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谅解就消除了革命派内部的任何对立。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激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派内阁的压制，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期被摒于一边的山岳党也就抬起头来，并且起到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派能拿出来与《国民报》其他保皇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主义的空谈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相反，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制度。于是与卡芬雅克之流和马拉斯特之流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站在革命真理的一边，由于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革命热情的表现

越是局限于在议会中进行攻击——提交控诉书、进行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空话的极端措施，他们也就越是勇敢。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在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情况下，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必然首先被推上领导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指出，红党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第二，马克思总结了从 1848 年 6 月革命失败后形势变化的结果，分析了红党成为秩序党的反对派的原因：部分农民和外省的革命化。

第三，马克思分析了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山岳党方面的原因：山岳党在议会中所表现出的有限的勇气。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共和派：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纯粹的共和派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被选进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位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的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显然，比较起来，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没什么好说的。由于这一派的无能，它白白地丢失了在制宪国民议会中的优势地位，因而成为立法国民议会中无足轻重的一派。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 6 月 13 日事变及其意义：

【5 月 28 日立法议会开幕，6 月 11 日重演了 5 月 8 日的冲突。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 月 12 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 5 月 11 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然而不是去进行巷战，而只是上街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 1849 年 6 月只不过是 1848 年 6 月的一幅可笑而又可鄙的漫画。6 月 13 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大人物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更伟大的战斗报告，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12 月 20 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 月 28 日，补上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 1848 年 6 月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的出生登记簿的；而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在 1849 年 6 月通过它与小资产阶级合演的难以名状的滑稽剧载入这个出生登记簿的。

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失败。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包藏大量牢狱之灾的可悲的正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现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马克思指出，红党仅有的那点能耐就是议会内的斗争。5月28日立法国民议会开幕后，6月11日山岳党又像当初在制宪国民议会中那样，对波拿巴和内阁提出了弹劾议案，也像在制宪国民议会中那样，6月12日被立法国民议会否决。只不过，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但与1848年六月革命发展成巷战不同，由于山岳党的软弱，这次只不过是一次毫无结果的示威游行。马克思总结说，1848年六月是无产阶级的光荣失败，而1849年六月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可耻失败。现在，资产阶级既有了它的行政权，又有了它的立法权，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权终于建立起来，“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现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13-《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一）

本篇评论原标题为《1849 年 6 月 13 日事件的后果》。《文集》采用的就是这一标题。但为了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这里的导读仍旧采用恩格斯后果的标题。

实际上，“1849 年 6 月 13 日事件的后果”只相当于现在要导读的内容，马克思称为“立宪共和国的第一个时期”；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历史剧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相当于“序幕”时期。后面的内容（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等等）确实与恩格斯修改后的标题比较一致。

首先，马克思指出，随着立法国民议会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终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具足，成为一个形式上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权了：

【12 月 20 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浅淡线条的行政权面孔。1849 年 5 月 28 日，它显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闹宴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的立法权面孔。有了立法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派集团——联合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派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

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征讨。俄国入侵匈牙利，普鲁士军队进攻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乌迪诺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经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集中在立法议会。】

雅努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一尊两面神，他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一副看着过去，一副注视未来。马克思把法国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比作雅努斯的两张脸：“有了立法国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派集团——联合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马克思在下面列举了法国之外的各种反动势力对1848年革命的反扑。现在要看新成立的法国立法议会到底是一幅什么面目了。

其次，马克思揭露了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来挑战资产阶级利益的幻想有多么愚蠢：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无情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V条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的

自由。宪法第 54 条禁止行政权未经国民议会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 5 月 8 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原定目标上来，可见它也同样坚决地禁止他们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这位宪法保护人向国民议会的保皇派多数发出了威胁性声明：“共和派会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甚至会诉诸武力！”山岳党以强烈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嚷；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份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 361 票对 203 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一般议程。

难道赖德律—洛兰以为能够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虽然在制宪议会中有那么多经验，却依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然不懂得宪法条文应该就其切实可行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宪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意义吗？依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派多数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神父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奥迪隆·巴罗一个人

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还会认为自己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约束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最终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专门列了一个条文，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依据的正是这一条文。但同时，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机构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机构的时候才出现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6月11日小资产阶级代表赖德律—洛兰对总统和内阁部长们违反宪法的指控有充分的根据，其“诉诸武力”的威胁也有充分的根据。但是国民议会对此不加理睬，投票决定先讨论其他问题。

第二，“赖德律—洛兰以为能够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这表明了他是多么愚蠢，至少也是天真得可怕。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他都应

该事先知道议会行动是毫无意义的——连他原来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宰的制宪议会中弹劾总统和内阁都无法成功，现在的立法议会已经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彻底失败以后建立起来的，难道他倒指望在制宪议会中否决过的议案在立法议会中反而会被接受吗？

第三，宪法确有条文，规定为了保卫它，人民有权起义，问题是在违背宪法的力量自以为宪法是他们的私产，而且这种力量还极其强大，而小资产阶级却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情况下，起义能够成功吗？以下部分表明，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

再次，马克思明确指出，小资产阶级唯一的本事就是在说理不起作用的时候说理；无论如何，它不敢诉诸物质力量：

【山岳党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议会内的起义。山岳党想让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前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借毁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毁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制宪议会曾经那么顽强地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不也是企图用类似手段宣告波拿巴的当选无效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内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够做成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成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行动。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经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

举时的投票来看，军队并不拥护政府；立法议会的多数派本身刚刚形成不久，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内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大权就会直接落入它的手中。至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衷的莫过于看到议会的亡灵们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争斗。最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内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而又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构成危险。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成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起事。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领导权；它对盟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疑虑重重，而这是有道理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还是被它自己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并得到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又因霍乱而人员锐减，因失业而不得不大批地离开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逼迫无产阶级进行拼死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丢丑，即迫使它

在它的控诉书被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一场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获得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已经成立好了，要让它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派逼上街头，少数派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大地的儿子安泰一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厅堂里却成了非利士人。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山岳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心，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⁹⁵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留下来的代表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

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已经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更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藏在他们的原则、藏在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马克思指出：

第一，小资产阶级派并不是真想举行起义，而只是以起义的借口吓唬统治者。

第二，其实小资产阶级自身就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它缩回自己的手，却想让无产阶级为它火中取栗。而无产阶级已经吸取了历史上血的教训，采取了观望态度，只准备在小资产阶级真正行动起来时才“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

第三，内阁看到了小资产阶级色厉内荏的一方面，一方面做好了应付起义的准备，另一方面发起挑衅，“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讨论控诉书的动议”，结果“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这迫使小资产阶级政党履行自己的诺言，退出议会，举行武装起义。

最后，小资产阶级被迫暴露出它胆怯的一面，用和平示威来代替它宣称的起义，而示威本身却被驱散了，它宣告了小资产阶级的屈辱的失败：

【直到天明，山岳党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这个宣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

宪法保护”(hors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异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大道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途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违心的，这些呼喊声没有汇成雷鸣般的巨响，反而受到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的嘲讽。在这个多声部的合唱中缺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山墙上出现了一个雇用的宪法使者，他拼命挥动他那顶受雇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像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滑稽可笑。众所周知，游行队伍在和平路口转入林荫大道时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猎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顷刻间就四散奔逃，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

和平游行队伍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大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

他们在集结于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工艺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谨慎的国民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挠人民构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作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结束。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么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事变才发展成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工人运动不像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一般运动范围内并受一般运动的支配，因此，六月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成烈火，只不过划过一道冷清清的闪电。】

马克思指出：

第一，在资产阶级把暴力强加给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却害怕暴力，不敢发动群众。他们只会喊“宪法万岁”的空洞口号，而丝毫不敢采取任何切实的行动。与在议会号召“诉诸武力”相反，它们举行了半心半意的

和平示威，结果一下子就被早有准备的正规军冲散了。

第二，与1848年6月23日的无产阶级革命相比，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场闹剧。这是由它们各自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纯粹的表现”。第三，在外地，只有里昂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入而发展成顽强的流血冲突，但由于得不到其他力量的支持，“这个事件并没有燃成烈火，只不过划过一道冷清清的闪电”。

马克思总结说，6月13日事变的后果，是小资产阶级彻底失去影响力和大资产阶级获得完胜：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拼命攻击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派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救国委员会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戒严”。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的罪名把山岳党交付特别最高

法庭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被砍杀得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内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取消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谴责、罚款、停发薪金、暂停与会资格和监禁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方悬挂的不是利剑，而是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当不再有对抗的迹象促使秩序党团结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组成部分了。

在民主派小资产者被夺去议会力量的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莱和鲁镇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擅自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嘉奖。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相继被解散了。】

马克思指出：在继资产阶级共和派失败以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终于使它自己被葬送。由于不敢使用自己手中的暴力，它在被夺去议会力量的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现在轮到小资产阶级面对被清算的命运了。

14-《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二）

上次我们看到的是立宪共和国的第一个时期即序幕期，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时期：保皇主义猖狂的时期。

首先，总的看来，从 6 月到 8 月，大资产阶级的立法议会通过各种反动法律来巩固自身的统治：

【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刊都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无处不在；已经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公职人员再次受到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少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外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 6 月、7 月和 8 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是在忙于制定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把宣布戒严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更严，取消了结社权。】

与原来的制宪议会代表资产阶级共和派同代表保皇派的总统相冲突不同，新的立法议会在清除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

后，成为保皇派的工具，因而与同样代表保皇派的行政权力一致起来，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宣布戒严的权力交给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更严，取消结社权”，等等。

其次，除了法律上的反攻倒算外，对于二月革命的事实上的复辟使得大资产阶级盛气凌人，忘乎所以，乃至表现为放肆的和过度的轻佻：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在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在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寻找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而是使词句显得生动的腔调和手势。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以盛气凌人的狂妄态度对共和国进行侮辱，卖弄而轻浮地道出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的体面，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音调和色彩。“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情假意地去讲什么宪制的即共和主义的言辞了。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所以他们认为复辟的日子在法国很快就要到来。秩序党各派头头们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竞相在《通报》上表白自己的保皇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无意间犯下的自由主义罪行，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地主庄严地宣称自己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是因为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

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似乎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叹的，竟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反而是保皇派表现出的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让人民取得了胜利。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鲁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是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整个王朝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受到追究。在滑铁卢会战的周年纪念日，“我对于普鲁士人有一个议员宣称：侵入法国，不像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人们对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句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共和派的惯常做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做法，例如用“公民”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都会欢欣鼓舞。】

需要注意的是下面的话：“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以盛气凌人的狂妄态度对共和国进行侮辱，卖弄而轻浮地道出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的体面，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音调和色彩。”其余的都是一些例证。

再次，在七月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世俗政治事件还是宗教统治的加强，都让秩序党感到顺风顺水：

【7月8日在戒严影响下以及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们进入罗马，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6月的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马克思指出，保皇派自以为达到了目标，于是心满意足地宣布休会。

【最后，8月中旬，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一方面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连数月的帮派闹宴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他们以明显的嘲弄态度，留下了一个由25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精英，如摩莱与尚加尔涅。这种嘲弄比他们所料想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先是历史注定要去帮助推翻他们心爱的君主国，后来又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也就结束了。】

保皇派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以为能够嘲弄历史，却没想到被历史所嘲弄。立宪共和国的第三个时期来临之前，他们的命运将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化：“他们先是历史注定要去帮助推翻他们心爱的君主国，后来又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15-《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三）

现在我们来看从立宪共和国的第二时期到第三时期的过渡期，即从 8 月中旬立法国民议会休会到 11 月 1 日期间发生的事情。其中的典故不影响理解，不作解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文集》的提示自己查。

首先，是各派力量的分化和重新布局：

【巴黎的戒严解除了，报刊恢复了。在社会主义报纸停刊期间，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期间，立宪君主派小资产者的老的代言人《世纪报》共和主义化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喉舌《新闻报》民主主义化了，而共和派资产者的老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社会主义化了。

公开的俱乐部变得难以存在，秘密团体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了。被视为纯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在经济上无所作为的产业工人协会，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 月 13 日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首脑除掉了，而留下的群众却有了他们自己的头脑。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巴登和罗马的卑鄙的兽行和无以复加的残暴手段，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了白色。法国社会的心怀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

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未必会带来恐怖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共和派、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分别找到了不同的代言媒体：《世纪报》、《新闻报》、《国民报》。**第二**，无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看法都在变化。

其次，由于各阶级力量的变化，保皇党联盟修改宪法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派跑到埃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孙子，而大批亲近秩序党的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即提出立刻修改宪法的紧急动议。依据宪法，只有在 1852 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能修改宪法。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国民议会还不应当听听法国的呼声而牺牲宪法的贞操吗？国民议会对这些省议会的期望，同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中的修女们对潘都尔兵的期望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会这种令人厌烦的诱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本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本身：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tantum mutates ab illo!]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前往埃姆斯参拜而发生猜疑，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来往而疑虑重重，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追求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或多或少露骨的、想要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有理由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把他出卖给这个国民议会。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帕西部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骂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款 30 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兰西民族负债簿上增添了 700 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利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

内阁的第二个拨款要求是提供 900 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这更加剧了波拿巴这一方同

内阁和国民议会那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伊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训谕，即“出乎真意”，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有意透露内情，撩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顶层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在自己家里不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训谕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雨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自己？总统的信？“够了！够了！”谁会对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认为您真正相信总统吗？“够了！够了！”】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利用立法国民议会休会的间隙，路易·波拿巴和保皇党人都试图外出，扩展自己的实力。**第二**，由于议会休会期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秩序党修改宪法的企图遭到了各地省议会的否决。**第三**，路易·波拿巴和两派保皇党人因休会期间各自的活动而互相猜疑。**第四**，内阁自身发生了分裂，它关注奥尔良王朝的利益，而不关注路易·波拿巴的利益，从而与议会中的

保皇党人勾结起来，而议会中为路易·波拿巴说话的维克多·雨果则受到嘲弄。

再次，波拿巴与保皇党联盟之间这种狗咬狗的斗争在议会中达到了顶点：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追求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追求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追求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迫使他立即为自己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的恒星与社会的沼泽游火褻渎地混为一谈而表示歉意，并使这两个提案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里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追求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里耶喊叫道：如果有哪个王位追求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回到法国来只是为了以普通的私人身份生活的话，那人家会怎样看待他！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

易·波拿巴，他靠目前的状况什么也没有赢得，而联合的保皇派需要他在法国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则是因为俗人的目光无法透过流亡的云雾认清真正的王位追求者。】

需要注意的是：斗争的焦点在于，波拿巴家族试图凌驾于另两个皇族之上，而秩序党则试图让波拿巴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为了同波拿巴斗争，联合的保皇派不得不表面维护共和国的存在。

最后，路易·波拿巴对联合的保皇派做出了反击：改组内阁。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敬了立法议会，咨文用颇为粗暴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派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已经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掌握行政权，从而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波拿巴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再得人心了，那么秩序党本来就不得人心。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追求者吗？】

需要注意的是：原来的保皇派联盟内阁是波拿巴缓和与秩序党关系的工具，现在的新内阁则是他反对秩序党的工具。经过1848年12月10日到1849年11月1日之间的斗争，波拿巴的权力

已经得到了巩固。现在他认为到了压缩保皇党联盟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自己权力的时候了。

16-《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四）

现在我们来看从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内容相对较多，但比较容易理解，只作概括，不作解说。

首先，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各派无法独占政权而各怀鬼胎，终于使得理想形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庸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面貌成为现实：

【从 1849 年 11 月 1 日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 1850 年 3 月 10 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派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于波拿巴和保皇派都无法独占政权造成的，因此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是保皇派心目中的君主国。

其次，奥普尔内阁作为听差内阁，代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分析了其原因：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富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金融贵族在《通报》上宣布了对富尔德的任命，同时也就宣布了自己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成为其余各种复辟的补充，而且与它们一起构成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大臣。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的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没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名称。在所有的领域，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把各种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隐藏在后台的东西推到了前台。它把君

主国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徒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联合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受和容许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以排斥或支配资产阶级其余各个集团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派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专门人才不是金融贵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已经实际参加了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全部闹宴。一般来说，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债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所有

参与这些活动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个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产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管理尽可能少些，官吏尽可能少用，尽可能少介入市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可能走这条道路的，因为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越是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它就越是必须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对人身和财产的侵犯越是日益频繁，宪兵人数就越是不能减少。

或者，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的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暂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会为了使国民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债债权人、银行家、货币经营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秩序党中只有一个集团同金融贵族的垮台有直接利

害关系，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利浦统治下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债，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征讨。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而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像英国人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并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同他们阶级的整体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还有谁比雇主，即工业资本家更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在本国范围内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革命在这里并没有终结，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能适应新世界的人们。】

在马克思看来，奥普尔内阁以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富尔德作为财政部长，这“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这等于 1848 年二月革命前的金融资产阶级统治走向复辟，只不过二月革命前的统治者不敢做得这样赤裸裸而已。为什么反而在这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马克思的看法是，因为经历了二月革命以来的整个过程以后，资产阶级终于意识到，它不得不靠金融资产阶级解决自己的问题。马克思比较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与英国的阶级结构，说明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整个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不同，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尚未掌握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

与其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从而消灭他们的利润，在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看来还不如让金融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从而削减他们的利润。

再次，富尔德的财政政策是加重农民负担，减轻资产阶级的税收负担，这必然导致农民阶层的革命化：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税制！保留葡萄酒税！撤回帕西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提案！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利浦的一个老大臣。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的密友。帕西也曾称赞旧税制，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蒙在国家赤字上的面纱。他宣称，如果不想让国家破产，就必须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曾经劝告赖德律—洛兰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又劝告立法议会保留国家赤字。他答应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000万法郎，而短期债款却增加了2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由于金融贵族身旁有其他一些心怀忌妒的资产阶级集团，所以它当然就不像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那样无耻腐败。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掩饰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铁

路的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话题的国债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还有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2月24日前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废除了1850年度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

竭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朗贝尔。他的论据简单明了：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乳；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无疑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可敬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想象魔鬼的时候，就把他想象成税吏。自从蒙塔朗贝尔把赋税尊崇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

失去了农民，耶稣会会士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不可挽回地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的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朗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赋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赋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必履行他们对必须无条件纳税的人民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10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这项赋税，但是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见它从窗口飞了进来。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

因此，消费者的财富越少，税额越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使劳动阶级直接受到毒害。这项赋税使人口在 4000 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量。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 *marchands de vins*，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使消费量减少，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然使城市工人无力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无力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造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 1200 万。因此，一般百姓对于葡萄酒税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做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农民具有一种父子相传的特有的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2 月 20 日恢复葡萄酒税的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和别人是一样的。但他过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本是农民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由于 1789 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赋役，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式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

式偿付过的赋役。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不管这小块土地是由他直接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上积聚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上积聚着抵押权。另一方面，在小块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一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小农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小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艺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相应减少，

按照农民财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其他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而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抵押权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地界相连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 1840 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的总产值为 5237178000 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 355200 万法郎的耕作费用,其中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余下来的净产值为 1685178000 法郎,其中扣去 55000 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 亿法郎付给法官,35000 万法郎用于赋税,10700 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等。原产值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合计为 578178000 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 25 法郎的净产值。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语言已经由于秩序党的论战

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地夸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者的意向和思想，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里昂周围五个省的戒严，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的前任议长；表现于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政府所颁布的规定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外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进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所得税是不利于富人尤其是不利于资产阶级的，而葡萄酒税则是不利于农民的。因此对葡萄酒税的态度是对农民的态度试金石。**第二**，马克思不仅研究了法国葡萄酒税征收的历史，而且分析了农民痛恨葡萄酒税的原因。**第三**，马克思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农民从无偿获得土地，到随着人口增加和资本主

义发展所带来的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第四，农民地位的下降必然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为革命做好准备。马克思在分析农民革命化的过程中说了一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复次，内阁和议会相勾结，通过了一系列损害其他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法律法规：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被加封为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镇长的宗教裁判官，使密探活动向各地蔓延，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使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乡镇被赶到另一个乡镇，就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镇长法案，在镇长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乡村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 17 个军区改为四个帕沙辖区，并把兵营和野营作为民族沙龙强加给法国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该党在普选权制度下生存的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规定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为秩序党重新赢得各省和各省农民。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一些使秩序党自己的目标落空的拙劣办法。重大的规定，如保留葡萄酒税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轻蔑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 10 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来，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规定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茅舍中议

论的中心话题，使革命感染每个农村，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后，立刻又通过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卑劣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公告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者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散发给人民的那些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他们不是必定要再从人民手里夺过去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协议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法律法规，都表明了其资产阶级专政和反人民的性质。

又次，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发动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

就把那些刚被任命为省长的王朝老朽无能之辈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这家报纸向公众透露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得不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议会历次的不信任投票，执意保留自己的内阁；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同时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信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剩下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尔，以使立法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逐个笼络人心。梯也尔说了些关于“政变”和“冒险行动”的威胁性的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否决他为自身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公共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通过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使正统派方面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能干的奥尔良派又夺走了几乎一切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

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甚至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把法国的金银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抬头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像一个市民出身、地位低微的妻子受到自己贵族丈夫的冷淡和鄙视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如同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在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狗咬狗的斗争使共和国的形式成为可能，这里则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共和国的形式，使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能够展开狗咬狗的斗争。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法国阶级斗争形势的激进化——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所有其他阶级整合为一个派别：无政府主义。

【我们已经逐一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等级如何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如何迫于形势而同正式共和国公开敌对，如何被共和国当做敌人来对待。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派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派——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

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派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肉类与粮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派别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全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要打破秩序党的整个垄断！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派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本阶级或阶级集团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某些人是在故意骗人，而另一些人则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的世界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

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摒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以竞争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支持的协作社；资本以积聚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兴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允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各种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或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

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某一个过渡阶段而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之所以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是由于法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作为其对立面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未能发展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革命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过渡只能表现为“不断革命”的理论。

所有这一切，都凝聚为同一个结果：3月10日的选举。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地位一样，在无政府派中也必然

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聚集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时，延搁已久的为填补 6 月 13 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而安排的补缺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遭到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这种令人讨厌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只要巴黎发生暴动，政府就可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不得不对政府让步。

于是政府就着手工作。1850 年 2 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以此向人民挑衅。结果是徒劳。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之所，那么政府自己也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吓倒了。国民议会则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对待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上取走不谢花花环，也没有收到更大的成效。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找到借口，用或多或少隐蔽的方式对内阁投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骑兵入侵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要他们上街，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接到的只是议长要他遵守秩序的命令，而秩序党则在暗中幸灾乐祸，听凭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

行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人民在2月24日采取冷漠的态度。

无产阶级没有受人挑动去进行暴动，因为他们正准备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只是加强了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并没有能阻止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六月被放逐者，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谋杀行动。维达尔是共产主义作家，以《论财富的分配》一书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宫委员会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从事过组织工作并赢得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为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会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这一派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的冲突中获得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就像在2月那样，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

一切反对都是枉然，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吓得如同遭到五雷轰顶。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屠杀和放逐过六月起义者的人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地跟随着被放逐者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奥赛在1830年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月10日是一次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选举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候选人获得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吓得如同遭到五雷轰顶。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这是一场事实上的革命，只不过采取了合法的、改良的形式而已。

17-《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1850 年 3 月 10

日》导读（五）

上一次我们看到，群众利用立宪共和国所赋予的普选权，以和平改良的方式获得了革命性的结果。如果当时的立宪共和国的性质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资产阶级就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其必然结果是立宪共和国的解体和普选权的废除。

现在看立宪共和国的解体阶段。

首先，群众的选举成果使原来狗咬狗的各反动势力重新联合起来了：

【立宪共和国随着 1850 年 3 月 10 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来拯救秩序，而波拿巴又成了他们的中立人物。如果他们想起自己是保皇派，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追求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

注意这里的阶级正是相互对立的保皇党和波拿巴派，即原来相互斗争的议会和行政权。

其次，行政权、立法权和代表它们的媒体都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

当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当局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驱走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发起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7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一个巴托洛缪之夜！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居然把巴黎的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这就是说，1848年6月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影响已经被摧毁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陷入绝境了，因为它的陪臣，即小所有制已经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重弹它那非弹不可的老调。“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却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本身不需要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

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窒息着我们的合法性的铁环。立宪共和国太不成体统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 1848 年 2 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伊利昂城，但我们并不是像我们的祖先希腊人那样潜入的，我们没有占领敌人的城池，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的绝望腔调：资产阶级再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哄骗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暴力镇压。

再次，资产阶级既然无法以和平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那就只有诉诸暴力。既然伪装成全民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那就只有废除普选权，恢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

【可是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 1848 年 5 月 4 日、1848 年 12 月 20 日、1849 年 5 月 13 日、1849 年 7 月 8 日，普选权承认秩序党和资产阶级专政是对的。而在 1850 年 3 月 10 日，普选权则承认自己是错的。把资产阶级统治看做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做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选举权，这种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有什么意

义呢？难道资产阶级的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整个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危及一切现存权力，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照这个逻辑，资产阶级现今已不在法国境内寻求支持，而在法国境外，在国外，在外敌入侵中寻求支持。

资产阶级，这个在法国本土上的第二个科布伦茨，既然求助于外敌入侵，它就会激起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己。既然攻击普选权，它就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需要有一个口实。任何特殊的口实，都会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它们阶级统

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像是一个老人，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装，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揭露了这样的现实：第一，当普选权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时候，它就要利用普选权，否则就废除它。第二，废除普选权的借口只能是通过外部矛盾转移注意力。其中第二招屡试不爽：如果内部矛盾解决不了，就转嫁给外部。可见，所谓“法治”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罢了。

当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正是这样。不要以为中国的让步会有结果，美国解决不了自己的内部矛盾，只能嫁祸中国。

18-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导读（一）

本篇是经恩格斯整理出来的。从题目（“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就可以看出与前篇最后一部分导读内容的联系。

现在导读的内容相当于本篇的绪论部分。对此，恩格斯做了很好的说明：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杂志最后两期即第 5—6 期合刊所载《时评》中摘出来的。该文首先叙述了 1847 年在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商业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 1848 年 2 月和 3 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在 1848 年即已再度来临而在 1849 年势头更猛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有可能在此期间取得胜利。接着，文章在专门讲到法国时作了如下论述：）

恩格斯说明他没有摘的是马克思论述 1848 年革命和 1849 年的繁荣的一般论述，他摘录的是马克思“专门讲到法国”的部分。

马克思首先谈了法国跟在英国后面进入繁荣的过程：

【从 1849 年，特别是 1850 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尔豪森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

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 年的前 9 个月为 6300 万法郎，1849 年的前 9 个月为 9500 万法郎，1850 年的前 9 个月为 9300 万法郎。而 1850 年 9 月份，进口税比 1849 年同月又增加了 100 余万法郎。出口在 1849 年也有所增加，而 1850 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 1850 年 8 月 6 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 年 3 月 15 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 37300 万法郎(1492 万英镑)。1849 年 11 月 2 日，银行券流通额是 48200 万法郎，或 1928 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 436 万英镑；而 1850 年 9 月 2 日是 49600 万法郎，或 1984 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 500 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 1850 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 1400 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 12300 万法郎，或 500 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

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5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蜕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118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芒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 2500 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研究了法国工商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由此给统治阶级即金融贵族带来的利益。

第二，马克思谈了法国大部分人口，即农民，并没有从繁荣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尽管农业丰收，但由于市场经济不是为满足需要生产，而是为满足需求生产，因此丰收本身带来的是价格下跌，而且下跌幅度比英国农民厉害得多，导致农民“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

第三，马克思指出农民虽然受到压榨，但它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其次，马克思说明无论是危机，还是繁荣，世界市场上的领头羊都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因此大陆上的危机和革命都落后于英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多。但是，这种

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多，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温度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不同，当时还没有统一的世界市场，每一个国家都把殖民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马克思除了分析大陆对英国的输出之外，还分析了英国对海外殖民地市场的输出对大陆国家向这些市场输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要在这种背景中研究法国的政体变化。

再次，马克思研究了革命与危机的关系：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

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马克思认为革命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因此在繁荣时期缺乏革命形势（我们已经看到，农民虽然处境不好，但缺乏革命首倡精神）。

第二，资产阶级本阶级的内部争吵不可能导致革命，因为它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稳固的表现和反映，而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资产阶级会团结起来。

第三，只要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是牢固的，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但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受到动摇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马克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对法国进行考察的。下一次我们就进入这种考察。

19-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导读（二）

马克思在前一篇评论的末尾曾经谈到，既然普选权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威胁，那么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的专制面目，废除普选权。这一部分谈的正是普选权的废除过程。

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胜利和人民的失败：

【人民既已促成了 4 月 28 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 3 月 10 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省也当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3 月 10 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 3 月 10 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冑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 月 28 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

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 1852 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本应在 3 月 10 日的基础上乘胜追击，直到通过革命来争回自己的权利，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满足于合法斗争的成果，促成了 4 月 28 日的选举，这两次选出的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秩序党的代表则落选了。这一方面使小资产阶级心花怒放，另一方面使秩序党意识到，小资产阶级仍然不敢发动革命。既然选举不能使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政权，而小资产阶级又不敢发动革命，那就完全可以通过废除普选权的办法报复小资产阶级，而不必害怕会由此导致一场革命。

其次是废除普选权的过程：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 17 个卫戍官。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 月 8 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

的代表。这些报刊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必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全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资产阶级提出了废除普选权的提案。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不占多数，因此唯一的办法是革命。但小资产阶级却号召群众保持冷静，不要革命。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又以人民有可能会举行革命来吓唬资产阶级，结果资产阶级没有被吓住，坚决对废除普选权的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是资产阶级获胜，小资产阶级失败。在表决结果出来后，小资产阶级代表偷偷塞给议长抗议信。这场丑剧就此了解。马克思总结说：各种各样的因素，“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普选权就这样被轻易废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再次，普选权的废除结果必然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的失败，而秩序党还要使小资产阶级雪上加霜：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

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刊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本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出票人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

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廉价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自诩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地步，竟然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彩。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赤贫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山岳党生怕惹资产阶级不高兴，连自己党内稍微有点斗争精神的代表也不放过。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对山岳党却毫不留情，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又通过一个新闻法，限制小资产阶级自由表达的权利。而山岳党对此同样无所作为，任由自己的权利被限制。在人民面前，他们只是做出一幅无辜的羔羊的姿态，表示自己很纯洁，不愿意让暴力弄脏自己的双手。】

21- “1850 年普选权的废除”导读（三）

现在我们看一下普选权废除以后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斗争。

首先，是立法权的代表者秩序党，马克思把它称为“不得已的共和派”：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 3 期第 16 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不得已的共和派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止的摩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剑拔弩张，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

亲吻——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君主派，正是这一原因，在 1848 年二月革命前法国才实行了君主制。但在二月革命被无产阶级逼迫建立共和国以后，资产阶级就向人民不断发动攻击，直到普选权被废除。从逻辑上说，这时候恢复到君主制的条件已经成熟。问题是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在面对自己的敌人、面对人民的时候会团结起来，但没有敌人的时候，就会还原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自相对立。所以，马克思总结说，“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内部斗争的外在框架。

这鲜明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其次，是秩序党与波拿巴即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斗争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做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倚仗他是由 600 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

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 300 万法郎作为酬劳。国民议会在剥夺绝大多数法国人选举权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 300 万法郎，而只同意拨给波拿巴 216 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 200 多万实际上不是拨给波拿巴的，而是拨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 5000 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波拿巴的总统职位是普选权给予的。秩序党把普选权的废除当作对总统进行斗争的一个成果。波拿巴并不打算保卫让他成为总统的宪法，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相反，波拿巴拿他手中的权力跟秩序党讨价还价。他想把因为废除普选权而给他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每年增加 300 万的年薪。秩序党不愿意这样做，但为了安抚波拿巴，不得不做出让步，把 300 万的年薪变成了 216 万的临时补贴。因为军队的统领者尚加尔涅站在议会一边，波拿巴一方面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个结果，另一方面恨透了尚加尔涅，暗中准备找个适当的时机把尚加尔涅搞掉。

再次，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即秩序党与波拿巴达成暂时妥协之后的各自休整时期。马克思对妥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因为双方的力量暂时达成了平衡。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各个集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 8 月 11 日延期到 11 月 11 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给信任投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 28 名共和国道德卫士组成常设委员会，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

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的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共和国道德卫士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

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与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正像秩序党在选举法问题上反对人民时不会与宪法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

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虽然在对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狗咬狗的斗争告一段落后，双方都需要一个休整时期，但在休整时期双方都没有闲着，都在忙于巩固自己的势力。

第二，既然宪法已经遭到破坏，而且没有人起来捍卫它，那么修改名存实亡的宪法就成为必然。问题是怎么进行修改。

第三，双方都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提出宪法修改方案，但双方又都代表资产阶级，因此不得不相互容忍对方。第四，这就使得逻辑上唯一可行的方案，即原来的宪法产生的总统先辞职，然后修改宪法并按新宪法产生总统的方案难以实行。

最后，是波拿巴强化自己权力的做法。这次终于轮到波拿巴报复尚加尔涅了：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

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驿递马车大批装载十二月十日会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彩。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演说，或者宣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艰苦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与尚加尔涅之间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

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份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到一个人身上，以这种方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唆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

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做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丢丑；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使得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大家都知道波拿巴其实不过是个小人物，但他自己不这样看。他由于自己是拿破仑的侄子而被选为总统这件事，一直让他认为他可以成为第二个拿破仑。真正的拿破仑得到士兵们的衷心拥护，所以假拿破仑也想让人们这样认为。为此他举行了阅兵。

第二，这个阅兵，虽然他采取了对士兵们的贿赂措施，因此取得了表面的成功（士兵们高喊“皇帝万岁”），但实际上是失败的。为了追究士兵们的口号，陆军部长和尚加尔涅发生了冲突。波拿巴对陆军部长明升暗降，却通过其他两个将军制约和羞辱尚加尔涅。限于纪律，尚加尔涅毫无办法。

第三，事实证明，无论是波拿巴，还是秩序党所误认的大人物尚加尔涅，都不过是庸人。资产阶级中是产生不了真正伟大的人物的。因此，在将要复会的议会中，秩序党恐怕只能接受波拿巴延长总统任期的事实，虽然波拿巴期待的总统薪水增加的美梦不太可能实现。真正倒霉的只能是小资本家们，他们的利益在大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中被牺牲掉了。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导读

0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说明

“文集”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说明。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继《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后另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以下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的编者对这部重要著作的说明：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 1848 年革命经验和评述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述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见本卷第 470—471 页）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见本卷第 479 页）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

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 565 页）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见本卷第 564 页）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2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352 页）马克思还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 570 页），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 573 页）。

这部著作是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后不久就动笔撰写的，马克思把它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显然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 1799 年 11 月 9 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改行帝制。1851 年 12 月 2 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恩

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称这次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7页）。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最初计划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他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定了原文，把书名更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批判了维·雨果和皮·约·蒲鲁东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的唯心史观，强调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指出他的这部著作旨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见本卷第466页）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恩格斯对第二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并为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

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见本卷第 469 页）1891 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同年 1 月 7 日—11 月 12 日分 32 节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这一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 年出版了波兰文版，1894 年出版了俄文版。

收入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 1869 年版译出的，并收入了恩格斯为 1885 年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对 1852 年版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0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1869 年第

二版序言”

在本版序言中，马克思谈了写作本书的缘起，并比较了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区别，说明了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缘起：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旬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逼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截止到（1852年）2月。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马克思谈到，本书既是应朋友之邀写成的，但也是在形势逼迫下写成的。此书引起了德国统治者的恐惧，以致当时连德国最激进的书商都不

敢出这本书。反倒是到 1869 年，已经失去当初所面对的革命的迫切性时，有了对此书的市场需求。

其次，马克思通过与另两部著作比较，说明了他的研究的特点：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示。】

马克思是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来考察历史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曾经批评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没有处理好人创造环境还是环境造就人的关系，陷入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马克思认为，“环境

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此应当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关系出发而不是像雨果那样单纯从人出发或像蒲鲁东那样单纯从环境的改变出发，来研究历史事件。马克思指出：“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因此这里的环境是法国的阶级斗争环境，这里的主人公则是路易·波拿巴。必须把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进行考察。

再次，马克思谈了“历史科学”的预测功能（后人所谓“证实”或“证伪”）在本书的体现：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 1815 年会战的著作中，开始攻击对拿破仑的崇拜。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这里所说的旺多姆圆柱顶上的铜像是指凯旋门上面的拿破仑铜像。在法国，拿破仑被神化了。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夺取政权，路易·波拿巴的平庸则有助于破除人们

对拿破仑的神话。人们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而马克思早就预测到了。

最后，马克思讲了应用比较方法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历史的具体的原则。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正如对路易·波拿巴和拿破仑的比较需要遵循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和具体性原则一样，对拿破仑与凯撒的比较也需要遵循唯物史观的相关原则，而不是只去寻找表面的相似性或表面的不同。凯撒之所以上台，是由于受到当时罗马的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拿破仑之所以上台，则是由于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正如虽然法国大革命披着古罗马的戏装，但演出的是资产阶级戏剧一样。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古罗马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为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而且表现为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两极分化导致平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由社会通过奴隶劳动来养活的非劳动者，而现代无产阶级则是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不能混淆古罗马的历史舞台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舞台，古罗马的劳动者只构成历史剧的舞台背景因素，而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则是现代历史剧的主角。

第二，在本书第二版出版的年代，坎特伯雷大主教是从1848年开始任职的约翰·伯德·萨姆纳（John Bird Sumner），而圣经中的最高祭祀撒母耳（Samuel）是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以色列国立国后的第一位先知。萨姆纳（Sumner）和撒母耳（Samuel）两个人除了只是在名字上略有相似之处，没有任何其他可比性。把拿破仑同凯撒相比，把古罗马的无产阶级同现代无产阶级相比，无异于把萨姆纳（Sumner）和撒母耳（Samuel）相比。

现在很多专家的所谓对比方法，正是这种表面对比的方法，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外部反思方法。

0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1885 年第

三版序言”

本版序言是由恩格斯撰写的。恩格斯评价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杰出的著作，一是由于他对法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各种事变都逃不出他的法眼；二是由于马克思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武器。

恩格斯首先评价说，《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 33 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现在也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 12 月 2 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

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二月事变”是指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这里的“12 月 2 日的奇迹”是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 12 月 2 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说明他对当时的法国历史已经达到了规律层面的认识。

其次，恩格斯分析了马克思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的两个主要原因：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可见，恩格斯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研究必须深入细节，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还要有适宜的分析工具，能够把握细节背后的脉络。这里要求的是一种内在超越的方法，而不是拿一堆事先准备好的公式往研究对象上乱套。遗憾的是，以往的很多历史研究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

0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上）

本篇（第一篇）相当于“雾月十八日”的导论部分，先讲了马克思本人的“历史”概念，然后在对“雾月十八日”史进行分期（分为三个时期）的基础上，介绍了第一个时期，以及第二个时期的开端。我们将分三次（标为上、中、下）导读。

马克思从“历史与过去的关系”“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两个角度介绍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现在先看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与“过去”的关系。

关于“历史”概念与“过去”的关系，马克思指出：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

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打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

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 100 年前，在另一个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 1848—1851 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

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他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头顶一盏暗淡的油灯，背后站着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士兵，他们既不了解矿山苦役犯，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法兰西民族则叹道：“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而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怀念埃及的肉锅，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这部分一共有五段：第一段，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论的评论；第二段，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第三段和第四段，新的社会存在

与旧的社会意识的关系：第五段，旧的社会意识对新的社会存在的阻碍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在第一段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谓历史重复自身能够像自然科学一般表明自身的规律性（因为自然规律是可重复的）的看法做了修正。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意识并不是自然科学般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因为历史认识具有复杂性，它与历史实践之间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复杂过程，而不是自然科学实验与认识之间的线性对应关系。所谓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说明历史主体们不能恰到好处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反而极易形成错误的自我认识。历史就是在主体不断犯错误中前进的。这一段中的人物对比双方分别是 1848 年革命时期的庸人和 1789 年大革命时期的英雄。如果觉得人名太多眼花缭乱，建议去找一本法国史读一读，或者回顾一下以前导读过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清楚了。

在第二段中，马克思说明“历史”总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人们的行动是由其当下的社会存在状况决定的，但他们的意识却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人们的历史意识通常总是落后于他们的历史行动。他们必须学会为新事物提供一种新语言。而这一点却是非常艰难的。这里可以看到，新理论总是需要像发明一种语言那样发明出来，否则无法帮助人们去把握新的现实。理论家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获得自我意识。

在第三、四段中，马克思说明，为了把握新的社会存在，新的社会意识如何超越旧的社会意识：先是用旧语言来完成新任务；然后逐渐发现，用来表达新存在的旧意识其实是经过理想化的意识，因而必须用现实的意识来代替。因此，不能用和平建设时代的平庸否定革命战争时代的崇高。这里涉及的人名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比如，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缺乏自我意识，只能借助《圣经》中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和语言来激起人民的热情，但资产阶级社会的建设就需要冷静的实干精神，因此洛克的散文式语言就代替了圣经中的小先知哈巴谷的热情流溢的语言。不了解其中典故的可以自己去核对一下圣经和洛克的著作中相关的部分，亲身体验一下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的区别。

在第五段中，马克思说明旧的社会意识是如何阻碍了新的社会存在，从而迫使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发明新的语言、新的社会意识，以便能够冷静地看清自己面对的现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现实，必然粉碎人们笼罩在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面的幻觉。因此，重要的是用人们的存在去说明的他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不能用历史当事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变。

既然“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见恩格斯《神圣家族》），那么它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或人们的活动与“过去”的关系，二是历史或人们的活动与未来的关系。

现在我们先考察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与“过去”的关系，明天再来看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与“未来”的关系。

这将凸显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传统历史观的区别。

0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中）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与“未来”的关系，然后看一下在 1848 年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如何在欺骗人民的同时导致自我欺骗的。

首先，马克思谈到，从前一切阶级都是面向过去的，而无产阶级却只能面向未来：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 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 月 2 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 年 12 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 1848 年 2 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 1848—1851 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

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 18 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 19 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是面向过去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是面向未来的。因此，与资产阶级革命所面对的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依靠密那发的猫头鹰，而只能依靠高卢雄鸡。资产阶级可以在事先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但无产阶级必须事先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这需要新型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革命无非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可以借助于旧制度的道具来演出新制度的戏剧，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消灭剥削，建立一种崭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制度，因此它必须在意识中反复地锤炼，直到能够挣脱一切旧的束缚为止。这里需要不仅仅是知识，就如黑格尔的哲学那样；也不仅仅是情感、不仅仅是意志，而是全部的生命活动——如果说过去只是局部的政治解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将实现的是人本身的解放。从实践来说，无产阶级不能依靠假设来显露自己的高明，假定一切符合自己的理想会取得什么成就；相反，无产阶级正是要在一切现实条件具备的时候，依靠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力量来战胜一切困难。这同资产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

熟悉《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读者会记得，在二月革命中，由于无产阶级的勇气，迫使资产阶级宣布成立共和国，从而在现实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获得超出资产阶级预想的成果。但无产阶级要获得足够的智慧，还需要更多的磨炼。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报复，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正是这种磨炼。

其次，马克思谈到，由它自己的利益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是一个因为瞻前顾后而既缺少勇气、又缺少智慧、更缺少力量的阶级：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的发展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以此互相祝贺，以为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 月 2 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用大喊大叫来抑制内心的不安，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确信：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

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瞩目下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 3600 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缺乏既缺乏勇气，又缺乏智慧，因而不敢运用自己和人民的力量。他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只会吹牛：我在罗陀斯的时候，跳得可远了。一旦有人说：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荣誉的花环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们就只好推三阻四，希望上帝显灵、奇迹发生。既然奇迹没有发生，他们就声称一切都是意外。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必须找到真正的原因。

这正是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准备完成的任务。

06-《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雾月十八日”第一篇的最后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失败。

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点：

一是从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的阶段划分，马克思分成了三个时期；二是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时期，即二月时期；三是第二个阶段或第二个时期的第一个小阶段，即到六月革命为止的时期。第二个阶段的其他小阶段将在“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篇中讲述，第三阶段则在其他各篇中讲述。

一是阶段划分：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三个阶段的关系是：第一个时期，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怎么建立共和国，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人们聚讼纷纭；第二个时期，共和国建立的过程，水落石出，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下的共和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短暂存在，或它走向灭亡的过程。

请牢牢记住这个划分！否则到后面各篇会感到乱。

二是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时期），时间短，马克思讲得也比较简单：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战，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成二月革命分子，因获得了政府

中的绝大多数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势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景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这是无产阶级迫使资产阶级成立共和国并打上自己阶级烙印的时期。马克思先讲了二月革命作为“革命序幕”的特点：临时性。二月革命虽然宣布成立共和国，但这只是确立了目标，共和国到底什么样子，需要通过宪法来确定，所以需要选出一个制宪国民议会。在这之前，都是各个阶级或阶层自己占据特定位置，法律上地位未定，因此是临时的。

在下一自然段，马克思讲了各个阶级在这个阶段的斗争。首先，由于二月革命缘起只是资产阶级本阶级的内部斗争，性质上属于对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自我改良，因此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没有做好成立共和国的心理准备。作为一场准备不充分的革命，成立共和国完全是一个意外。其次，正由于完全是一个意外，各阶级都按自己的想法解释共和国，其中无产阶级把它当作“社会共和国”，也就是说，它并不满足于在资产

阶级社会内部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进行改造，而是要求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从而对资产阶级的国体进行改造。它要成立的不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试图掌握政治权力。再次，由于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乏实力基础，无产阶级不了解如何去夺取和掌握政权，它没有把精力集中到扩大实力，掌握实权，而是直接陷入了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的细节中去，从而给了其他阶级以掌握权力的机会。

三是第二个阶段（或第二个时期）的第一个小阶段，即无产阶级被驱逐出局的阶段：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重新开始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

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备现代生产条件、拥有通过百年来的努力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的存在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变换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停滞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

应该占有新世界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物质生产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做“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做“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士兵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

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这一部分有四个自然段，让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个自然段：当无产阶级发现制宪国民议会试图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社会共和国”时，它不干了。5月4日国民议会开幕，5月15日无产阶级试图解散这个议会，但是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领袖暴露了，由于这一行动是“非法”的，因此这一失败使无产阶级领袖被迫退入幕后。

第二个自然段：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及其失败。制宪国民议会向无产阶级表明：虽然名为“共和国”，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无产阶级想要的那种社会共和国。就是说，是“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前不久俄罗斯学者曾经说，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掉，是由于它不再是一个人民的党，而只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官僚的党。换言之，苏联就国体来说名义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就政体来说实际上却是一个寡头制的国家，正如资产阶级共和国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共和国，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也是一个寡头制共和国一样。无产阶级拒绝了议会的声明，以起义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结果遭到血腥镇压。不仅原来的无产阶级领袖，而且其他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

方面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领袖”)相继被捕入狱，只剩下其他一些能够在资产阶级秩序范围内活动的人还保存了下来。从此以后，就只剩下保守的或反动的社会主义分子才能代表无产阶级了。马克思评价说，二月革命以来，只有无产阶级的斗争才是值得关注的新的历史现象，其余的都是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旧货色。无产阶级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光荣的失败，无产阶级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荣誉。而以后各个阶级的失败却是可耻的失败。

第三个自然段：马克思揭示了二月革命的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内部的政体交替，即由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像其他那些脱离国体去讨论政体的人认为的那样，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制与共和制”问题，因为其他国体（奴隶制、封建制等等），也可以有政体轮换。实际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六种政体就只限于奴隶主阶级内部的贵族与平民斗争，而奴隶则不被考虑在内。但是，马克思充分注意到，在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内部的各种政体中，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是其保守形式，而是其“政治变革形式”。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它不仅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形式，而且蕴含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的过渡。马克思以美国为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残余的地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第四个自然段：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后果。无产阶级的口号是“社会共和

国”，它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的“社会”只能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因此无产阶级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16页）。这样的社会秩序、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秩序只能是“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而不可能是无（私有）财产、无（资产阶级）家庭、无宗教的秩序，即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秩序。因此，在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遭到整个“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阶级的联合镇压。然而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要求一开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要求的激进化。资产阶级也强调“社会”，只不过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排斥在“社会”之外而已。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在启蒙思想家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启蒙思想家宣传的是“理性、正义和绝对真理”。换言之，当时的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这同时欺骗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虽然当时的社会意识是“理性、正义和绝对真理”，但社会存在却是“（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家庭、宗教、秩序”。无产阶级一旦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其他阶级一旦起来镇压无产阶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这种差别就暴露无遗。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必须冷静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原来的虚假社会意识之间的不一致，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原以为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六月起义暴露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抗，使资产阶级意识

到，它所代表的只是本阶级的利益；二是在没有认识到这种新的社会存在与旧的社会意识的不一致之前，按照旧的社会意识的行动必然使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受到波及——由于无产阶级起义使用的理论武器（理性国家、理性社会）来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因此反对无产阶级既使资产阶级自身的虚伪性暴露出来，也必然剥夺掉启蒙思想对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

（从本段到倒数第二段完全是我对“社会”和“财产”的解说，可以跳过）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这里的有产、无产或者拥有、不拥有并不仅仅是法哲学概念，更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分析对于无产者和资产者来说的拥有和不拥有概念（这也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一部分即抽象法部分的概念）时指出：“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实，既然当今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极其卑微的人，既然他连一般的生存之路都已被切断，而合乎人道的生存之路就更无从谈起，既然不拥有的状态就是人完全脱离其对象性的状态，那么，蒲鲁东把不拥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对象，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因为蒲鲁东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这个对象，所以这样做就更加正确。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完全的非现实，是非人的完全的现实，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拥有，即拥有饥饿，拥有寒冷，拥有疾病，拥有罪过，

拥有屈辱，拥有愚钝，拥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7-268页）国民经济学是对当时的社会阶级状况的不自觉反映，“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严肃地看待国民经济关系的人性的假象，并让这种假象同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迫使这些关系在现实中成为它们把自己想象成的那种东西；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它们关于自身的这种想象而承认自己是真正非人性的。因此，蒲鲁东始终不同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同上书第257页）换言之，当时的经济学家们都以为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对当时的社会存在的反映，而蒲鲁东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经济学本质上是虚假意识对虚假存在的反映。

这是蒲鲁东高于国民经济学的地方，但蒲鲁东跟德国唯心主义者享有同样的幻觉，就是：只要人们树立正确的意识，存在就可以得到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讽刺说：“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

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0页）问题是，重力的现实不改变，怎么可能单纯改变重力的思想？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到社会存在是可变的，因此重要的是社会存在状况改变的条件。否则，人们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解，就只能达到存在决定本质的水平，借用费尔巴哈的话说：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说：“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萨特之前100多年，就认识到“存在先于本质”。他们眼里的“社会存在”并不是自然界的物质存在那种意义上

的“社会物质”存在，而是人的活动。因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生活（人的生命活动）与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的出发点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而是生活，是人们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正如资产阶级是在斗争中发现自己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不一致从而得到其真实的社会意识一样，无产阶级也是在阶级斗争中发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从而得到其真实的存在状况的意识，即必须推翻旧社会的革命意识。那么，阶级斗争是如何向前推进的呢？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又是如何从无产者的自发意识上升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的呢？回答很简单：通过辩证法，即拥有和不拥有、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专门讲解这个问题，鉴于它的重要性，这里全文引用如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

【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只说明它们是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

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

因此，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为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到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么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把无产者当做神。事实恰好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

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于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

回过头来再说资产阶级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镇压无产阶级。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523 页）由于无产阶级当时使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资产阶级在镇压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就失去自身的护身符。

于是，六月起义以后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成为一个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形式不断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直到资产阶级帝制后退的过程。所谓“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就是指路易·波拿巴必然发动政变、必然称帝。

0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上）

本篇继续讲上一篇三个阶段（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时期）。它又分两个小阶段：头一个小阶段是无产阶级的出局，即六月起义的失败，上次已经讲过了；这次起用（上）（中）（下）三次导读讲后一个小阶段。其中，现在第一次导读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定位；下一次导读讲共和派的统治；再下一次讲它的瓦解。

首先，马克思讲了第二个阶段后半段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由确立统治到走向瓦解的过程：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主义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马克思把这个阶段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二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瓦解。

其次，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实质——空谈家或口头政治家：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利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

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利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派别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同英国联盟，始终怀有这种民族主义的仇恨。在路易—菲利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

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资产阶级共和派是二月革命前的官方反对派，因此它本质上并不想革命，而只是想改良。它的影响本来就限于议院和报纸，就是说，它擅长的是口头政治和纸面上的政治。它是由思想和信仰、而不是由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想想中国人的说法吧：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天生没出息的货。既然它的信仰不是来自它的利益，那么来自哪里呢？民族虚荣心。拿破仑帝国灭亡以后的事件，严重打击了这种虚荣心，因此他们对在

帝国灭亡中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中（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眼中大概是僭主制）不满意，对这种君主制下进行统治的大金融资产阶级不满意。他们的这种民族主义无形中迎合了工业资产阶级，因而得到工业资产阶级的感激；同时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又得到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感激。一句话，他们既反对国际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前的改良，是试图另立明君（奥尔良公爵夫人）来代替原来的君主（路易—菲力浦），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亲自掌权。二月革命把他们推向了前台，他们立即开始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权力，先是设立执行委员会把无产阶级代表排挤出去，然后利用六月起义解散执行委员会，把小资产阶级排挤出去。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在制宪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让镇压六月起义的刽子手、共和派卡芬雅克将军掌握了独裁权力，同时，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和各部部长也都是共和派。权力就这样完整地落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这帮空头政治家的特征：反动性。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

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的，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共和派获取权力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革命，反倒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又遭到了镇压。所以马克思评价说，资产阶级上台，自以为是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这是因为，如果没有革命，保守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上不了台；而有了革命，如果他们不反动、不镇压，同样上不了台。因此，共和派不仅自己不革命，而且镇压了革命，并且正是凭借这种镇压才上台。所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上台并不是因为它的生命力，而是因为它的邪恶。

一方面，无能；另一方面，反动。由此既决定它的政治统治，其结果表现为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下一次我们就来看这两个方面。

08-《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中）

这次主要讲共和派的统治，分两点讲：一是新宪法的制定，二是戒严。然后分析了这两个方面对于共和派资产阶级统治的意义及对于它的政治对手路易·波拿巴的意义。

论共和派的统治之一，对宪法的分析：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 1830 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无法挽回这一事件。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满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对其所作的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 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

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基本法律；这些基本法律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使之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误入了迷途）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

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它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 45 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 60 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道义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道义上的权力，宪法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 750 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 750 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选出的，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 111 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 500 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继续行使权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这种权力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特别最高法庭（“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 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制宪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马克思前面谈到从资产阶级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新宪法体现的正是这种政体的特点。

在第一自然段中马克思谈到，1830年的宪法名义上是资产阶级君主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寡头制，即金融贵族的统治。（此前的波旁王朝是大地主的统治）。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本质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不仅大金融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分享政权。但由于二月革命在无产阶级逼迫下已经宣布成立全民的共和国，所以资产阶级宪法的任务就是解决如何以全民的名义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

第二自然段回答了第一段的问题，讲的是通过对名义上的全民权利附加条件进行实际限制，来达到事实上的资产阶级统治。这里的分析让我们想到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即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都是人与人分离、人与对立的权利，而不是人与人结合、人与人沟通的权利，因此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权利，或作为资产者的权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都建立在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基础上。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忘记了的读者可以回去看我的解读，或者找一下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原子式个人》一文。

第三和第四自然段讲的是宪法包含的自相矛盾：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矛盾。既然不相信集体，不相信联合，那么就只剩下资产阶级的妙招：以权力制约权力。在美国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对立，而在当时的法国主要是立法和行政的对立。

马克思分析了现在福山称为“否决”政治的要素。太阳底下无新事，完全可以用它分析现在的美国总统与众议院议长两位七十几岁的老人之间的斗争。至于为了修墙而宣布紧急状态，同后面将要讲到的路易·波拿巴 1851 年的政变也极为类似。

第五段讲宪法的自我保护措施同样靠不住，第六段是总结，说明这个宪法根本无法预防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论共和派的统治之二，对戒严的分析：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当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要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

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最好是宣布自己的统治是最高的统治，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最终为自己的利益搞一次对自己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 15000 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戒严说明，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民主以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恰恰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但是阶级之间的暴力统治关系，由于资产阶级把每个人的自私自利看作本性，必然会转化为阶级内部的暴力关系。这就是六种政体轮回的根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奴隶制下六种政体轮回的原因，马克思则分析资产阶级统治下六种政体轮回的原因，尤其是其经济原因。

戒严和拟定宪法，客观上都是共和派为它自己统治的瓦解挖坑，两者都为路易·波拿巴开辟了道路。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近卫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力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二月革命的费用农民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

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此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做波旁，也不叫做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首先应该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消亡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

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头三段的问题是：为什么路易·波拿巴会当选为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在前面谈到共和派的民族主义，已经埋下伏笔。路易·波拿巴全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他的名字让农民想起拿破仑当年给土地的好处，又让共和派资产阶级想起拿破仑帝国的荣光。因此，尽管按照新宪法，路易·波拿巴根本就没有被选举权，还是被选为总统，为他后来的政变准备了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条件。马克思在《1848 到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我也做过导读，这里不再重复。

第四段的阶级分析说明的是：既然共和派资产阶级先后赶走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能依靠的就只剩下路易-菲力浦王朝的金融资产阶级和波旁王朝的大地主阶级。这两派结合成秩序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敌人。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暴力才能战胜秩序党，但秩序党正是共和派的依靠力量！从马克思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就国体来说，资产阶级的暴力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不是用来对付本阶级的；就政体来说，只有最反动的阶层，才会敢于运用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其他（不那么反动的）阶层。但共和派资产阶级本来就只是一帮空谈误

国的伪政治家，不能指望他们用暴力去反抗更加反动的暴力。

在 1852 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8 年 5 月 4 日—6 月 24 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 年 6 月 25 日—1848 年 12 月 10 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 年 12 月 20 日—1849 年 5 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这一段尽管后来被删除了，但不失为对第一篇结尾和整个第二篇的精彩总结，而且为第三篇开头作了提示。

09-《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下）

上一次最后提到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版对第二个阶段（或第二个时期）所划分的三个小阶段中的第二个小阶段即“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的阶段，马克思谈到了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总统；现在的导读涉及的是三个小阶段中的最后一个小阶段，即“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的阶段。

首先，马克思为第三个阶段（或第三个时期，《雾月十八日》的第三篇开始讲这个阶段）的开头做了铺垫：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结为连理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他1830年以来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非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份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

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份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就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迎娶了新娘，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娶回家的。波拿巴本人好像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第三篇中，马克思会谈路路易·波拿巴与秩序党的斗争，在第二个阶段的第三个阶段中，路易·波拿巴与秩序党仍然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共和派资产阶级，办法是路易·波拿巴从秩序党中物色到奥迪隆·巴罗作为内阁总理，以便求得制宪国民议会中秩序党的支持，而巴拿马本人似乎像中国的黄老道家那样，做了无为而治的退隐者。

这里对巴罗的讽刺是指，巴罗原打算以二月革命前议会最先进领袖的身份追求内阁总理身份（就像一个求婚者追求自己的女神一样），而他得到内阁总理职位恰恰是以二月革命前掌权者的代表身份，所以马克思才说这个内阁总理是个失身后的新娘。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代表秩序党的内阁如何与制宪国民议会中的秩序党成员勾结，向制宪议会中的共和派发起进攻的过程：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

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 1848 年 12 月 20 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 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它不解散。1849 年 1 月 6 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基本法律，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议会自行解散的决议。这时，不仅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 年 1 月 29 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

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基本法律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政变防止了这一政变。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行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这部分一共有四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说的是内阁对制宪国民议会的欺骗，本质上是向制宪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的进攻（因为国民议会中的秩序党即联合起来的两个保皇派同内阁是一丘

之貉)。第二自然段是制宪国民议会中的秩序党向共和派发起的攻击，即要求制宪国民议会解散（因为内阁已经掌握在秩序党手中）。第三自然段则是内阁与议会中的秩序党一起向议会中的共和派发起进攻，要求制宪议会解散，以便成立与行政权配套的新的立法议会。而制宪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居然愿意自杀，只是希望能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在这三段中，马克思都拿后来路易·波拿巴在政变以后的做法同这一小阶段秩序党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讽刺地讲：路易·波拿巴在这个小阶段并非真的无为而治，而是在向秩序党学习如何搞政变。所以，是秩序党自己把路易·波拿巴反对他们的手段教给了路易·波拿巴这个笨蛋。

第四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人自己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据一定的席位，为什么又想解散这个议会。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秩序党人在他们预期能够占据多数的新议会即立法国民议会中，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为宪法制定配套的基本法律，以免由共和派占据多数的制宪议会中制定出的基本法律对他们不利。为此秩序党人软硬兼施，直至不惜诉诸暴力。马克思讽刺说，秩序党人太急了，他们本应等制宪国民议会制定一个限制总统的法律之后再设法解散它。过早解散制宪国民议会的后果是，当面对与路易·波拿巴的斗争时，秩序党人发现自己缺乏这样一个法律作为护身符。

最后，马克思指出：内阁与制宪国民议会中的秩序党人勾结，战胜了共和派，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无意中为路易·波拿巴扫清了障碍：

【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竟然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迪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军队的宽大为怀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担忧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而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开始同波拿巴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官法案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梯也尔也

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共和派发现秩序党内阁和整个行政权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民族主义设想行动，而是玷污了他们的理想，因此试图进行斗争，但整个秩序党勾结起来破坏共和派的企图。共和派发现制宪国民议会面临危险时向军队求助，但军队本身由秩序党人把持，因此拒绝了共和派关于保护议会的要求。这一点也被路易·波拿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当由秩序党人控制的议会试图请求军队保护时，它得到了波拿巴同样的回答。可笑的是，秩序党人的这种报应后来让它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心中暴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想到随后就将轮到自己承受这种命运！

为了让对手倒霉，不惜采取非法手段，结果是到头来自己也只能承受非法的迫害。真是一个更比一个蠢的蠢猪大赛！

1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上）

本篇开始讲第一篇所说三个时期的第三个时期：

【立法国民议会于 1849 年 5 月 28 日开会，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 1852 年版中对这一大阶段又做了具体划分：“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 年 5 月 28 日—1849 年 6 月 13 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 年 6 月 13 日—1850 年 5 月 31 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 年 5 月 31 日—1851 年 12 月 2 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

本篇讲的是第三个时期的第一个小阶段，即“1849 年 5 月 28 日—1849 年 6 月 13 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的阶段，我们将分成三部分导读：（上）总论；（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下）斗争过程与 6 月 13 日民主派的失败。

现在导读（上）。

首先，马克思拿 1848 年二月革命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作了对比，指出了 1848 年革命的总特征：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两次革命正好相反，一个是不断前进，一个是不断后退。马克思的描述非常生动。

其次，马克思指出矛盾的复杂性：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室，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地无谓地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相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漫不经心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通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昔日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体现，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体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

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一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这种复杂性突出在表现为表面上每一派别都自相矛盾，因此向研究者提出了方法的重要性：在复杂的矛盾中，如何把握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再次，马克思提出了矛盾分析的原则或方法——阶级分析法：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利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来说，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

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 50 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 750 个席位中，它占有 200 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被抬上议员宝座的。这样，在 1849 年 5 月 28 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

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针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的，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 150 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这里一共有四个自然段。其中，第一、二自然段说明在制宪议会解散、立法议会成立之后，秩序党如愿占据绝对优势，与秩序党不同的波拿巴派的力量则微不足道，加上内阁仍然掌握在秩序党手中，因此秩序党完全控制了局面。（这里埋下伏笔：最后阶段秩序党与波拿巴的斗争中，波拿巴肯定要解散秩序党内阁，把内阁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三段讲秩序党的反对派，包括共和派和民主派。共和派在前一个大阶段的失败使它同波拿

巴派一样，在新议会即立法议会中的势力微不足道；但经过前一个阶段的斗争，被排挤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重新凝聚力量，通过妥协成为盟友，从而作为同一个党派——民主派，在新议会中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从票数对比看，民主派虽然属于反对派，与秩序党相比整体实力差很多，但由于秩序党存在内部裂痕，分化为三个派别，如果民主党能采取合纵连横的分化瓦解政策，各个击破，还是存在成功的可能的。但是它却在两周内就彻底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

第四段分析了原因：民主派不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尤其是不善于分析复杂的表面冲突背后简明的利益分野，因此不知道该联合谁、反对谁，用毛泽东的话是“分不清敌我友”。民主派把空洞的词句同现实的利益相混淆，不是去维护各种不同的利益，因而不是用阶级分析方法去从事阶级斗争的发动，而是搞词句之争、意气之争。

这不由让我们再次想起古语中“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

1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中）

现在我们来看：如何分清“敌我友”？马克思给出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他们的利益，而不是看他们的言辞。

首先，马克思在分析秩序党（执政党）的两大集团时，点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要分析各个集团的经济基础，看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形成它们的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主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律师、教授和阿谀者。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

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姿态，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莱尔蒙特，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联合起来，从而把本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本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的身份痛骂共和制，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出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

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现，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到正统派的贝里耶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分歧最少；后者曾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第一自然段，在分析秩序党即作为立法机关的国民议会的执政党时，马克思指出其两大集团即正统派（波旁王朝派）和奥尔良派（七月王朝派）虽然起源于两大王朝，但它们已经演化现代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即大地产集团和资本集团，因此分别代表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中的前两大阶级，正如英国之所以出现光荣革命，是由于英国贵族不再是旧的封建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一样。马克思的名言“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

来”，让我们想起《德意志意识形态》讽刺历史编纂学家连小店主的精明都没有达到的话。

第二自然段，马克思谈到，两大集团的政治身份取决于它们现实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关于它们历史身份的回忆。人们可以自以为生活在回忆中，但他们总是生活在现实中，直到这种回忆被生活撕碎。而目前之所以没有被撕碎，恰恰说明当前的政治制度与历史上的制度仍然有联系。

其次，马克思对在野党的两个集团进行了分析：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的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

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

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武器一样。】

与秩序党对立的党是新山岳党，即社会民主派，它由两个集团即原来的工人派和小资产阶级派构成，因此既有原来的社会主义派色彩，又有原来的民主派色彩。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克思对秩序党的唯物主义分析同样适用于对在野党的分析：第一，正如秩序党的两个集团的起源并不说明它们的现状一样，社会民主派的起源也不说明它们的现状，这是因为在经历了以前由合法到非法的变化以后，适应了新形势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已经合法化，都与现状妥协，转化成改良主义政党了。第二，说新山岳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员出身小资产阶级或者他们以小资产阶级自居，而是它的主张最适合小资产阶级生存。第三，判断新山岳党同样不能根据它的成员说些什么，而要根据他们所要维护的利益。

1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下）

现在我们来看导致民主派失败的 6 月 13 日事件及其后果。现在内容比较多，需要大家保持耐心。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 6 月 13 日事件的过程：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对手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 5 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 54 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 5 月 8 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 月 12 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

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吹毛求疵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的一切重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第一自然段是对总的形势的分析。社会民主派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构成，“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1848年的6月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在街上不

占优势，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引诱社会民主派走上大街，舍长就短。

第二自然段讲社会民主派中计的过程。“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如果领导人上当仅仅是个别人素质不高，那么，“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就表明整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极其贫弱。而秩序党把党争置于保卫宪法之上，同样表明了他们的短见。于是，第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走上大街保卫宪法；第二，“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第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吹毛求疵的监管”；第四，“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经过这四步，社会民主派干净麻利地走向了失败。

第三自然段讲到巴黎六月十三日事件对法国全国的影响。由于里昂的斗争发展为工人起义，它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被宣布戒严。

第四自然段分析了社会民主派的内部分裂。第一，当领导者号称武力保卫宪法时，得到“山岳党全体一致”赞同，事到临头大多数山岳党人却“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第二，“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第三，小资产者群众“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露面

也是站在敌人立场上；第四，无产阶级传染了小资产阶级的懦弱，这一次也没有站出来（里昂除外）。总之，代表背叛了领袖，群众背叛了代表，而领袖、代表和群众相互指责。

其次，马克思对山岳党在六月十三日事件及其后的表现给出了评价：

【很少看到有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嚣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胜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 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真的想举行和平示威，那么没有预见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投入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误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自己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借口。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震耳欲聋的宣战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民主党人自以为完全超然于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而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没有吸引力，他们的力量是软弱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做自己的至宝；再不

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个细节使全盘皆输，或者是由于某个意外的偶然事件使这一次行动又被挫败了。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陷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理由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做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

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第一自然段讲山岳党策略上的失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有目标，无战略。他们不是靠正确的战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试图依靠奇迹。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改良？当然，两者并重也可以，但不能自相矛盾。而山岳党人的问题恰恰在于抱着侥幸心理去冒险，结果把事业葬送了。

第二自然段讲了山岳党对形势的错误认识和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有了正确的战略还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还需要了解实际的力量对比，以及如何改变这种对比以使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山岳党人对形势的认识极为抽象，即自己代表人民，而自己的对手秩序党则代表人民的敌人，而划分标准并不是利益上的对立，而仅仅是能否保卫宪法，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起作用的不是人民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而是宪法上的抽象词句！同样，由于意识不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山岳党人也不能有效掌握军事力量。他们唯一自豪的是自己纯洁无瑕，他们以为真善美不需要借助世间力量单凭自身就能获得胜利。

第三自然段讲了在议会中留下来的山岳党人代表的懦弱妥协。出于私心，他们为终于轮到自己有了出头之日而高兴。他们变得“更平庸、更温和”，更能为自己找借口了。这回他们不再提保卫宪法，而是后退一步，变成保卫普选权了（顺便说明一下，名义上的普选权将很快被废除）。

第四自然段讲了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代表如何只剩下摆姿态、吹牛皮。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尤其是在将要到来的同路易·波拿巴的斗争中对秩序党自身的损害：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这就是梯也尔所说的议会制共和国。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

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并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而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而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的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谈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讲坛和报刊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体现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看来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利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利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利浦就认定自己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

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有所降低了。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只剩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已经不得不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旦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

1849 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政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钳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休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期间照例经常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可怜的——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保皇派的各个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第一自然段讲六月十三日事件的最重要后果是宪法可以被违反，而议会多数的意见比宪法更重要。问题是当它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山岳党

代表的时候，它也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预示着议会代表的身份并不神圣。这样做实际上提高了总统的地位。因此当后来总统向它进攻的时候，它也就没有依靠了。

第二自然段山岳党代表由于攻击总统违反宪法而被镇压，因此客观上加强了总统的权力。而路易·波拿巴也抓住了秩序党无意中给他的这个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第三自然段讲秩序党巩固自己胜利成果的各种措施。

第四自然段和第五自然段讲秩序党如何利用六月十三日事件消灭山岳党人的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而这一点，在后来与路易·波拿巴斗争时，也被波拿巴用来作为削弱秩序党力量的手段。

第六自然段讲秩序党的失策：它只看到自己相对于山岳党人的胜利，没有看到自己下一个敌人即路易·波拿巴的力量已经更大地加强了。它放心地休会，让波拿巴利用机会去巩固自己的权力。

1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上）

正如第三篇围绕六月十三日事件展开，本篇是围绕废除普选权展开的。

在六月十三日事件后，民主派的领导人被清除出议会，其他民主派代表忍了，他们退一步说，只要还有普选权，我们就会有翻盘的希望。如果谁敢动一动普选权，我们就让他好看！

在本篇中可以看到，普选权果然使补选结果有利于民主派，但它果然就被废除。民主派能奋起反击吗？

由于民主派在上一篇已经正式战败，本篇马克思分析的重点是波拿巴派与秩序党的斗争。至于民主派与秩序党之间的斗争，已经沦为陪衬。所以本篇的导读分为三部分：（上）波拿巴对秩序党的第一步正式打击：废止秩序党内阁；（中）波拿巴为了对付民主派而与秩序党暂时妥协；（下）秩序党废除普选权。

现在我们先看波拿巴向秩序党进攻的第一枪：秩序党内阁的废止。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波拿巴废止秩序党内阁的过程及其意义：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份咨文，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被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像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在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给埃德加·奈伊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

抚恤金，却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年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来补充。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显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 50 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

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斗争的策略：没有直接向秩序党掌权的议会开刀，虽然他要称帝就必须这样做。他先向自己的秩序党内阁开刀了。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废止秩序党内阁削弱了议会中的执政党即秩序党。这表明波拿巴认为议会制内阁已经完成其消灭共和派（第二篇的主题）和民主派（第三篇的主题）的使命，现在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以便为他腾出位置了。

第三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这样做有充分的借口，因为内阁本身作为秩序党内阁从来没有把波拿巴放在心上，从来没有为波拿巴争取利益，反而给了他过多的污辱。

第四自然段讲的是议会制内阁的废止所具有的宪法意义：它表明行政权的加强。秩序党本来应当限制行政权，但行政权的加强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只要行政权掌握在秩序党手中，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宪法内的冲突就不会对资产阶级统治造成危害。但是秩序党一旦失去行政权，

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秩序党能否看到问题的实质呢？下面我们马上会看到：没有！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波拿巴是如何迷惑秩序党，从而使它做出错误判断的：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被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糟糕的是没有王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通过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

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做傻瓜的天才角色。他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还从来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建立新内阁，是为了他个人的经济利益。马克思首先说明，新内阁叫奥普尔内阁，并不是因为奥普尔当了总理，因为波拿巴废除了这个职位。奥普尔当的是陆军部长，称“奥普尔内阁”，实际上是鱼目混珠。关键是，波拿巴建立这个内阁是想把它由议会制内阁变为附属于总统的纯粹行政机构。这个内阁只有一个议会成员，担任财政部长，但他是为波拿巴捞钱服务的。另外一个关键位置是巴黎警察局长，波拿巴也任命了自己人。这样，他就把两个最重要的位置抓到自己手里。至于陆军部长等位置，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不过是波拿巴的工具和替罪羊。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如何迷惑议会。在吞下行政权这块大肥肉之后，波拿巴又退回去，装出一幅小羊羔的样子。他故意在全世界面前装傻，让秩序党放松警惕。

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议会果然上了波拿巴的当。

1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资产阶级的自私是如何让它一步步失去战胜波拿巴的机会的：它失去了农民，却未能有效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反倒是波拿巴试图贿赂军队、收买军心；但是，波拿巴又能掌握分寸，在1850年3月10日的议会补选中同秩序党站在一起反对民主派，从而再次缓和了矛盾。秩序党再次丧失机会。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议会是如何失去农民的：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中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宿敌耶稣会。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虽然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

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回应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省长；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立法议会的两个主要“成果”：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和废除宣传无神论思想的教育法。前者强化了对农民经济上的剥削，后者（“真正的生命之水”是指神学教育）强化了对农民精神上的压迫。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政治压迫与宗教的心灵压迫的结合。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秩序党的统治伎俩：把一切进步势力都打上“社会主义”标签。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

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做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做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做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

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采用了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的一招：简单化。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一律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给对手贴“社会主义标签”的历史理由：空想社会主义本来就来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激进化。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时候自以为代表全体人民，尽管实际上它有其自己独特的物质利益。而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胜利的成熟程度时，科学社会主义认识是不可能出现的。反过头来，资产阶级只要标榜自己代表普遍利益，它就无法从理论上彻底扼杀人民群众的反抗。

第三自然段讲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已经成为掌权时期的保守阶级。它走向的是启蒙思想的反面：启蒙思想根据理性国家、理性社会和永恒正义的理想逻辑，主张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而资产阶级却相信人性自私，根据“人对人像狼”的现实逻辑，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必然走向资产阶级专制。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议会在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方面的无能和波拿巴对下级的贿赂和对人民的欺骗：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 1850 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 1851 年

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国民议会只要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严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无非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还从来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各个成员的自私自利，只有在对付人民时，才能团结成为一个阶级，而在维护整个阶级利益时，却分崩离析。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利用人民对议会的不满，既对军队进行贿赂，又诱惑群众，让人们认为他有办法让大家过好日子，暗示是议会不让他这样做。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波拿巴同秩序党的妥协：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显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

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具有危险性，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 1850 年 3 月 10 日的补选。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被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 1848 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军队在巴黎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军队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像在巴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也比对手占有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 1849 年 1 月 29 日及 1849 年 6 月 13 日一样，1850 年 3 月 10 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们、贝里耶们、布罗伊们和摩莱们，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卫戍官们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

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 11 月 1 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为公诉人曾经在布尔日特别最高法院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再敢像巴罗什那样侮辱国民议会，而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以后，我们发现，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把它喝掉。】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国民议会本来被波拿巴气得要命，但 1850 年 3 月 10 日因为民主党派领导人被赶出议会后需要补选空出的议员席位，而不得不继续妥协，以防止民主派重新当选。这不仅是因为，秩序党人的统治得罪了人民，而且是因为，波拿巴虽然假装接近与人民的距离，但实际上害怕人民。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国民议会中缺乏真正的政治家，居然没有利用波拿巴让步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夺回内阁，而仅仅满足于往内阁中掺了一粒砂子。秩序党只想恶心一下波拿巴，出口恶气，而没有认识到政治斗争的要害在于持久的力量对比，而不在于一时的情绪宣泄。

1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下）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普选权被废除这一重大事件。

我们以前讲过，1848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在无阶级逼迫下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而无产阶级而把它当作社会共和国。这样，本来是资产阶级内部扩大政治权利的改良主义运动，就变成了赋予全民普选权的革命运动。即使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被镇压，即使小资产阶级遭到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被扫地出门，由于普选权被保留，看起来人民群众以后仍然有可能翻盘。只有废除普选权，把无产阶级心目中的“社会共和国”变为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才能安下心来。在1850年3月10日议会代表的补选中，刚刚失败的小资产阶级果然卷土重来，从而愈加使资产阶级感到废除普选权的紧迫性，本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民主派在议员补选过程中的失策：

【社会民主派这边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

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做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解（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节的愚弄。】

民主派的确获得了胜利，但它不是把选举胜利当作继续进行斗争的手段，而是把选举本身当成了目的。民主派的候选人维达尔同时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当选。正确的策略应当是由他出任巴黎议员，以便乘胜追击，展开对秩序党的斗争。但是民主派感到对巴黎选举形势的控制能力更强，为了确保能够同时得到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两个议员席位，居然让维达尔放弃巴黎选举而接受斯特拉斯堡的选举，以便在巴黎重新选举过程中推举出自己的另外一位代表欧仁·苏。虽然欧仁·苏确实当选，但这期间民主派忙于选举杂务，而给了资产阶级重新集合起来的余裕。巴黎的席位拿到了，但民主派不理解“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醉心于持续不断的选举，把群众拖得身心俱疲，从而在将要到来的斗争中失去热情，使实力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民主派的转化。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利用自己议会中的优势强行通过废除普选权法案的过程：

【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拟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这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最后，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来作证。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的新闻出版法。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活该。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同秩序党妥协后，由秩序党制定和提出废除普选权的法案，以打击民主派。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民主派的斗争。民主派曾号称以武力保卫宪法，失败后又号称以武力保卫普选权。现在轮到他们兑现第二个诺言了。民主派却生怕人家误会他们要使用暴力，拼命装出一幅彬彬有礼的样子进行抗争表演。结果不仅废除普选权的新选举法通过，而且限制他们的新闻自由的新的新闻出版法也通过了。

再次，马克思对普选权废除的过程和后果进行了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由此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多年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自行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动一动普选权，那就对他不客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

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9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一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普选权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200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000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

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斗争之所以失败，普选权之所以被废除，除了由于革命热情被民主派在补选过程中无谓地消耗掉这一直接原因，还由于其他深层原因：一是由于无产阶级满足于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政治后果；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胆小怕事，自我欺骗说到1852年5月选总统时他们还有机会；三是由于军队不愿意站在民主派一边。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普选权的废除使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因此表面上看，普选权的废除使秩序党的统治空前稳固，因为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似乎都已经交给它了。

从下一篇开始我们就要看到，秩序党的这一幻觉是如何逐步被波拿巴刺破的。

16-《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五（上）

如果说秩序党在议会中得到的都是表面的胜利，而波拿巴得到的都是实惠，那么，在普选权被废除后，就到了波拿巴兑现这些实惠的时候了。在本篇中我们会看到，波拿巴不仅要钱，而且要权，军权、组阁权他都要。他把议会耍弄于股掌之中，只待时机到来，就准备连议会的权力也收过来。

为了加快速度，本篇的导读也分为三部分：
（上）波拿巴的强硬进攻，要钱、收买、弄权；
（中）议会的软弱进攻，波拿巴的软肋被放过；
（下）斗争结果，波拿巴同时把军权和内阁组阁权收入囊中。

现在先看第一回合：波拿巴的强硬进攻，要钱、收买和弄权。

首先，波拿巴要到了钱，从而为以后的斗争准备了物质基础：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 60 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工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 60 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 6 月 13 日以后，波拿巴又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 5 月 31 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 300 万法郎的总统年俸。

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 300 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 300 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 300 万法郎。他是由 600 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从原则上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总统年俸，但同意一次性增发 216 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 3 月和 4 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 8 月 11 日到 11 月 11 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 28 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 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

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废除普选权后双方斗争的必然性。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以敲诈勒索的流氓手段索要每年300万法郎，议会只答应一次性给216万法郎。议会给了钱以后就休会了，只留下一个常任委员会代行职权。表面上看，这个常设委员会与去年（1849年）不同，去年有波拿巴分子参加，而今年（1850年）则没有波拿巴分子，因而议会似乎清楚地意识到敌我双方的关系。问题是常设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对付得了波拿巴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三自然段讲的是，议会休会期间双方有一些小冲突，过了休会期以后，看来双方要摊牌。

其次，马克思介绍了议会休会期间双方的第一个冲突——波拿巴巡游期间他的十二月十日会同议会及其成员的冲突：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

各省，并按照他所临幸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做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 1849 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

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1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做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扫除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做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

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之流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其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 1851 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还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中徒劳地劝他真正解散十二月十日会。】

在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为各个派别在全国各地搞内讧，而波拿巴则通过巡游为自己的未来拉选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利用自己建立的十二月十日会开展活动。这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才是波拿巴自己的组织，它充分暴露了波拿巴个人的阶级属性：他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个组织不仅用棍棒打了几个秩序党议员，而且被控告要谋杀议会议长和代表秩序党掌握首都军队的尚加尔涅将军。为了争取主动，在议会开会之前，波拿巴假装解散了十二月十日会。

再次，马克思介绍了波拿巴为了掌握军队而搞的又拉又打的把戏：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方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方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

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师和第十五师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

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 1852 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 1852 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是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

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 1852 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 2 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却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

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拉”，波拿巴试图用“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来贿赂军官和士兵们。

第二、三自然段讲的是“打”，波拿巴对不服从他的将军采取了由陆军部长出面强行调离的办法，逼迫该将领辞职。连英国记者都能够看出，这是狗咬狗。

第四、五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一边假装退让一边进行威胁的两面派手法。他让陆军部长做替罪羊，从而表示了同议会妥协的态度；同时按照宪法又表示军队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总统去管，议会不应越权，否则会破坏“安宁”，导致将来群众反对议会而支持他。相反，如果议会愿意就此止步，他也不会再进攻。

第六、七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表面上的礼貌所反映的实质上的傲慢，本来应当由议会以战斗姿态予以回击，但议会以往的做法已经成为波拿巴手里的把柄，因此议会屈辱地接受了波拿巴的和解建议。

所以，第一回合以波拿巴的完胜而告终。

1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五（中）

在这一部分，马克思要分析的是议会在向波拿巴进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

【直到 12 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波拿巴的进攻要改变的是力量对比，而议会在跟波拿巴斗争时只是想争得一点点特权。这就是议会在向波拿巴进攻时底气不足的根本原因。

第一个例子是议员的特权问题：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得知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后，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按照法律规定，欠债者要坐牢，但议会一方面在 12 月 28 日晚派法警把被司法部长和法院关进监狱的欠债议员放了出来，另一方面主张法院

关押议员应当事先征得议会同意，由此消灭了议员的不可侵犯特权。秩序党满脑子想的是这样做将来就可以把山岳党人关起来，却没有想到应当把总统的不可侵犯权也消灭掉。

第二个例子涉及保护议员人身安全的特权：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莱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予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警官伊雍揭露议会可能受到来自波拿巴的迫害，议会借机试图设立不归属于警察局长的议会警察。在内务部长的抗议下，议会妥协，答应在任免议会警官时议会总长必须事先征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而行政权却反扑过来，宣布伊雍捏造了证词，于是一方面把议会和伊雍嘲笑了一顿，另一方面要求把伊雍免职。尽管议会下设的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但议会却不敢得罪行政权，免了伊雍的职，从而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机会。

马克思对这两个例子作了评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 11 月和 12 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它不喜欢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

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斗争，因为它如果要斗争，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对抗，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糊涂了。】

马克思分析说，秩序党私心太重，特权小算盘又太多，以致作为人民代表却不敢发动人民为大是大非问题奋起斗争，只是满足于取得私人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波拿巴作为流氓头子却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骚扰战术，让人民对议会愈益不耐

烦。“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从而把群众的耐心彻底耗光了。

最后，当波拿巴自己把一个机会送到议会面前的时候，议会却轻易就放过了：

【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吸引力较大。波拿巴和他的

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 700 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 10 张、15 张以至 20 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与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在发行彩票问题上，波拿巴已经涉嫌犯罪，但是秩序党的议员们由于自己屁股上也不干净，所以当有议员质问时不敢大胆地追究波拿巴的责任，转入了日常议程，放过了波拿巴。

18-《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五（下）

现在我们将会看到：波拿巴是如何拿到军权，
又是如何独掌政权的。

首先是夺取军权：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反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把尚加尔涅免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颁发的一项紧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24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从未下过这个紧急命令。他还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

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只是由于波拿巴的封赏才持有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的其他英雄，更确切地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庄严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肯对国民议会直接调动

军队的权利提出疑问，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 286 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 1851 年 12 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一个类似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1 月 6 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1 月 12 日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

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把这些原则看做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相对于议会的长处：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而议会应对波拿巴下流手段的措施不多。他脸皮很厚，即使遭到点挫折也不在意。这样，在议会丧失了拿下波拿巴的几个宝贵机会之后，波拿巴由伪装防御转为公开反攻。他希望排除议会对军队的影响，完全掌握军权。办法是：免掉秩序党人尚加尔涅将军的职务，由自己人掌握全部军权。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找借口想免掉尚加尔涅的职务，尚加尔涅却得到了议会的支持。

第三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要求内阁撤换尚加尔涅，内阁五个部长不答应，波拿巴宣布内阁危机，准备解散内阁。秩序党本可以直接任命尚加尔涅为议长，这样就可以调动军队，但议会既不敢跟波拿巴正面对抗，又没有把握在议会得到多数票，只好上门规劝波拿巴收回成命，从而给波拿巴增加了勇气。波拿巴换成新内阁，然后撤掉了尚加尔涅。

第四段是马克思对波拿巴撤尚加尔涅的职所作的评论：议会已经丧失了同波拿巴对抗的实力。

其次是波拿巴试图控制内阁，而议会拒绝他的企图：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未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

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

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当做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做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做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报道说，《通报》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

占据多数(这一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文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起来,否决了给予总统180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名山岳党人联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做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派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

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了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较好，找不到心怀不满的群众可以利用，由于在议会中得不到多数票的支持，秩序党对尚加尔涅被撤职无能为力，没有逼迫波拿巴恢复尚加尔涅职务。它试图采取的种种措施，除了表达泄愤的态度外，实际上于事无补。它能做到的只是：通过了对新内阁的不信任案。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即使是仅仅是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秩序党也需要依靠原来的反对派，才能获得议会的多数。这表明自私自利的秩序党徒连议会也不能独掌了。他们不得让自己的利益支配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让自己的自我定位来支配自己。

第三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悔不当初，由于它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毅力，现在又丧失了稳定的多数，因此本来应当是对波拿巴的惩罚，却落到了内阁头上。它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根本构不成对波拿巴的打击。波拿巴借口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单纯构成议会的多数，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等待时机的到来。

第四自然段讲的是，由于行政权不断以群众不满的苗头或想象中的动乱来威胁秩序党，秩序党不敢利用议会外的阶级斗争对波拿巴展开坚决的斗争，而只是在波拿巴要钱的时候予以拒绝。但即使在这一点上，它所得到的票数也下降了 27 票（与对内阁不信任案的 415 对 286 时相差 129 票相比）。

再次是波拿巴以过渡内阁的形式拖延待变，直到形势对他有利，终于组成了完全由自己人构成的内阁：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 4 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为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为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资产阶级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

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上万的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曾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做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以致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被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

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目的决斗看做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做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拖延待变的把戏：故意利用议会的内部矛盾，把内阁成员换来换去，让各政党为几个内阁成员身份展开狗咬狗的斗争，以分化议会内的各党派。同时利用不断下降的经济形势威胁议会，最终迫使议会妥协，在被不信任案否决的原内阁只是增加了一个非秩序党成员后，接受了这个“新”内阁。

第二自然段概括了波拿巴把议会制内阁逐渐变为总统制内阁的过程：从非议会制内阁到超议会制内阁，最后到反议会制内阁。此后波拿巴发动政变的蛛丝马迹不断暴露，但议会根本不把这个小丑放在心里。马克思由此回应了前文所说的法国像一个对奸徒不设防的女人的比喻。

19-《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六（上）

本篇的核心是波拿巴的政变，马克思以 1851 年 10 月 9 日为界，分为两个小时期。为了导读方便，我们仍然分为三部分，即：（上）修改宪法的企图及其失败；（中）国民议会休会期间的斗争；（下）波拿巴政变。

现在先看第一部分：围绕修改宪法展开的斗争。

马克思先分析了各派从修改宪法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以及由此造成的分歧：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日历的无情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 5 月 28 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 月 28 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

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修改宪法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成了“厄里斯的金苹果”。按，厄里斯的金苹果来自希腊神话，它指的是造成不和的因素（感兴趣者请自己百度）。由于第一届立法议会和总统任期将满，宪法的修改或不修改必然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它就像一块扔到一群野狗中的骨头，必然引起纷争。

比较容易分析的是波拿巴派和共和派，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 45 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的。】

马克思在前文曾经对宪法作过分析：它只是规范了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总统不能连任，行政权受到严重的限制，以致波拿巴要连任就只能搞政变。所以波拿巴明确希望修改宪法。相反，共和派反对修改宪法，而且当初已经规定修宪需要四分之三票通过，而共和派尽

管已经失势，但现在在立法议会的票数仍然超过四分之一，因此能够确保宪法不会被修改。

比较难分析的是秩序党，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处境——无论是赞成修改，还是不赞成修改，都会使一部分秩序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和这些明确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威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威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威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自己的投票是枉然的，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宣布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有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还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

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 1849 年、1850 年和 1851 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时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配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一再认可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加以考虑）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君主国曾轮流优先代表的那些利益之间的竞争，复活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

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这个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在废除两个君主国的情况下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同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不会因此就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是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突出地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尝试，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尝试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的迷信暗送秋波，这种尝试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做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在他全家

族的支持下”，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获得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 100 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通向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对七月革命的悔恨，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做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

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尝试，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和解越是近于破裂，支持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

争吵。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人所处的自相矛盾境地：不改不好，这等于逼波拿巴政变，但秩序党认为政变的结果将使它的利益受到损害；改也不好，因为如果要改：第一，由于它不能掌握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票，注定要被共和派所否决；要想靠简单多数票修改，又必须运用武力制服共和派，而这就等于过于强化波拿巴的力量；第二，即使修改，要大改还是小改，也难以确定，因为如果小改，只是延长总统权力，等于为波拿巴建立帝制创造条件；如果大改，为秩序党创造条件，又怕秩序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活动死灰复燃，因为两派都想让自己的旧日主子上台。

第二、三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为避免内部纷争，最好的办法是维持议会制共和国，因此他们已经一再拒绝把旧日主子迎回国内。

第四、五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中的一部分人做的另一方面的准备工作：试图把两个王朝融合起来。但这种融合并未发生效果，只是让议会中原来的一致性遭到破坏。

第六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不仅两部分之间不对付，每一部分又分为不同部分，相互争斗。

最后，马克思介绍了修改宪法的活动的失败：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

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所领导的那些疲于斗争的奥尔良派；这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对宪法进行修改，目的在于把国民主权的完整行使权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明支持议会的少数，表明议会少数的决议是具有约束力的。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不是曾经使宪法服从议会多数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而宪法表明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

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不依靠多数”的统治；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只要它本身还继续存在，宪法就不可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可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而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效劳；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因此，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拟订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在这个紧急关头

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第一、二、三自然段讲修改宪法的派别提出的建议在7月19日被以446票对278票否决。

第四段分析了修改宪法的议案被否决的意义：多数派反对原宪法，却不能修改它，表明议会少数派的意见具有约束力。反过头来，既然修改宪法能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因此波拿巴撕毁宪法是合乎议会（多数派）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从而站在少数派一边时），他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怎么会这样子呢？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原来分析过的宪法的自相矛盾。（但自相矛盾的不仅是宪法，还有秩序党）。

第五自然段讲的是秩序党自身的自相矛盾使它失去行动能力，最终只能随波逐流。

2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六（中）

波拿巴是流氓无产者的代表，他眼里只有自己。在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点上，波拿巴与资产者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为了他们的私利，资产者逐渐背叛了他们在议会和著作界的代表，聚集到波拿巴门下。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对它的代表的责备：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狂热，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固守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无论是外省的正统派，还是商业资产阶级，都只从自己阶层的短期利益看问题，而不能从整个阶级整体的长远利益看问题。

其次，马克思分别分析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待议会、报刊和无产阶级的态度。

第一，工商业资产阶级对议会的态度：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態度，他們的歐洲機關刊物即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中的一段話作了最貼切的說明。這個雜誌在 1851 年 2 月 1 日那一期上發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訊：

“現在我們從各方面都得到證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總統在他致立法議會的咨文中聲明了這一點；國民講台上也有人響應了這一點；報紙上再三重復說到這一點；教堂的教壇上也宣揚這一點；國債券對於最小的破壞安寧的事件的敏感及其在行政權每次獲勝時的穩定，也證明這一點。”

《經濟學家》雜誌在 1851 年 11 月 29 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義宣稱：

“在歐洲所有的證券交易所中，總統現在已被公認為秩序的衛士。”

可見金融貴族指責秩序黨對行政權進行的議會鬥爭是破壞秩序，而把總統對秩序黨那些所謂的代表的勝利當做秩序的勝利來歡呼。這裡所說的金融貴族，應當理解為不只是那些國債的大債權人 and 大投機者，這些人的利益當然是和國家

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公共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债债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债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国债同旧国家一齐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对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争吵不休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

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 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激烈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 1851 年 2 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景气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政体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做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没有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 8 月 25 日起先后召开会议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

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工商业资产阶级认识到，资本赚钱需要一个稳定的秩序，因此他们就为了这个秩序而不惜牺牲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商业资产阶级，还是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稳定，宁愿要波拿巴的统治。第一至五自然段讲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态度；第六自然段讲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态度；第七、八、九自然段讲的是他们共同的态度。

第二，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报刊的态度：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刊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以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宁而自己也得安宁，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破坏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讲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

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可见，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要求代表们与自己的短期利益保持一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这样。

第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怨愤：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战斗！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而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却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共鸣。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经济学家》杂志。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到1851年12月27日，当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

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而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连它的代表都可以放弃和背叛，却对无产阶级追求自身利益表示愤慨，并为因此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发出哀叫。在他们眼里，它可以自私自利，无产阶级却不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 1851 年“小小的商业危机”如何使资产阶级怨天尤人的态度变本加厉：

【的确，法国在 1851 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 月底，出口比 1850 年减少了；3 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 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 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 月 28 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仍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 10 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政体的不稳定，由于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 10 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

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而在英国则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生产过剩的两个年头，这种生产过剩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生产过剩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平均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生产过剩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完工业循环

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每次在工业循环中都会造成的那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 1851 年的年度商业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人们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 25 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以恐怖告终！”】

第一自然段是马克思对危机原因的分析；第二自然段则表明资产阶级在分析危机原因时的无能；第三自然段讲危机如何使资产阶级抓狂和失去理智。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波拿巴的冒险行为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债权人急躁情绪的日益增长，使得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这些债权人发觉，每当太阳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临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行在反对他们的人间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

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同，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欢聚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所欲言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利剑出鞘，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相片一样已染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现在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

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满脑子都是这个观念，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当这个政变终于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里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证实自己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总统任职结束日期日益逼近，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波拿巴都无法再优哉游哉。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波拿巴从一上台就有政变的打算，而且他的打算众所周知，只是他过于软弱，长期不敢行动，以致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过过嘴瘾。

第三自然段讲的是形势逼迫波拿巴做出选择，他于是在议会休会期间开始为政变做准备。

2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六（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议会复会后，路易·波拿巴是如何从要求恢复普选权到发动政变的？

首先是关于恢复普选权的斗争：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的斗争中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把纯系摆样子的托里尼内阁当做完备的内阁接受下来，以此来庄严地承认这个失败。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一个这么软弱的内阁竟要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都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 1850 年 5 月 31 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一项以此为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 11 月 13 日以 355 票对 348 票否决了这个法令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

议会虽然不得不接受了它所认为软弱无比的内阁，但当波拿巴通过内阁要求恢复普选权时，议会（以微弱多数）否决了波拿巴的要求，从而逼迫波拿巴朝政变路上再走一步。

其次是议会无力自救，也无力对付来自对秩序党的攻击：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提出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 and 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确认，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力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最低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

了通过决议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议会总务官希望议会有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议会否决；当有人向秩序党进攻时，议会却否决不了，说明议会“丧失了通过决议的能力”，“它已经死了”。

再次是波拿巴验证资产阶级群众对议会的背叛和对自己的支持：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在9月15日巴黎的新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波拿巴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女渔贩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女渔贩的实际力量等于17个卫戍官）；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博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

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躬屈膝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

议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权力，总统却试图贿赂资产阶级群众，让他们支持自己。资产阶级群众果然上当了。

最后，马克思介绍了波拿巴政变的过程，然后对二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共和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作了概括：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

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 2500 万法郎，用 100 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 15 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地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到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I. 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起到 5 月 4 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II.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同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III.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 从 1851 年 4 月 11 日起到 10 月 9 日止。尝试修改宪法，企图实现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 从 1851 年 10 月 9 日起到 12 月 2 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从下一次开始，我们看马克思的总评价。

2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七（上）

本篇是马克思的总评价部分。考虑到其完整性，这里把马克思 1852 年版的原文以斜体字放在正文中（在《文集》中是作为脚注）。

本篇也将分三次导读：（上）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期间的政体演变，均有其相应的阶级或经济社会基础；（中）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是法国的小农；（下）波拿巴政权自相矛盾的根源及其意义。

马克思首先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角度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意义：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 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 1851 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社会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失败了，而议会制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覆灭，同样，纯粹的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也已经覆灭。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

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一切运动，它自己的一切社会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

这个二难推理。无须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现在的法国采用了议会制共和国这一成熟的形式。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奥尔良王朝和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当政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到1851年12月2日才达到这个目标。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大量财产，即它的影响的物质基础，被没收了。二月革命后人们所期待的，在12月以后出现了，自1830年以来那些以自己的大喊大叫弄得法国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撤职、放逐、缴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执政的，只是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别形成一个王朝反对派和一个共和主义反对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谓合法国土之外。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把商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吸收到它的国家范围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商业资产阶级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只有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让七月王朝和正统王朝联姻并把财产统治的两个时期合而为一。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阶级的享有特权的部分将其统治隐匿于王冠之下；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在联合了它的所有的构成部分并把它的帝国扩展为它的阶级的帝国之后，赤裸裸地露出头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广泛、最普遍、最彻底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直到这时才执行了2月宣布的对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即法国资产阶级中最有生命力的派别的判决。它的议会、律师协会、商业法庭、地方代议机关、公证处、大学、讲坛和法庭、报刊和书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诉讼费、军饷和国债，它的精神和肉体都被击溃了。布朗基把解散资产阶级自卫军作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曾经在2月阻挡过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在12月从舞台上消失了，万神庙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经把资产阶级制度的18世纪的发起人神圣化的魔法也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后形式一起破灭了。当基佐得知12月2日的政变成功时，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efinitive du Socialisme!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而完全的灭亡。

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拯救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大家认真读一下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要把1852年版的原文恢复出来。虽然保留下来可能有所重复，但与其删除它们避免重复，我认为恢复原状更有利于把握整部著作的线索。

第一自然段中讲的“社会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分别涉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地产与金融资产阶级，因而既涉及国体、又涉及政体。

第二自然段的“劳动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划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划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把金融贵族认作流氓无产阶级在上层的对应物。从这一段看来，只有流氓无产阶级能够制服它的对应物。

第三自然段是对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政权的分析：哥萨克式的共和国。其中“瑟西的魔法”来自古希腊神话，瑟西是个女巫，能够随意把周围的人和东西变成其他怪物。马克思分析了这个怪物的形成过程，指出它已经是资产阶级政体轮替的一个极端，到了自我否定的前夜。

第四自然段讲二月革命就其自然历史进程来说，本来应当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社会共和国，因为建立社会共和国的条件还不具备。资产阶级共和国果然建立了，但它却把自己的一切合理性破坏殆尽。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露出了阶级专政的本来面目，而且被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所取代。

第五自然段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二月革命拯救了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此时为什么不出来拯救资产阶级呢？或者说，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反对它的最可恶的敌人——流氓无产阶级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从而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来反对国民自卫军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这样，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只是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

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的权力。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掘得好，老田鼠！】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统治的颠覆包括立法权的颠覆和行政权的颠覆两个方面。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完成这两步颠覆的任务。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无产阶级不能再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

第二、三自然段讲的是资产阶级唆使无产阶级为它斗争，自己却躲在后面。由于波拿巴事先已经通过突然袭击使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人，所以对资产阶级的背叛记忆犹新的无产阶级只能听任自己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秘密团体）去作牺牲。

第四、五自然段讲的是议会制共和国的颠覆只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头一半，后一半是推翻行政权。

然后，马克思对法国的官僚政权作出了精彩的分析：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 50 万人的官吏大军和 50 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的任务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

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这时它的首脑不再需要天赋，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

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个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以为法国争自由作为借口，那么第二个波拿巴已不再可能以让法国受奴役作为借口。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第一、二自然段分析了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器的形成过程，说明它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作用。

第三、四自然段讲，表面上看，波拿巴的专制政权似乎没有阶级基础，完全独立于社会，因而违背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实际上它的阶级基础最为广阔、人数最多，因为波拿巴除了直接依靠流氓无产阶级之外，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民。

下一次我们就来看马克思对农民的阶级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以及把唯物史观应用于落后国家社会分析的典范。

2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七（中）

现在要分析的是作为专制制度基础的农民。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长期处于专制制度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分析”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王朝循环的经济基础恰恰在于小农经济的一再破坏和一再重建。要超越这种专制制度就必须超越小农经济。由此，对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就显露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公有制的作用愈加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小农经济如何成为波拿巴王朝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分两点来说明：第一，小农的分散孤立状态天然适合专制政体。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辜负了农民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

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议会，国家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

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而且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的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第一自然段一上来就是一句惊人的话：“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这里的“人民群众”构成了专制制度的基础，它渴望帝制复辟。可见在还存在大量农民的国家里，“人民群众”渴望专制制度是很自然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体呢？联想到中国，我们可不可以说，如果拿破仑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帝制，中国古代是一种封建帝制？

第二自然段讲小农渴望帝制的原因：交往关系的缺乏使得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让上天即皇帝代表自己。所以，无论是“行政权支配社会”，还是“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议会，国家支配社会”，对于理解中国从秦朝到清朝的专制制度来说，都给研究者以醍醐灌顶之感。

第三自然段讲农民迷信拿破仑，盼望上天再次降下一个拿破仑，于是波拿巴就来冒充了。波拿巴的成功恰恰在于他的“固定观念”与农民对于拿破仑的“固定观念”的一致。

第二，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他讲波拿巴代表农民，指的是代表落后的农民，而不是指代表觉悟的农民：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从路易十四时起，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

议会制共和国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以教师和教士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打垮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

这表现在镇长和省长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投票表决。1848 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把选票投给波拿巴。在他们看来，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现在只是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在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二自然段是别人对马克思观点的可能反驳：有些农民并不支持波拿巴，反而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镇压。

第三、四、五自然段讲农民也分普通农民和觉悟了的农民，波拿巴镇压的是觉悟农民，在这一点上波拿巴与资产阶级是一致的。

在分析了波拿巴政权的经济基础之后，马克思分析了由这种基础所决定的“拿破仑观念”。第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保障小农经济或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法律：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马克思指出：这个“拿破仑观念”在十九世纪初是农民解放的条件，但到二月革命以后已经成为农民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根源了。但是波拿巴和农民都认识不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二个“拿破仑观念”是专制制度的观念：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在 1852 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几句话：“对农民阶级实行优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新造就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全面伸延，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在 1852 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一句话：“如果说它首先受到优待，那么它也首先为封建领主的复辟提供了进攻点。”）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 19 世纪的进程中，封建领主已被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被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被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600 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对它尽量加以

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由此可见，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这种“物质制度”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一句话，它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础。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均质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均质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均质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无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

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做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在 1852 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赋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能力。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千薪的新官职。】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一开始小农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导致失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这使农民把城市无产阶级视为自己天然的同盟者，但专制政府却要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专制政府依靠赋税制度养活，在资产阶级革命早期这种赋税负担可以被拿破仑弥补，但波拿巴却没有这种能力。

第三个“拿破仑观念”是肉体和精神上的警察国家的观念：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刚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做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和拿破仑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监视农民体制在城市里的敌人，而是监视波拿巴在农村里的敌人。”）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正好相反。】

精神统治和肉体统治相互补充。

第四个“拿破仑观念”是军人的荣誉观念：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

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顶替者，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顶替者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勤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的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荣誉，而是遭到痛打了。】

由于军人的来源由保卫自己财产的自耕农变成了流氓无产者，这个拿破仑观念也要破灭了。

马克思概括了所有“拿破仑观念”对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依赖作用：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

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在 1852 年版中没有最后这两句话，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这里表现出马克思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思想：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建筑在其上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也必将瓦解。

最后，马克思明确对唯物史观关于农民土地私有制与其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解答了前面的问题：

【12 月 20 日和 21 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在 1852 年版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2 月 20 日和 21 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和执行法律。的确，法兰西

民族在那些灾难的日子里犯了反对民主主义的滔天大罪。民主主义跪倒在地，每天祷告：神圣的普选权，求您帮帮我们！普选权的信奉者自然不愿意放弃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成就大业，可以把第二个波拿巴变成拿破仑，把扫罗变成保罗，把西门变成彼得。国民精神通过选票箱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以西结对枯干的骸骨说话：‘Haec dicit dominus duos ossibus suis: Ecce, ego intromittam invos Spiritum et vivetis.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分析正好可以用来研究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的中国社会。遗憾的是人们却都忽视了。学者们以为可以用马克思对封建社会的分析来研究两千年的中国，这是一个可悲的误会。

2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七（下）

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分析了波拿巴政变以后的做法，并对他可能称帝的后果做了预言。

首先，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政变是资产阶级应得的报应：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彼得·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资产阶级只配有波拿巴这样的统治者。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波拿巴的自相矛盾：

【波拿巴作为行政权的自主的力量，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

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针对资产阶级，自命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在1852年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话：“因此，这些互相矛盾的行动的匆忙和草率，应该模仿皇帝的面面俱到和善于应对。”）】

拿破仑代表上升时期、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波拿巴要在资产阶级

掌权、成为保守阶级的情况下假扮拿破仑，只能导致自相矛盾。

再次，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尽管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却缺乏执政能力：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又没有建筑铁路的资本。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要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要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安排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半，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兴旺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要有抵押银行，以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从不从一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

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用于收买的设施。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润。莫尔尼先生的情妇 L. 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vol 有“飞翔”和“盗窃”两个意思）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更像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

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缀有标志级别的金银边饰的制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韦隆—克勒维尔（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韦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总是给他如下的赞语：“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家族拿来跟摄政时期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对比，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

天上不会掉馅饼。波拿巴既不会做蛋糕，又不会分蛋糕。雪上加霜的是，波拿巴集团还总想趁掌握分蛋糕权力的机会自己多偷一块。

最后，马克思预言了波拿巴的下场：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同时又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不断翻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他这个拿破仑的顶替者身上，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每天发动小型政变，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混乱状态，

侵犯一切在 1848 年革命中显得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容忍革命而使另一些人欢迎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的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的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

为了保持自己统治，波拿巴只有继续模仿拿破仑。但他不是拿破仑，结果只是打破了人们对拿破仑的迷信。马克思甚至预言：如果波拿巴称帝，人们就会推倒凯旋柱上拿破仑的铜像。这一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

人们不是问马克思的理论是否可证实吗？这就是一例！

《法兰西内战》导读

01-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笔记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活动的各种材料，并建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全体会员的宣言。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马克思于1871年4月18日后着手起草这一宣言，一直持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从5月6日起开始定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是用英文写的，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前后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同年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增加了《附录》的第二部分。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佛拉芒文、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文、丹麦文和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的法文版，马克思校订了译文，作了大量修改，并重新翻译了某些段落。

这部著作 1871 年由恩格斯译成德文出版。1876 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再版了《法兰西内战》的德文本。1891 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为纪念巴黎公社 20 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一并收入这一版。此后在《法兰西内战》的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均收有这两篇宣言。

恩格斯在为 1891 年《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阐明了马克思在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公社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

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充分肯定巴黎公社作为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一、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二、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三、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四、司法机关的官吏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取代；五、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

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任务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他指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

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还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强调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

02-《法兰西内战》1891 年德文版导言导读

(一)

《文集》中文编者说明：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在 1891 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而写的。最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本人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 1890—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28 期上。发表时，编辑部把原稿最后一段中“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理·费舍 1891 年 3 月 17 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同意编辑部对原稿作任意改动，但是，大概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不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仍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卷恢复了恩格斯原稿的用语。】

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自己被恩格斯称为“庸人”，呵呵。问题是，恩格斯妥协了，社会民主党人就不是庸人了？还不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

下面是恩格斯导言的正文部分。由于恩格斯延续了一贯的简洁明快的风格，没有多少难懂之处，因此除了个别作为强调的揭示外，我们的导读不作过多的说明。

现在先导读前半部分：恩格斯对事件本身的回顾。

恩格斯首先说明了为什么他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与《法兰西内战》相关的两篇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加上的原因：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 20 年的俾斯麦统治？对蛊惑者的迫害不是换成了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兼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兼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 20 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 1 500 万或 2 000 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 1870 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这里涉及三点：

第一，《法兰西内战》中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以第一篇宣言作为自己的背景；

第二，两篇宣言都体现了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预测才能，表明了马克思分析的科学性；

第三，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些后果至今仍然在德国存在，因而对于正确理解这些事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恩格斯具体分析了两篇宣言的预测及其应验的情况。

其次，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作了评价，指出它同两篇宣言一样，具有极强的科学价值：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法兰西内战》的历史背景：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

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 1848 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走在前面。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 1830 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利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 1848 年的六月起义。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

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 1871 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 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狭窄、畏缩不前的体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麋集

在皇帝宫廷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 1814 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 1815 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 1866 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 1870 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

这些分析极为简洁，可以视为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来的事件的概括：

第一，恩格斯概括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点：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无产阶级虽然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对自己解放条件的认识始终没有上升到科学层面；

第二，1848年革命与以前相比，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但无产阶级并没有理解这一自发口号的意义；

第三，随着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失败，失去了人民群众支持的资产阶级也失去了政权，但在与其臭味相投的流氓和冒险家政权统治下，资产阶级经济上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四，资产阶级和冒险家的经济与政治结合必然导致法国沙文主义的膨胀，普法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战争中战败，成为《法兰西内战》的背景。

最后，恩格斯简洁地概括了巴黎革命的过程：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由于这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人民就更欣然地同意组成这样的政府。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

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引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 1871 年 1 月 28 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战斗团和别动队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 131 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 月 18 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

开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做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 000法郎（4 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压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

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种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

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天，梯也尔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及其他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5月3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主墙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由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美尼尔芒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

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服从时，往往装做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由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几乎每一句话中都塞进了许多内容，因此读起来较为吃力。相比之下，恩格斯的这几段话省略了所有的枝枝杈杈，给出了一个简单明晰的轮廓。因此，建议在正式阅读《法兰西内战》的正文之前，把这几段彻底搞熟，会大大提高阅读《法兰西内战》正文的效率。

03-《法兰西内战》1891 年德文版导言导读

(二)

在导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试图运用“从后思索”的方法，分析无产阶级如何由自发上升到自觉：

【如果我们现在在过了 20 年之后来回顾一下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首先，他回顾了巴黎公社起义中无产阶级的成长过程：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

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的嘲弄。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比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适用（见《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

其实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规定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

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 1798 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当时公社委员分为两派，即多数派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两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者角度看来本来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他们却看不到，比如蒲鲁东派应当对经济负责，但他们却不了解法兰西银行由公社掌握的重要性；同样，布朗基派应当对政治负责，但他们在

巴黎不自觉地采取正确的政治行动的同时，却没有意识到在巴黎之外也需要这样做。

不过，无论是布朗基派还是蒲鲁东派，在革命中都抛掉了自己的一些错误观点和主张，在很多时候不自觉地站到了“马克思派”的立场上。这正说明了无产阶级会在革命斗争中学会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马克思主义既然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那么它必然会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逐渐站稳脚跟。

其次，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成就在德国的现实意义作了强调：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们”

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

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

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持，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们习惯于歪曲恩格斯的观点，故意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等晚年著作对立起来，把恩格斯说成他所反对的“社会

民主党的庸人”。岂不知情况正好相反。恩格斯分析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国体和政体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的区别。他概括得尽管很简明，但对于从历史上分析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社会的国家机关如何“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关于“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的表述，恰恰表明了旧的国体中，任何政体都无法避免其内在的腐化堕落；相反，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新的国体代表“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恩格斯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未能摆脱德国人“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其实当今时代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对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又何尝不是如此？

与此同时，恩格斯也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最终形态，而只是一个过渡，“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为止。

04-《法兰西内战》第一部分导读（一）：卖国政府

《法兰西内战》一共分为四部分。从现在开始，我们分三次来导读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讲的是：波拿巴投降后成立共和国，但政府的权力被卖国者窃取。全世界资产者是一家，法国卖国政府一开始就把本国无产阶级视为真正的敌人。

可以分三个大段落来导读这一部分。

第一个大段落讲的是，形势比人强，共和国权力一开始就被一帮投机分子窃取：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的混乱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

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波拿巴政府投降以后，共和国成立本来是为了保卫祖国，所以如果它也像波拿巴一样投降，那就不必成立了。成立共和国是人民的心愿，但是，由于他们的领袖还关在监狱里，权力就被一帮投机分子窃取了。这帮投机分子本是过时的巴黎议员，但只有他们的面孔人民还比较熟悉。他们利用这一点掌握了巴黎政权，而在一团混乱中，掌握了首都的政权，也就被容忍让他们去代表法国了。问题是，这个国防政府却害怕群众特别是巴黎工人武装起来，因此，一开始他们恐惧巴黎工人阶级就甚于恐惧普鲁士军队。“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他们的阶级本能让它们自动地做出了选择：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第二个大段落分为五个自然段，讲的是卖国政府一开始就打定了投降的主意，国防不过是个幌子：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

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 9 月 4 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之流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 9 月 4 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 9 月 5 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

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

第一、二、三自然段揭露了卖国政府的真相：国防政府的政客们一开始就不想要共和国，而是想要王国，因而他们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敌人。虽然投降的打算是巴黎被围4个月以后才公布的，但国防政府的将军特罗胥从共和国一成立，就抱定了投降的打算。第四、五自然段揭露的是国防政府对群众的欺骗，以及为了掩盖真相而不惜把巴黎投入血泊的动机。

第三个大段落的五个自然段起底了国防政府中一些主要成员的身世背景：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职位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

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 1867 年 7 月 31 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 5 号）经理时盗用 30 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 1868 年 12 月 11 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证券投机商，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 9 月 4 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份千方百计地利用饥谨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之日，就是他受制裁之时。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国防政府的主要成员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等，都是些什么货色？2、3、4 自然段回答的就是这样的问题。第 1 段和第 5 段说明的是，正由于他们是这样的一帮流氓无赖，才为俾斯麦所需要，才能成为卖国政府的成员。

其中第三段中的“约·密勒”，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是“卡尔·福格特”，在 1871 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这是为了让不同国家的

人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人物形象有一个准确的代入感。

05-《法兰西内战》第一部分导读（二）：梯也尔

现在是第一部分的第2次导读，我们来看马克思如何介绍法国卖国政府的头目梯也尔。

这一次导读也分为三个大段落。

第一个大段落有五个自然段：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圣日耳曼奥塞鲁瓦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的杰作。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纯系议会语言〉。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仅限于48小时而已。】

第一、二个自然段除了概括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本质外，还点出了他的“说谎才能”。马克思举出了梯也尔关于建筑巴黎防御工事方面的谎言。

三、四、五自然段进一步说明他的反复无常。唯一不变的是，他彻底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做起镇压人民的事来毫不犹豫。

第二个大段落有四个自然段：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懣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利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成为他们泄愤的对象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隐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刽子手对

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做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做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 1840 年的伦敦公约到 1871 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赶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成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利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

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 1840 年 3 月 1 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他也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 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 1869 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昔日在 1830 年的众议院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这一个大段落讲的是梯也尔的投机本质：所有言行都变来变去，唯有自私自利和维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的本能始终不变。一、二自然段讲他预感到革命将要发生，想趁机上台捞一把；第三自然段讲人民革命爆发，把他吓得躲起来，

当革命遭到镇压的时候他又跑出来。对任何人、任何政策，他都是从私人利益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加以衡量。第四自然段借一位巴黎公社委员的话对梯也尔的阶级本质作了揭露。

第三个大段落只有一个自然段：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自吹自擂之可笑衬托出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在这一段中，马克思对梯也尔其人作了概括。字里行间体现出马克思对梯也尔的厌恶。其中，“侏儒”“矮子”表面上涉嫌人身攻击，但联系到这些词的双关含义，即梯也尔品格的矮小，实际上恰如其分。

06-《法兰西内战》第一部分导读（三）：议会与

巴黎

现在导读第一部分的第三个小节，介绍卖国的议会。也分为三个大段落。

第一个大段落介绍议会的建立：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投降书中的一项条款明确规定，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由它来签订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

复活起来。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在现代法兰西组阁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来说，

“一向只依靠三种资源：外敌入侵、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法国资产阶级对外卖国，对内镇压，但从手续上、程序上来说，政府所做的决定还要通过议会来认可。于是卖国政府与普鲁士达成协议，尽可能也选出一个卖国的议会，时间紧迫，人民无奈，正统派又趁波拿巴派衰落，积极活动，窃取了这个议会的大多数议席。

第二个大段落说明议会为什么也反对巴黎：

【当这个“乡绅议会”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

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 50 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 50 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 5% 的利息。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进行疯狂的“乡绅议会”反共和国示威活动，而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凯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 9 月 4 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

子维努瓦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议会接受了政府的要求，不仅由于它们是一丘之貉，而且由于它们利益的一致，都想把德国要求的赔款转嫁给人民群众，但是工人阶级掌权下的巴黎代表的恰恰是人民群众，因此无论是从巴黎本身来说，还是从它所代表的力量来说，都必须把巴黎镇压下去。于是议会和政府勾结起来，通过了一系列强化反动势力、镇压人民群众的措施。

第三个大段落提供了一个统治阶级把卖国和镇压结合起来的证据：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凯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笔为数 20 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1) 据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佣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凯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 据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

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揭露的是，国防政府的巨额贷款很大一部分用来让官员们中饱私囊，而且整笔贷款要以对巴黎的镇压作为条件。国防政府甚至要求普鲁士军队帮他们占领巴黎，但他们的打算落空了。普鲁士与法国国防政府的勾结是强盗之间的勾结，而不是兄弟之间的团结，俾斯麦不可能为法国统治者火中取栗。

07-《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导读（一）

在第一部分，马克思介绍了反动政府借人民的力量特别是借巴黎无产阶级的力量掌握了政权，但它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的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政策，为此就必须彻底消灭巴黎的革命武装。在第二部分，马克思将介绍反动政府解除巴黎武装、消灭巴黎无产阶级的过程。同第一部分一样，我们也将分为三小节导读。

现在导读第一小节。

马克思首先介绍了反动政府解除巴黎武装的借口：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亮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画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

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蹩脚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府，还是议会，都把解除巴黎武装作为首要任务。为此，梯也尔甚至把巴黎交到波拿巴分子手里。但梯也尔找不到解除巴黎武装的借口，只能编造谎言，说什么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逼巴黎工人交出大炮。马克思用事实对谎言做了反驳。

其次，马克思说明在外敌当前的时期巴黎工人阶级并不想同政府和议会对抗：

【夺取大炮显然正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还以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是唯一合法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

会就得立即让位给 1869 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不得不认降，以便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性命令放下武器，承认 9 月 4 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冒一切风险抗击法国阴谋分子，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辞。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不仅政府和议会，整个法国都仰赖巴黎工人英勇和坚韧，正是他们为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现在，在面对内部挑衅的时候，他们试图顾全大局，避免使巴黎陷入一场内战。

最后，马克思指明了内战的罪魁祸首正是反动政府自身：

【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 30 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三月十八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梯也尔没有想到巴黎工人会有如此坚定的捍卫革命成果的决心，他一方面只好让步，允许巴黎工人保留自己的武装，另一方面试图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工人队伍。但是上当的工人很少（30 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上当）。

08-《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导读（二）

第2部分的第二小节，谈的是从3月18日到反革命军队进入巴黎这个时期的经过。

马克思首先反驳了反动政府进攻巴黎无产阶级的借口：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上一部分最后一小节讲到巴黎工人的忍让。由于这种忍让，反动政府找不到进攻借口。他们抓住两件事大做文章，一是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被杀，二是旺多姆广场事件。

先看两个将军被杀的借口：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81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利浦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

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érant responsable*）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 *la fine fleur*（精粹）”的计划。在维努瓦吃了败

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这两个人虽然该杀，但工人阶级并没有伤害他们，是他们的士兵自己不愿意执行他们杀害妇孺的命令，反过头来处死了他们。

再看所谓的旺多姆事件：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 3 月 18 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 1848 年六月事件到 1871 年 1 月 22 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惊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异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 月 22 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

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纨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著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做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 *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此措施无效，国民自卫军的将领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 1849 年 6 月 13 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层等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 年的中央委员会干

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胜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旺多姆事件完全是一个谎言，以至连知道内情的反动统治阶级自己都不好意思提这件事。他们只是纵容无良媒体去传播这一谣言。实际上，如果说以前工人阶级的忍让是为了顾全大局，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的忍让已经过度，演化成为纵虎归山的错误。马克思批评中央委员会在看清政府和议会的面目之后没有及时出击，抓住机会消灭反动势力。

09-《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导读（三）

上一小节谈到巴黎公社对敌人的过度宽容，本小节揭露的反动派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克思首先介绍了反动派在4月初如何对待俘虏：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

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原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

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就对战争行为提出了一些约束规则，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专门研究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并提出了对待俘虏的规范。反动派不仅公然撕碎这些规则，而且表现出变态般的快乐——男男女女、上级下级，都是这样。

随后，马克思拿巴黎公社的做法同反动派做了对比：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恕，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

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那么容易激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现在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轰击巴黎、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竟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 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虽然巴黎公社声称对敌人报复，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而反动派则肆无忌惮，敢于违背人世间的公理。不仅政府部门从上到下是这样，

连议会都没有例外，不允许对暴行有任何质疑。无产阶级的仁慈和反动派的暴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不公正”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现象。

10-《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一）：新的国

体和政体

本部分是整部《法兰西内战》中最重要的部分，篇幅较长。为了既保证导读的充分性，又保证阅读的连贯性，对本部分将作较为详细的划分，但同时由原来的隔天导读改为每天导读。

现在先看巴黎公社为什么是一种新的国体和政体形式。

马克思首先阐发了巴黎公社的国体与以前旧的国体之间的区别：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

“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巴黎公社成立了，但人们看不清它的面目。马克思引用了公社自己的宣言，说明它的国体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难怪人们看不懂。

国体的根本变革决定了：公社不能采用旧的政体。它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公社成立前资产阶级专政国体下的各种政体形式：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 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

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中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联盟，是在这些党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

行的十字军征讨，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国民议会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

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巴黎公社前的资产阶级专政采取了帝国和共和国两种形式，无论哪种政体下，国家政权都只是不断强化。它的变化仅仅在于：资产阶级扫除旧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是为了打破旧的经济基础，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建立以后国家机器的不断巩固则是为了强化新的经济基础，对付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反抗。政体变化一开始表现为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结果是它们的轮流执政。但各派资产阶级（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联合必然也使人民群众被迫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无法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虚假的民主导致农民的选票起决定作用，选出了一个虚假的全民代表，形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于是，马克思总结说，帝国政体“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下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政体形式：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

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公社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形式，而且是“社会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它截然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

11-《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二）：公社的

政体

本小节谈的是巴黎公社的政体。

首先是废除常备军：

【既是旧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大本营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抗了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复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军队是旧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它耗费大量的财政收入，因此废除旧军队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经济意义。

其次是民主管理：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

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巴黎公社实行民主制：第一，普选。第二，议行合一，避免庞大的国家机器所造成的财政浪费。第三，警察和所有公职人员的非政治化。第四，特权和高收入均消失。第五，全部创议权归公社。

这就是被某些人所反复诬蔑的所谓“专制”！可以看出，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权才是迄今为止最真实的民主。

再次是自由的和免费的教育：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除了军队和警察两种物质力量外，精神力量也归于人民。人民不再受精神奴役。

再其次是法庭：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

法官也由选举产生，必须服从人民意志。这样，军队、法庭、警察等国家强制机关就都被废除了。

最后是国家与地方的关系：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

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在每一个地方政权都按公社体制建立的前提下，中央政权也将由阶级压迫的机关和“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转化为社会管理机关。民主不再是间歇性的即“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经常性的即作为公仆管理人员必须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否则就会被随时罢免。

12-《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三）对公社的评价

在本节，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评价了巴黎公社政权的国体和政体性质。

首先，他分析了为什么人们会对公社的国体和政体产生误解：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翻版。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再现。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把各大国的统一——这种统一虽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现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化为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的对抗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这一古老斗争的被夸张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阻碍了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并使得像英国那样的情况能够存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

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利浦时期控制着乡村，在路易-拿破仑时期，他们对乡村的控制为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取代。现在他们以为公社就是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那种对乡村的控制。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体制。普鲁士的市政体制不过是 1791 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本段可以分为四个意群：

第一个意群是“一般说来，……中世纪公社的再现”，说明人们对巴黎公社的传统式误解。这主要是对国体的误解。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全新的历史创举”，但正因为其全新，人们才无法理解，尤其是习惯了从既往经验来理解新事物的人们无法理解。通常，人们都是从表面的相似性来看待事物的，而巴黎公社形式上是公社，所以人们马上联想到历史上的公社，误以为巴黎公社是中世纪公社的再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是一种倒退，因为中世纪公社作为一种政体本

身是封建制度国体的一种形式，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政体已经超越了这种旧的国体和政体。实际上，巴黎公社不仅超越了中世纪封建制度，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崭新的国体。

第二个意群是“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为其补充”，是对巴黎公社政体的误解。人们喜欢从分权的角度看待巴黎公社，认为它是对法国式集权的反动和对英国式分权的超越。实际上，这远远不够，因为分权或集权并不是人们随意决定的，而是由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法国式的大国统一虽然是由政治暴力造成，但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英国由于条件不成熟，因此其政治体制不具有典型性，是一种变体。换言之，英国的政体表面上是侵权，但从阶级统治的意义来说实际上却是集权，其侵权只是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而已。

第三个意群是“公社体制……天然代表者”，说明巴黎公社的国体和政体表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这个词还没出现）的萌芽。从国体上看，本来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赘瘤”被割除，社会本身被从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因而与以往以一种经济的社会来代替另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从政体上看，中世纪公社、拿破仑时代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所取代。因此，无论从国体看，还是从政体看，巴黎公社都是一种创新。

第四个意群是“公社的存在本身……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说明公社自治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它不是中世纪公社自治的复活，也不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普鲁士市政体制。那样的体制和机制都仅有消极意义，即为了制约集权，因此本身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中央集权是矛盾的。从工农联盟和整个国家的自由联合角度看，巴黎公社的自治只会带来整体效率的提高，而不会导致扯皮和推诿。

其次，马克思从正面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国体和政体：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

三个自然段分别说的是：

第一自然段，巴黎公社建立了廉价政府和民主制度。这两者是资产阶级反复鼓吹而始终没有做到的。巴黎公社做到了。但这并不是巴黎公社的终极目标，而只是由它的终极目标带来的伴生物。

第二自然段，巴黎公社具有真实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不是虚假的代表性和实质上的压迫性。重要的是，它不仅是新的政体，而且是新的国体。巴黎公社不仅是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且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是谋生方式的变革。

第三自然段，巴黎公社实现了劳动的解放。它使社会本身从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或者说，是人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从剥削阶级社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一革命使得劳动不再是一种被剥削阶级的阶级属性，而成为人性即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规定。

再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的过渡性质：

【说来也奇怪，虽然近6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劳动解放的高谈阔论和巨著，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做这件事，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地主现在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说话的喉舌，立刻就出来大唱辩护之歌，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它的欺人假象还没有被戳穿，它的丑恶现实还没有被揭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

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论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

这两个自然段说明的是，巴黎公社所表现的国体和政体的变革是社会形态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环节。对这种由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转化的经济基础变革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第一自然段中，马克思指出：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那些言论，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还没有暴露的时候发表，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暴露以后，还要扮出一幅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女面目，把私有制说成一尊圣洁的雕像，那就只能是故意歪曲事实、故意欺骗了。这些人当然会说，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但巴黎公社不正是这种“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吗？它

的国体和政体不正是为了保证人的自由联合能够实现的手段吗？

在第二自然段中，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实践性和巴黎公社的过渡性质。共产主义并不是事先在地图上标出一条路来，然后按图索骥。那样的想法是空想。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但这种会犯错误的实践比那些像教皇一样永无谬误的空论家的理论要重要得多。工人阶级将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直到一个崭新的社会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

13-《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四）：公社的 价值观

本节要说明的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价值：人民性、国际主义、人本政府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为人民掌权和为权势阶层掌权的区别：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時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气得浑身颤抖。】

巴黎公社委员们工作更有成效而报酬更低。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金钱的回报，而是为人民服务本身的价值。但旧世界怒火中烧，这正说明了旧世界的片面性和反动性。它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只是金钱和权势，丢掉了这些东西的反动派当然会怒气冲天。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人民性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它代表和维护了中等阶级的利益：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

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 1848 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有分晓。】

资产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也是中等阶级的敌人，而公社则维护了中等阶级的利益，因此必然受到中等阶级的拥护。只不过这个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将来有可能会动摇。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中等阶级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体户，因此也可称为中产阶级。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概念中，“产”指的都是生产资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的阶级；资产阶级是有生产资料，依靠剥削雇佣劳动谋生的阶级。中产阶级界于中间，他们有生产资料，不必给资本家打工，但他们生产资料太少，仅够自己使用，不足以做资本家剥削别人。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单纯以收入作为划分是否中产阶级标准的人，实际上混淆了不同概念。

第二，巴黎公社维护了农民利益：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下，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 1815 年以后不得不付予 10 亿赔偿金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 1789 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 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 45 生丁的附加税，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 50 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

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教士的薪俸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所以这里用不着细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更复杂但极重要的问题，例如：农民那小片土地负担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抵押债务，*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而与日俱增，农民的土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帝国则是秩序党的作品。在 1849 年和 1850 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怎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 1850 年 1 月和 2 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

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对乡绅议员是不利的）错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农民在二月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压榨，他们本来寄希望于路易·波拿巴，所以选他做总统，而秩序党则听任他做皇帝，但路易·波拿巴却辜负了农民的期待。只有巴黎公社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至于在国防政府主宰下选出的乡绅议员们，则正因为巴黎公社真正代表农民而害怕巴黎公社。

第三，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性质：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

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它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请波兰的英雄儿子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

无论是第二帝国，还是国防政府，都与国际资产阶级沆瀣一气，而巴黎公社则体现了真正的国际主义。它不仅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且是沙文主义的敌人和真正的国际主义政府。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人本性质：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让面包工人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法警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

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合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从没收教会财产上仅仅得到 8 000 法郎，他们对此自然是大为震惊。】

与资产阶级虚假的人权说教不同，巴黎公社体现了真正的人本价值。它不仅推翻了那种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任性妄为的制度（资产阶级称为财产和自由），而且即使是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也没有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相反，为了避免“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狭隘剥削阶级思想，它甚至对剥夺剥削者的财产也采取了谨慎（甚至是过度谨慎）的态度。

14-《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导读（五）两个巴

黎的对比

前面讲了巴黎公社的国体与政体，以及体现在其中的价值观。本节通过新旧两个巴黎的对比，显示巴黎公社失败的悲剧命运。

首先，马克思介绍了两个巴黎对待自身和敌手的不同态度：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地区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宗教裁判官似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巴黎的一切来往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斥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做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就在乡绅议员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怀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

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派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无支付能力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据犯茹尔·法夫尔——他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要挤进来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诚的幸存者，他们对当前的运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纯粹是由于传统力量，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空喊家，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语言大骂现政府，从而骗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声。在3月18日以后，确实也出现了上面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同以前这种人阻碍各次革命充分发展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是一种无

法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第一自然段说的是，巴黎的反动势力、旧巴黎已经逃到了凡尔赛。它千方百计封锁真相，抹黑革命的巴黎。相反，革命的巴黎对凡尔赛的斗争却是有理有节的。

第二自然段说的是，凡尔赛匪帮对待革命的巴黎异常残酷，对待自己人却毫无原则，这同革命的巴黎形成鲜明的对比。革命的巴黎对待自己的官员光明磊落，有错必纠。到底无产阶级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缺乏纠错能力”，由此表现得一清二楚。

第三自然段说的是，尽管革命的巴黎具备自我批判精神和自我净化能力，但完成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令人遗憾的是，反动派不可能给革命的巴黎留出这样的时间。

其次，马克思拿两个巴黎做了对比：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大贵族麋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像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在她们的庇护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财产的卫士们的屁股后头跑掉了。没有了荡妇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与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民族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 1789 年的样子，在 Jeu de Paume（恩格斯在 1871 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网球场，国民议会于 1789 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革命的巴黎面目焕然一新，而逃到凡尔赛的旧巴黎却像一个由“食尸鬼”组成的怪物。“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再次，马克思用事实证明了由谎言构成的旧巴黎的实质：

【梯也尔对塞纳—瓦兹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竟对这个议会说，“它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他对他的杂牌军队说，他们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优秀的军队”；他对外省说，传言他下令轰击巴黎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对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向它开了几炮。”

他对巴黎大主教说，硬说凡尔赛军队曾执行大批处决和进行报复(!)，这全是胡扯。他对巴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可憎的暴君压迫下解放出来”，说公社的巴黎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的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

子的、无所事事者的巴黎。这个巴黎目前正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痞、荡妇麋集在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的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场面，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妇们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上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伤者的惨叫声也是实实在在的惨叫，而且这整个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伦茨的那帮人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梯也尔号称从不食言，但他对巴黎的镇压表明，他完全是在撒谎。梯也尔故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不敢说真话的议会说成是最自由、最开明的议会，把打败仗的杂牌军说成是最优秀的军队（好让他们镇压巴黎公社）；先是拒绝承认炮击过巴黎，在被揭穿以后又轻描淡写说那“不是轰击……而只是开了几炮”。他对巴黎大主教否认有过大批处决和报复，对巴黎无法掩盖，又为自己粉饰，说什么是在镇压少数人的叛乱。

梯也尔真敢说，旧巴黎就真敢信。对旧巴黎男男女女的轻信，已经不能用单纯无知去衡量。这并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心肝的问题。旧巴黎本来就不是由人，而是由“食尸鬼”构成的。

15-《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一）：缓兵之 计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所研究的法兰西内战进程。

马克思首先指出，反动政府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制服巴黎公社：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佩戴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重“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皮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

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反动政府第一次想让普鲁士军队为自己火中取栗，遭到拒绝；第二次想依靠自身力量制服巴黎，结果失败，被迫逃到凡尔赛。靠后来纠集的杂牌部队同样无法获胜。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和凡尔赛的道义对比：

【与此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没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高兴的表示拥护的宣言。恰恰相反。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 4 月 23 日给国家的检察官们的通令中命令他们把“呼吁和解”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下令在 4 月 30 日按照他自己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长玩弄阴谋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关进行威胁恫吓，这使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外省作出的裁决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道义力量，并且他最终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反动政府不仅在实力上无法战胜巴黎公社，在道义上也输给了巴黎公社。“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梯也尔只好软硬兼施，采取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试图扭转舆论氛围。

再次，马克思介绍了凡尔赛政府在看到不利对比之后假装和解的策略：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的这场在他自己的公报中备受赞美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表演一出和解小戏。这出小戏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诱骗巴黎的中等阶级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够以对梯也尔的信任掩盖他们对巴黎的背叛。梯也尔在 3 月 21 日，即在他还没有军队的时候，对国民议会声明说：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 月 27 日，他又站起来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而他的乡绅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要把它淹没在狂吼声中。他作出这番勋业之后，就把“既成事实”降低为假定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

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明目张胆地破坏法律，准许他们在德勒从事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们无休止的会见当中所作出的让步——尽管谈话的口气和腔调总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变化——实际上从来没有超出这样一个承诺：将来的报复对象仅限于：

“那一小撮与杀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有关的罪犯”，

而且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国要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过的共和国，就像他在 1830 年对待路易-菲力浦那样。然而，就连这种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进行的官方解释而使之暧昧不明。不仅如此，他还让他的那位杜弗尔行动起来。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在历次戒严时期都充当最高法官；如今 1871 年梯也尔掌权时是如此，1839 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时和 1849 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也是如此。他在不担任部长职务时，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以反对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不仅赶快在国民议会通过一批镇压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后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他还把对他说来太缓慢的军事法庭审判程序加以简化，并且新炮制出一部严酷的流放法，以此预示巴黎未来的命运。1848 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没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机的统治。乡绅议会甚至还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

者而是杀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将来对巴黎进行报复的手段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和解滑稽剧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引起乡绅议员们的一片怒吼声，他的这出滑稽剧就演不下去了。那些乡绅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既没有领会这套把戏，又不懂得玩弄这套把戏非用伪善、狡辩、拖延这样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做了一次精彩的和解表演。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讲假惺惺的漂亮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道：

“只有巴黎的阴谋是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巴黎的阴谋迫使我们让法国人流血。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邪恶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通过和平协议停止惩罚，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断他讲话的乡绅议员说：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遗憾吗？忍心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为了争取时间，梯也尔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假装和解。但他也为自己势力坐大之后的镇压保留了借口，特别是反复强调要惩罚杀害两位将军的“凶手”。他利用争取的时间抓紧巩固自身势力，努力改变力量和道义对比。

最后，马克思介绍了梯也尔的政策在外省遭到的失败：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这一番自以为像海上女妖歌声那样动听的议会讲话置若罔闻。在法国尚存的 35 000 个市镇所选出的 70 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总共还占不到 8 000 人。在后来的补充选举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意味着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议会给凡尔赛的这个篡权的国民议会以公开的威胁，即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国民议会。】

梯也尔的政府和议会并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它们不仅没有得到自己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也丧失了。

从此以后，反动政府要想镇压巴黎公社，唯一能指望的是通过卖国得到普鲁士的有限支持。全世界资产者是一家，全世界反动势力背靠背。

下一次导读我们会看到，在这一点上，梯也尔是正确的。

16-《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二）：原型毕

露

本节讲的是，反动政府与俾斯麦勾结，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

马克思首先介绍了梯也尔与俾斯麦勾结的过程：

【对俾斯麦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向梯也尔发号施令，要他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地遵从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并以普耶—凯尔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凯尔蒂埃是鲁昂“鼎鼎大名的”棉纺厂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奴颜婢膝的拥护者，对他说来，第二帝国是无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国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他在波尔多刚一当上梯也尔的财政部长，马上就抨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试图——虽然未能做到（因为做此盘算时没有请示俾斯麦）——立即对阿尔萨斯实行旧的保护关税，据他说那里没有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妨碍这样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做在鲁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注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后的卖国大业吗？

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一到法兰克福，盛气凌人的俾斯麦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他的条件里有这样的内容：缩短战争赔款分期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继续占领巴黎各炮台，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主宰者。作为回报，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在和约上签了字；5月18日，他们就让凡尔赛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俾斯麦命令梯也尔派人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派出的人本身就是典型的卖国者。马克思以梯也尔的代表助手、反动政府的财政部长为例，说明了反动政府为自身利益不惜出卖法国人民利益的本质。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俾斯麦软硬兼施，逼迫法国反动政府接受和约。硬的一手是，如果不接受俾斯麦的媾和条件，他就要恢复帝国政府，从而损害梯也尔们的私人利益；软的一手是，如果接受俾斯麦的媾和条件，俾斯麦将放回一部分帝国军队供反动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之用，并为反动政府镇压巴黎公社提供其他条件。反动政府签署了这份和约，从而得到了德国反动派的支持。

其次，马克思介绍了资产阶级在此期间的表现：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这段时间，梯也尔觉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为血洗巴黎而进行的准备。直到5月8日，他还对一个主张和解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决定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唯有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他为此诺言而遭到乡绅议员们激烈质问时，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释，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这些人还得再忍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那时就会有与他们的勇气和能力相称的任务了。”】

梯也尔在此期间逐渐转向：一方面，他向那些主张和解的人继续保证决不杀害无辜；另一方面，他又向那些企图镇压的人暗示正在搞阴谋，让他们耐心等候。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陷落过程中反动政府的言行：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当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对国民议会说：“我将毫不留情！”他对巴黎说，它末日将临；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说，政府准许他们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后，在叛徒已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的情况下，梯也尔于5月22日向乡绅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大规模地处决公敌，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力量对比改变以后，梯也尔抛掉了假面目，发誓报复。军队向巴黎发起了进攻。由于叛徒打开城门，巴黎提前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此时，梯也尔终于向那些主张报复巴黎的人讲出了真心话：他原来不过是缓兵之计。现在他要以屠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尽管巴黎群众英勇斗争，巴黎最终还是陷落了。在此之后，反动政府违背基本的战争伦理，纵容军队血洗巴黎。

马克思指出，一个自诩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此对待人民，整个历史上只有罗马暴政时期才出现过，而就残暴程度来说，甚至罗马暴政也比不上梯也尔反动政府。

最后，马克思用资产阶级报刊自身的话揭露了反动政府的暴行：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埃尔韦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有些太轻佻了，我们担心以后还会越来越糟。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这实在不协调，令人难过；要是我们不想被叫做堕落时代的巴黎人，就必须消除这种现象。”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话：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体、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

埃尔韦先生只是忘记说，他提到的“巴黎居民”仅仅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蜂拥返回的那些 *francs-fileurs*，也就是已经“没落”的那个巴黎。】

可见，反动政府的做法连资产阶级中较为开明的那些人也看不下去。这说明，反动政府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中最为残暴的那一个阶层。

17-《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三）：对公社的诽谤

各国统治者不仅在武力上会联合起来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经常相互攻击的各国资产阶级面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在舆论上也空前一致地对反抗者进行诽谤和抹黑。本小节马克思对其中的一些诽谤和抹黑作了反驳。

首先，马克思指出，一系列诽谤和抹黑罔顾基本的事实：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工人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帮“秩序”恶狗变成了地狱。这一惊人巨变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看来证明了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阴谋反对文明！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恶魔把她们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两个半月内表现得十分温和宽厚，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在保卫战中则表现得英勇无比。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两个半月内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

凶残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挣扎时发泄出来！】

这个狗咬狗的文明总是以文明的方式狗咬狗，一旦咬起人来，就撕掉了文明的面具。对于这个文明来说，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反文明的，只有对劳动者的奴役才是文明的。人们常说狗眼看人低。无论是所谓“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还是英勇的女革命者被诬蔑为“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或“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凶残的嗜血本性”、在英勇反抗时暴露自己的“嗜血本性”等说法，都是狗眼里看出来的结果。

其次，马克思批驳了所谓“公社纵火”的指控：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做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实行“杀、烧、毁”，这是不是准许纵火？英国军队随心所欲地火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这是不是纵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

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沙托丹那样的城市和无数村庄，这是不是纵火？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房屋来进攻。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这个道理竟不适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做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欧斯曼特意为便于开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杀害俘虏时，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为此，特罗胥还给它准备了煤油。但它这样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却十分爱惜他们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尔已经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当他这边刚一把军队准备好，同时普鲁士人那边刚一把各出口截断，他就立刻宣布说：

“我决不会手软！抵罪要彻底，审判要严厉！”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如基督徒对待异教世界真正无价的古代艺术珍品所采取的那种行为。就是这后一种汪达尔行为，也有历史学家为之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

这是纵火。没有错。但它是哪种纵火呢？难道是跟统治者在全世界杀人放火具有同样性质的“纵火”吗？完全不是这样。正如早在中世纪就已经确立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一样，作为犯罪的纵火和作为战争手段的纵火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故意混淆两者只表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次，马克思反驳对巴黎公社“处死人质”的指责：

【可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 64 个人质啊！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在 1848 年 6 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曾恢复扣留人质的做法——硬要一些无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

的行为负责。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难道连这一遏制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最后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装装样子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尔。公社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而且还加上许多个教士，来交换当时被梯也尔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为死尸之后对他最有用。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过污蔑起义者是杀害大主教阿弗尔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义愤填膺的喧嚣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枪杀的。当时在场的大主教的代理雅克美先生事后立刻向他们提交了证词。】

对于公社来说，抓人质同样是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非常手段。这是向统治者学来的，但同统治者完全不同：第一，公社抓人质完全是被迫的，关于释放人质的条件是合理的，也是任何讲道理的人能够接受的，但它不符合统治者的私利，因此被统治者拒绝；第二，杀害人质的并不是公社，而是秩序党的士兵，为的是把屎盆扣到公社身上。

最后，马克思对统治者诽谤公社的深层根源做了分析：

【秩序党在他们的血腥闹宴上总是少不得要对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诽谤一番。这一切诽谤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已把自己看做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在统治者眼里，从来都是受害者的错。但除此以外，马克思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对人像狼”的特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狼和狼之间才是可能的。狼和羊之间只有吃和被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封建主与平民之间的关系。

18-《法兰西内战》第四部分导读（四）：国际主义

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小节，谈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并不限于民族国家之内，相反，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对立。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在法兰西内战中法德两国统治阶级的勾结：

【统治阶级利用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内战来镇压革命的阴谋，即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 9 月 4 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俾斯麦满意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当他还只是 1849 年普鲁士无双议院中一名普通的乡绅议员时就盼望着把大城市都加以消灭。现在他大概认为巴黎变为废墟就意味着他的这一愿望的初步实现。他满意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被消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政治家一样，目光短浅，看到的只是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为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因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

后要付给它 5 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未能提醒欧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傀儡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各国之公敌，却只是促使它们去琢磨要不要把为数很少的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受害者送交凡尔赛的刽子手！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巴黎公社被镇压，实际上是法军和德军联合的结果。但俾斯麦以为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这却是彻底的误认。相反，它证明民族斗争或爱国主义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手段，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欺骗就再也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总是暴露出它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从而把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显露出来。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阶级斗争的不可妥协性质：

【在 1871 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大，直到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他指出：“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表明，无产阶级只能是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存在。而它的先锋队则预示着整支队伍的未来。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统治阶级为什么害怕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与之对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梯也尔指责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自己却装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将法国的国际会员同国外的国际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梯也尔的 1835 年的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所有文明国家政府的大事。乡绅议员们对国际狂吼，全欧洲的报刊都随声附和。

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这样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 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

在颇有几分警察头脑的资产阶级心目中，国际工人协会自然是以密谋方式活动的，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个国家制造事端。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敌人拥护的，往往是我们需要反对的；敌人反对的，往往是我们需要拥护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坚持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另一方面反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性。因此，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打破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中之重。

恩格斯在导言中讲到了巴黎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从而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只可惜他没有预料到，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庸人们后来还背叛了《法兰西内战》中强调的国际主义原则。

最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不朽业绩做了评价：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马克思早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结尾，就谈了不朽的含义：死而不亡者寿。后来有诗人曾经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纪念碑和耻辱柱就会始终提醒人们：善恶的判决书已经下达。

19-《法兰西内战》附录说明

《法兰西内战》在有些版本中有两个附录，很容易了解，不需要导读，所以现在列在这里，简单作个说明。下次开始导读《文集》所附的《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第一个附录：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赶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

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 6 月 8 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气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入，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隐约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于上月 24 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一直放到 27 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驻巴黎记者 6 月 8 日报道）】

这个附录有三段，第一段引用了一段新闻报道，证明反动政府在占领巴黎后如何屠杀无辜。第二段说明杀人者顶着将军的名义，实际上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流氓无赖。第三段引用了另一篇新

闻报道，说明杀人者是如何草菅人命。所以这篇附录是一个控诉，说明世事的颠倒。

第二个附录：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

致《泰晤士报》编辑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1869年3月25日的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这种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

“如 1869 年 7 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 7 月和 9 月发表的），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鉴于茹尔·法夫尔预计前来伦敦，有人做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却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 9 月 9 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 月 12 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伦敦（6 月的文章中，《旁观者》24 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 11 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

这个附录说明的是反动统治者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诬蔑，而这种诬蔑依靠的是伪造证据。

20-《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公社：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导读

现在开始导读《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部分。大致按马克思初稿的标题。内容太短的就合并两个或几个标题。

现在先看“公社：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一节。包括公社产生的过程和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两个部分。

马克思首先介绍了巴黎无产阶级失去的一个极好机会；

【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当时运动的其他领袖们相信了这样一些言而有信的人，这些人当时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脱以后就遭到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笑剧般的全民投票。在

这种情况下，当然最省事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唯一不愿食言的人（弗·塔米西埃）去职的机会，任命克莱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干的事同科西嘉兵替路易·波拿巴干的事一样；对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说来，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既然他们在 9 月 4 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像反动恐怖时期那样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第一段讲色当战役后的公社遭到镇压。色当战役是 1870 年 9 月 1 日发生的。战斗的结果是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第二帝国的怒火终于迸发，试图成立共和国。在此期间，不断有地方宣布成立公社。“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这里的甘必大是法国政治家，在第二帝国时期，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帝政，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领袖，1869 年被选入议会。普法战争爆发后，1870 年 9 月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主张积极抵抗，反对议和。巴黎沦陷时逃往外省，被任命为驻都尔的政府代表，负责在各省重组军

队，采取继续战争的措施，同时也压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

第二段讲 10 月份本来有条件建立巴黎公社，但由于工人领袖听信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又对敌人过于宽容，失去了成立公社的机会。反而是资产阶级政客软硬兼施，使自己“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公社成立的必然性：

【如果 1870 年 11 月初在巴黎胜利建成公社（当时，法国各大城市已开始组建，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战斗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高举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的战争。结果就可能像电流似的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者群众，而不致使得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梯也尔）被派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 10 月 31 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场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 月 4 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国得以恢复，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是在其敌人领导下战斗——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这个共和国，而且，这一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国不再是一个过去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

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狡猾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伏时起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时伏时起的运动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国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和“投降计划”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坏而流产了；最后公社终于在 3 月 26 日胜利建成，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命力的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仅仅看做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军奋战。】

虽然 10 月份如果公社成立，可能后来形势会好得多，但各地纷纷成立公社，以及后来巴黎终究成立了公社，这说明了“公社”这种政体形势在当时的必然性。

最后，马克思通过概括巴黎公社成立的必然性，分析了公社政体的意义：

【国防政府只是作为在初遭意外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出于战争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除了波拿巴体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掀起的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对阴谋家们首次告捷的，但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们的财产，而且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会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投降普鲁士之机同时达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加在他们头上——就是派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派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 1 个区，和其他 19 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 20 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 3 月 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

代替第二帝国的不可能是国防政府这种旧国体内的政体形式，而只能是公社这种新的国体下的政体形式。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说明了这一点。被选为中央委员的并不是任何政客，相反，他们都是所谓的“无名之辈”。但这恰恰说明了公社的人民性质：这是人类历史第一个由人民的成员自己组成的政府。

这同列宁试图增加中央委员会中工人成员的数目和毛泽东试图直接让工人农民做高级干部，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但究竟如何培养工农干部，迄今为止是一个并没有解决的问题。

21-《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公社的性质”

本节阐发巴黎公社这种新的国体和政体与旧的国家机器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近代以来国家机器的发展过程：

【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教会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特权；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封建显贵，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继续进行专制君主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

上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 1848 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要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

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 1848 年革命斗争时期，它终于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 1789 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现在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身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

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

第一自然段讲了旧的国家机器发展的头两个阶段：君主专制和第一次法国革命建立的政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极权”政府。

第二自然段首先讲了旧的国家机器发展的后三个阶段：拿破仑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1848年革命后的议会制共和国。马克思总结了前述五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第二自然段的后半部分则分析了旧的国家机器发展的顶峰：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是旧的国家机器的完成。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国体和政体区别：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

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迫把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当做求解放的法宝来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可能形式。它虽

然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剥夺，但它却使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得以大肆泛滥。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其最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摧毁它的也正是无产者，但无产者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集权化政府权力的某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因而也是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 1848 年 5 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也如法炮制——

但那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革命当然不是要把它从死亡中唤醒。

但是，阶级统治的这样一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即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在第一自然段中，马克思指出，以往的政体都是不断完善国家机器，而巴黎公社是要彻底摆脱国家。国家本身是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出来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巴黎公社革命却是要砸碎国家机器。“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因此，公社也是 19 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由于新的社会不再是“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因此它也不再需要“国家”这种上层建筑。

在第二自然段中，马克思说明了为什么作为第二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公社不仅是政治革命或政体变革，而且是社会革命，即旧的国家机器的消除。“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

第三、四自然段中，马克思分析了为什么议会制无法恢复，无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因为第二帝国是从议会制共和国中必然产生的。换言之，如果恢复了议会制共和国，它迟早又会产生出一个帝国。“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革命当然不是要把它从死亡中唤醒。”“但是，阶级统治的这—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即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最后，马克思对公社的政体区别于一切旧的国家政权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次摆脱它的敌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 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政权（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人民只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并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耗资巨大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血税，使农民不再成为所有国税和国债的不竭泉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

月 12 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 240 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借口国家机密和国家权利玩弄的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所得报酬就像弥尔顿写《失乐园》一样只是几个英镑；他们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论公社的各项具体措施多么可贵，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还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论点。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陷于敌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袭击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

革命。劳动的解放——公社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实现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厉行节约，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

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第一、二自然段分析了公社这种政体形式的意义，它由“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变成了社会自身的组织者。这意味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它不再需要军队这种镇压人民群众的独立的武装力量而只需要国民自卫军这种人民自己的力量。这种新型军队正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人民子弟兵”。

第三自然段先讲了消除常备军的意义，然后分析了废除职业官僚，代之以工农干部的意义：“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前一次导读我们讲过，这正是列宁和毛泽东后来所做的工作。

这里的关键在于“自治”，因此第四、五、六自然段讲到公社这种政体的迅速建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它能逐渐消灭阶级和阶级

斗争。由于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所需要镇压的只是一小撮反动分子。

最后一个自然段即第七自然段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走向消亡的各个阶段。它需要建立自己新的经济基础，需要对旧的人性和社会组织进行改造。为此需要探索公社之后的各种新型的政体形式。

22-《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农民”

前面谈到巴黎公社与第二帝国是直接对立的。既然第二帝国似乎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的，那么巴黎公社与农民的关系怎样呢？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长远利益是否一致？这是《法兰西内战》初稿在本节要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公社的态度对农民的意义：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交付”。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交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么，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捐税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通过经手这笔生意牟利。由谁来清偿战争费用，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争捐税就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跟着“乡绅议员”们叫喊什么他们——大土地占有者——代表农民，而农民当然心地质朴，迫不及待地要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

了 10 亿革命赔偿金的好“地主们”再交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些人对农民增收了 45 生丁的附加税，蓄意以此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转嫁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

第一自然段讲的是公社主张战争赔款由战争的发动者交付，而反动政府则试图转嫁给人民，由人民交付。因此，公社不仅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代表了除上层所谓“精英”人士之外的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些认为只有“乡绅议员”才代表农民的看法，被马克思批评为糊涂看法。

第二自然段讲的是历史上统治者一贯损害农民利益。糊涂虫们以为农民看不到这一点。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措施对农民的影响：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于农民之身。秩序党要派税吏死死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让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抓住他们那小块土地的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勤务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

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一整张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继续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强制征收，而是由他们依自己的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

资产阶级虽然一向号称“小政府，大服务”，但为了豢养一支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庞大队伍，实际上是有史以来最为浪费的政府。巴黎公社则废除了这些部门和机构，如常备军、高利贷者、政府官员、司法人员、法官和区长、宪兵、僧侣等等，仅保留与工人同等工资的人民勤务员，因此真正实践了“廉价政府”的主张。

再次，马克思说明，部分觉悟农民早在巴黎公社前已经开始觉醒：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了：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制定的各项反动法律，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

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马克思认为，法国农民并不像糊涂虫们所认为的那样傻，虽然他们把波拿巴选为总统，但帝国实际上是秩序党创立的。觉悟农民早在 1849 年和 1850 年间就开始不自觉地对抗波拿巴政权了。秩序党是专门针对农民的。因此，农民虽然短期上当受骗，长期是会觉醒过来的。在此之后他们自然会支持公社。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农民同剥削阶级利益的对立：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 10 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时期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就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

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权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现实的，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 *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遭到剥夺——

——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马克思认为，从阶级利益来说，农民和无产阶级虽然存在冲突，但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农民同剥削阶级的矛盾，正如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的矛盾一样，是根本矛盾、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求同存异，形成工农联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公社这种政体形式恰恰能够为建立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23-《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各阶层、 公社和共和国”

现在导读《法兰西内战》初稿的四个小节：“共和同盟”、“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和“工人和孔德”。这四个小节表明容纳各阶层的“共和国”只有采取社会共和国的形式才有可能，而公社则是社会共和国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中等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喽罗门客、国家寄生虫、暗探爪牙、“荡妇”，以及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之补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随下，离开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记”）。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显出他们的真正本色。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看，维护旧秩序的秩序党实际上是“无秩序党”。聚集在它周围的都是一帮社会渣滓。这些人都随着巴黎工人起义而出逃到凡尔赛，剩下的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组成了“共

和自由同盟”，“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其次是“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的一小节：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乡绅议员”最害怕的是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中，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显示出它同时也是债权人即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债权人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挥霍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

受着证券投机商、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在本节中，马克思对前面论农民和中等阶级的两小节进行了概括，说明巴黎公社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权，而且代表了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这都是依靠自己劳动谋生的阶级，只不过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为生，而其他各阶级虽然有生产资料，但仅够自己使用，无力剥削别人。

再次是“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的一小节：

【正像第二帝国粉碎了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这样一种幻

想一样，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

乡绅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经过了 1848—1851 年的试验，经过了镇压巴黎的内战，还是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这种形式，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玩弄阴谋的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 1848 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们通过镇压六月起义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铺平了建立隐名统治的道路为止。1871 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后边，在那里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 Salle des Paume（网球场）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 1789 年

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不去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种人和乡绅议员们的侮辱，迷恋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鸣诉苦，脸面丢尽！】

马克思指出，原来的国体性质都是剥削阶级的国家，而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社会共和国只有在新的国体下，在社会从国家统治下解放出来才有可能。

请注意，这里的“共和国”是就其本义，即法治基础上的全民统治的意义来说的。按照这样的标准，资产阶级所谓“共和国”实际上是寡头制政体。

最后来看一下马克思如何论述工人与孔德派的关系（原标题为“工人与孔德”）：

【如果说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纷争的时期，那么不应忘记，工人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拒绝。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

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国际工人协会或第一国际是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国际联合组织，因此它是反对宗派主义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表明的那样，除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利益外，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国际工人协会也吸收了孔德派的工人组织，但它只是一个由六七个人组成的小支部，这个支部所提出的方案从来没有被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接受过。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在巴黎出版，一共6卷。在巴黎工人看来，它是帝国精神的体现，因此对工人并无多少吸引力。相比之下，英国改良主义传统较为浓厚，因此作为一个主张改良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反而超过了对法国的影响。但英国工人是经验主义者，之所以接受孔德派的主张，并非因为孔德的理论，而是由于英国的孔德主义者个人的优秀品质（不是由于孔德学说），以及这些人所主张的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也不是来自孔德，因此是为法国的孔德主义者所排斥的）。换言之

之，在英国孔德主义者的影响恰恰是由他们的非孔德主义品质所决定的。

24-《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之“公社（社会措施）”

本节导读《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的“公社（社会措施）”。从中可以看出巴黎公社的共产主义性质和国际主义性质。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巴黎公社革命与历史上类似革命的区别：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灵，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

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在第一自然段中，马克思首先指出：自我牺牲精神和公开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这是巴黎公社和历史上以往革命的相同之点。但与以往革命相比，巴黎公社有两点区别：一是革命胜利后没有解除武装，把权力交给统治者去行使；二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公社。正是这两点，使统治阶级狂怒。尤其是以自己的国家机器代替旧的国家机器这一点，更是威胁到旧的经济基础，这让统治者不惜一切手段要镇压巴黎公社。

在第二自然段中，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最伟大的措施，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这个政权已经意识到改造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遗憾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而他们的具体措施则“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从一连串的感叹号来看，马克思当时情绪还处于极为亢奋的状态，还没有冷静下来。这正是他后来要写作其他各稿的原因。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措施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工人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

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改良主义者不理解巴黎公社的真正性质。他们只是看到公社比旧政权文明，因而同情公社。同时，他们对巴黎公社采取乌托邦共产主义的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而他们则对此表示满意。马克思分析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指出巴黎公社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具备了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同时，马克思捍卫了乌托

邦共产主义者，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与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一致，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性质：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横蛮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使这场防御战争陷于瘫痪；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

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前半部分说明的是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与国内阶级斗争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或者不同的两回事：要拯救法国，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同样，只有解放无产阶级，才能求得民族解放。

后半部分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是一致的。由于“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仅仅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来说才存在，而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经带有世界性质，因此即使是这种爱国主义也已经过时。相反，无产阶级的民族政权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无产者只有依靠自己的国际联合，才能打败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实现自我解放的目标。

25-《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 “乡绅的地方

分权和公社”

马克思首先介绍了把外省农民与巴黎工人对立起来的观点：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中央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权势都这样归之于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们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

马克思指出，那种（因为乡绅议会仇视巴黎工人就）把巴黎工人与外省农民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一方面，是农民受着代表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中央集权的巴黎的统治，另一方面，外省的反动分子因此必然反对工人阶级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所以，对立在于农民与资产阶级政府之间、工人和乡绅地主之间。

其次，马克思引用了反动政府和巴黎公社对巴黎的不同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

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与其说是因为巴黎宣布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巴黎这样做就是发出了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4月1日公社《公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

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

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的地位对巴黎说来等于是自我损害——而没有放弃那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全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为法国在思想、道德、行政、经济诸方面的复兴，为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而战斗、牺牲。”（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

凡尔赛政府用自己的话表明，工人和农民都不能有自由；而巴黎公社则宣布摆脱这种状态，让工人和农民获得自由。

因此，巴黎公社将废除资产阶级和反动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创建一个以自由联合为基础的统一共和国。巴黎工人已经为此做好牺牲和忍受苦难的准备。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造成所谓“巴黎推翻农民统治”的谣言产生的原因：

【梯也尔先生在巡视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个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都已经融入波拿巴派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他们使凡尔赛议会具有了明显的特色，具有了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

的性质，具有了“乡绅”议会的性质。他们十分自负，当然以为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有了外国侵略者的庇护，像1814年和1815年那样，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到来了。

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愚弄。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隐名”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本派情绪的宣泄只不过给他们那种结伙行为增添喜剧性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总统，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

可是他们自己干的头一件好事恰恰就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地位”，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领主在本省和本地的权势。

他们所要的是在法国实行反动的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仅仅表现为一个人为机体的统一，而这个人为机体依靠

宪兵和红黑军队而存在，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压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个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乡绅们，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马克思指出，是梯也尔召集了乡绅议会。而这个乡绅议会试图开历史倒车，回到法国统一前封建社会的地方分权状态。

相反，“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仅仅表现为一个人为机体的统一，而这个人为机体依靠宪兵和红黑军队而存在，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压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

可见，巴黎公社并不想回到原来的封建割据状态，它想建立的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只不过这种新型的共和国是社会共和国，因而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各地方相互对立的基础上。

因此，巴黎公社既反对旧的统一，也反对旧的分权，正如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崭新的国体一样，它也是一种崭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自治和联合基础上的统一。

26-《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 “孔德派的观点”

现在看一下孔德派对公社的看法和公社所带来的变化。

首先看孔德派的观点：

马克思指出，那种（因为乡绅议会仇视巴黎工人就）把巴黎工人与外省农民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

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市政体制。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第一自然段分析了当前的财产制度及其道德的历史性。一是任何制度都有其历史，巴黎公社的工人们要建立的新制度正是这种历史性的体现，因为它是目前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产物。二是现有的财产形式并不是永恒的形式，它必将为新的历史形式所取代，因此认为消灭现有的财产形式就是消灭一切财产实际上是一种错觉。三是由于这种非历史感，孔德派把自己碰巧处于其中的那种制度（不管是奴隶制、封建制或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是永恒的，只是对它们作道德抨击，而看不到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过渡性质，以为可以用道德手段完善现存制度以使它免于灭亡。

第二自然段说明孔德派和俾斯麦一样，和一切缺乏历史观点的人一样，实际上是井底之蛙，无法摆脱洞穴假象，误以为自己所处的历史片断和局部就是历史整体，不知道外面的天地非常广阔。

第三自然段正好可以用来批判当今鼓吹正义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认为每一种道德都与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相对应，随着私有制的终结，阶级道德必将终结，从而把被阶级道德束缚的个

人“道德”解放出来。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给“道德”加上了引号。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使巴黎所发生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称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时高呼：“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这是人民的情感。

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给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展现，工人阶级的巴黎是英勇的，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艰巨任务满怀热情！尸体认领处里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荡妇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妇女！刚劲的、严肃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胸怀广阔的巴黎！同敌人的野蛮暴行相对照，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

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曾经把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为自己私产加以利用的这批无用处、无信仰、自私自利的败类。第二帝国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将无权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行使警察职能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接到一次夜间抢劫事件的报案。”】

第一自然段拿工人阶级的道德和情感同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情感做了对比。统治阶级逃出巴黎后，工人阶级的巴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面貌。

后面两个自然段引用了相关文献，说明巴黎的道德面貌和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旧制度下的那些不良现象消失了。

27-《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 “（6）公社”

《法兰西内战》二稿的“公社”一节，与定稿仍然存在区别，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表述还在斟酌之中。

这一节可以分为四部分。

首先，马克思通过巴黎工人起义的过程，说明巴黎公社是一种新的国体形式：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色当事件之后，各地工人反复成立公社，但一再被镇压。巴黎公社起义只不过是其中成功了一次。由此可以看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这是它的国体形式。由于它同历史上

任何一种国体和政体有着根本的区别，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因此资产阶级无法理解它。

其次，马克思说明，由于国体方面的原则性区别，巴黎公社无法采用旧的国家机器：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的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帖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目的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巴黎公社的公告表明，它已经意识到自身与历史上所有国体性质的根本区别。无论是“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帖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还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都无法为无产阶级所用，因为它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不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工具。

再次，马克思通过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研究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

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做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不复存在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

像蟒蛇似的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

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 18 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础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

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

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

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

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战争工具。

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

行的。这只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

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 20 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证券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

渊藪。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它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对定稿的这一部分，以前的导读曾经分析过。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展开政体变革的细节时，注意到了其“合法性”的获得和丧失：一开始旧秩序“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国家政权作为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工具的面目暴露出来，直至革命导致新的政体的产生；新的政体又逐渐丧失其“合法性”，直到帝国这种最成熟、最腐朽的政体形成：“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

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这些论述可供研究“合法性”的学者参考。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政体性质：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僭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

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

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

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的税款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

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本段对巴黎公社政体的分析，在《法兰西内战》定稿的导读中也分析过。这里仅强调两点：第一，巴黎公社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过去叫“议行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第二，**统治职能为管理职能所取代**，职业政治家已经消失。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导读

01-《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简介

本篇涉及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人应当认真研究一下由马克思署名而由恩格斯写作的这篇文献，并把它与《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进行比较。

下面是《文集》的编者介绍：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总结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德国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和失败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的侵蚀，指出应当根据社会总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研究革命发生和成败的原因，并通过对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他强调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必须遵守一定规则；不要把起义当儿戏，事前必须有充分准备，要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要按照“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要求去行动。恩格斯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民族问题，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了资产阶级在

1848年革命中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背叛，强调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还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指出这种理论起着助长俄罗斯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作用。

这篇著作由恩格斯于1851年8月—1852年9月写的19篇文章组成。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因此请恩格斯帮忙。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资料，文章在寄出前都经马克思看过。恩格斯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但未能写成。

这些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专栏，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可以看到，“知识产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是非常可笑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有差异，但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把他们对立起来，仿佛马克思能离开恩格斯，或恩格斯能离开马克思；仿佛单凭马克思一个人，就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篇文献的历史，《文集》的注释也作了介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版过单行本，开头几篇文章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

1896 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这组文章的第一个英文单行本，并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 1848 年的德国》。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本，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恩格斯 1852 年 11 月写的《最近的科隆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作为恩格斯原打算写的结束语。在后来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本中，没有将《最近的科隆案件》收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0 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 19 篇文章所加的标题。】

其实，在读《德国农民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料到，恩格斯对于研究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把两篇放在一起读，收获会更大。

这几天比较忙，下一次我们再开始导读第一篇。

02-《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一“革命前夕的德国”

在第一篇，恩格斯对革命前夕的德国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

恩格斯首先说明了他的方法论原则，即唯物史观；

【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欢迎的短期掌权者，如临时执政者、三头执政、独裁者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军官、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组织起新的“有名无实的”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地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君主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

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而每当问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动荡及其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碎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从远处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 11 个人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 3600 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 3600 万人和这 11 个人一样缺乏辨认方向的能力。问题正在于，这 3600 万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应当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的读者说明 1848 年德国革命必然发生以及它必然在 1849 年和 1850 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那么我们无须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似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论述，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那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够认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

的又一次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么我们也满足了。】

在恩格斯看来，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没有什么大不了。正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分别经历了48年和40年才取得成功一样，德国革命的失败在一开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以便争取下一次革命来临时能够取得成功，或者至少不再重犯原来的错误。那么，如何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呢？恩格斯的看法是：“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对于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人们却恰恰是从领袖的个性特征出发的：“每当问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恩格斯的评论是：“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需要说明的恰恰是这背后的原因，即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那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够认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下一次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么我们也满足了。”

于是，恩格斯给自己提出了问题：“那么，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他首先分析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两个阶层：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沦为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租佃者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是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认为国内的第一“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势力的任

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现代工业的要求。法国在 50 年的革命和战争中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丝纺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旧式的麻纺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深处内陆，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从 16 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 1688 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 1789 年也已夺到了这种统治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非常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 1815 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它的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 1815—1830 年和 1832—1840 年这两个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再度被剥夺了，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都带来贸易立法方面的胜利。当然，1818 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对于德国商人和工业家来

说，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拥有对嘲弄他们的表决权的大臣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重要得多。这样，随着财富的增多和贸易的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的发展受到本国政治制度的约束，国家被 36 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蒸汽在交通方面的普遍采用，国内贸易中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它们全都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了，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即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领导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1840—1847 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然后，恩格斯分析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民：

【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尚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非常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

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则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的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君主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会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驻军、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们的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与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主宰着他们的生存的政府，因为政府有权力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制或君主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变得刻不容缓而再也不可能推迟；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可能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19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就终于会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现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大不列颠的工业巨头是最好的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织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细木工，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500年前没有多大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伴随着差不多同样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刚爆发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公会，那是毫不奇怪的。

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往便利，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智力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确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可以从 1840 年算起，那么工人阶级的积极运动则开始于 1844 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若干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处于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地区占据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自由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农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能轻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

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状况和英国的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处在贫穷饥饿之中，做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村居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有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即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难以达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包括城市中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

第一，作为德国中产阶级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众多，他们希望成为资产者而害怕成为无产者，具有摇摆和妥协的特征。

第二，由于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德国工人阶级也没有发展起来。

第三，德国农民阶级加上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分为四个阶层：富裕农民（或大农与中农）、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后三者不怎么关心政治，但今后有可能成为追随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他们不可能从事独立的运动，更不可能具有革命的首创精神。

最后，恩格斯对以上分析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下一篇的任务：

【上面对在最近的运动爆发时构成德意志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明显的矛盾等情况的一大部分。当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交织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地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样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之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36个大大小小的公国，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而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联盟，而奥地利则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禁止性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势力，而不

是 36 个。当然，1814 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在下一篇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卷入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 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恩格斯的结论是：由于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德国不具备革命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因此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他准备从下一篇开始对革命进行分析。

0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普鲁士邦”

这一部分介绍 1848 年革命前的斗争。

恩格斯首先介绍了资产阶级的要求所引起的舆论变化：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 1840 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德国较小的君主们，都相继颁布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根据维也纳会议而联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做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

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律师、职业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克尔、勒麦、约尔丹、施蒂韦、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在做了 20 年喧嚣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 1848 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们在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顷刻之间就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样板；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语言，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政治词句，并恢复它们本来的含义。

1830 年的事件使整个欧洲顿时陷入了政治骚动，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 1830 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后来他

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资产阶级。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或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评价德国政治发展缓慢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考虑：在德国要得到任何问题的准确信息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勤劳和经营工业

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遍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梅特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信息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现状侵害最严重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应当认为它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是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相继取得政权的情况下，随着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必然受到立宪主义或共和主义影响。黑格尔哲学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虽然官方掌控着舆论，但黑格尔学说的传播为舆论环境的改变准备了土壤。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资产阶级在同德意志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斗争中如何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地位：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前国王——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活到最后的人——死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国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式的君主制。法国的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

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摒弃了；老国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受欢迎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不思进取的蠢材，他多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任何主见，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间养成的习性行事，那么“受欢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在性格软弱这一点上的确超过了他的法国先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许多门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他深信自己是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学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尔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国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在他周围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许多富裕的下层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自

已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层都享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层或“王国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王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国王刚一发现自己的“辩才”因他父亲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无数次的演说中宣布他的意图；但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义不是很会算计，而封建主义自唐·吉珂德时代以来总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承袭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时发现，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度依然浩繁，国库已经不太充裕。在两年之内，一切节余都在朝廷的喜庆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和 1820 年法令的夹攻之下，1820 年法令规定，不经“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

认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代议机关；新国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 15 个月之后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 1842 年的事。】

资产阶级想往前走，像法国或英国那样限制国王的权利，而新国王却想往回走，回到封建状态。问题是新国王这样做需要财政基础，而受到此前国际环境的影响，他要想增加税收就必须给资产阶级权利。所以，当新国王试图发起宣传攻势的时候，他必然受到资产阶级的狙击。舆论战争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哨战。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舆论战基础上的经济和政治斗争：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

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遍呼声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机关作为 1813 年和 1815 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1820 年法令中。他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 1823 年成立的。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包括：(1) 上层贵族，德意志帝国原来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人物都是当然的议会成员；(2) 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 城市的代表；(4) 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全部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在每个省都是两部分贵族在议会中占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各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他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对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他们一边；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要求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大农场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生意的商人，他们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彻底破

产了；他没有搞到钱，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颁布宪法和给予新闻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有关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国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由于缩减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它是一个由国家出资和承担风险做投机生意的商业机构，很早以来就充当国家借款的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才得以暂时维持门面；增发国家纸币提供了一些财源；总的说来，这个秘密保守得颇为严紧。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由国家，部分由私人股东提供，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只有修改银行章程，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愿能够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决不打算谈这宗交易。

这样，搞到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所有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规定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一般立法问题的意见，只是咨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想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让他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开会时所表达的愿望；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而当要求他们同意发行仍然被说成是用来建筑铁路的公债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正如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认为政治权利必须建立在经济权利基础上一样，德国资产阶级也认为国王跟他们要钱，就必须拿政治权利来换。他们有资格用钱购买权利。而国王却不这么想。他拒绝赐给他们权利。于是，资产阶级开始向人民求助。

所以，最后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拉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国王的可能性：

【这个表决很快就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越来越愤怒的国王对他们严加申斥并将他们遣散；但钱还是没有弄到手。的确，国王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

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在内的自由派联盟，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東西。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给的。很明显，事情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会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

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宗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给予了新的推动。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起了这种作用。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做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新闻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单独的共和党。人们不是立宪君主派，就是或多或少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一定会引起一次大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个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级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者群众，他们虽然暂时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

但已在低声地说一些关于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话；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者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次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谈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工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在舆论方面，他们开始受到其他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实践方面，他们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比较有名的有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起义。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外因，德国也已经具备了革命的内在条件。

04-《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三“德国其他各邦”

众所周知,德国在 19 世纪上半叶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本篇介绍除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外的其他各德国小邦。

恩格斯首先说明,这些小邦都不存在宪政:

【在前一篇中,我们几乎仅仅谈到 1840 年至 1848 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那个邦,即普鲁士。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其他各邦。

自从 1830 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制定的宪法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又是为了给制定宪法的君主们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议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 1830 年和 1831 年的动荡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幸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克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上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谄媚的、谦卑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各小邦的资产阶级都追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它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单独召开会议地点而被称做哥达派的立宪派核心分子，早在1848年以前就讨论过一个计划，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打算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联邦议会的、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并且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立宪君主制，实行新闻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奥地利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点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恩格斯说明这些小邦中的其他各阶级都缺乏独立性：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跟着它们的普鲁士弟兄跑。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常常借以自夸的那些政治上的虚假特权。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表明他们是与上层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的一个独立的党派。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发展得极为缓慢。】

然后，恩格斯介绍了各个小邦的宗教反对派：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无论在普鲁士或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反对派，即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允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

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所以，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个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这两者，都被视为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邦，这两个教派的或其中一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位论派，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及其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之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这种缺乏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其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另一种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相互之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实现德国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

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想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动荡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的确，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羡慕瑞士的制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实行那种制度的经验，后来这种经验才使他们十分滑稽地醒悟过来），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因此，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各小邦的资产阶级愿意追随普鲁士资产阶级建立一个立宪的联邦国家，那么，宗教反对派则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德国统一的愿望。

最后，恩格斯对普鲁士和各小邦到 1847 年底的情况作了总结：

【我们可以对 1847 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生产能力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土地贵族已变成了纯粹市场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他们同资产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小资产阶级很不满意，埋怨捐税，埋怨对他们的业务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应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受它的影响；除了这一切，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赤

字。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05-《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四“奥地利”

在开头，恩格斯说明，本篇将介绍奥地利在革命前的情况：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或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恩格斯把奥地利比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说人们对它不了解。作为德国的两个大邦之一，研究德国革命当然绕不过奥地利。但恩格斯也说明，这里讲的是作为德国一部分的奥地利，而不是整个奥地利帝国。

下面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奥地利的阶级状况，第二部分是奥地利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先看奥地利的阶级状况：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向来是一切专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证券交易的大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

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唆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国家的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专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入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提供新的资本,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王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被踩在他的脚下,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政府的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不能期待这一部分人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态度。这样,梅特涅便有把

握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被组织得最适合于为专制制度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效劳的，他们的子孙也将如此。他们不属于在双头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予以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采取十足的旧式政治家的态度，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通过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缓慢。多瑙河流域的贸易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奥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但向他们提供这种优惠，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不过，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公会（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

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消了。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做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当前的和以前其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所有这些创造人为的安定的努力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种种专门知识领域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100年以来其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

倒缩减了。在奥地利各邦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关税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外国的任何书籍或报纸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决不会让它们进入奥地利。

在1815年后的将近30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社会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让上层阶级充当政府进行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从而把憎恶引向它们），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采取了让帝国内各民族间、统治阶级的两个集团即封建地主和从事证券业的大资本家相互制衡的政策。他还牢牢地拉住军队和官僚机构，由此保证了政权的稳固。至于作为人民的其他阶级，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等各阶层，则被纯粹当作盘剥和统治的对象。梅特涅政府不仅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坚持专制统治，而且试图控制舆论和思想，为此就必须把奥地利封闭起来。其结果，是奥地利人民闭目

塞听，矛头被引向下级官吏，而中央政府则免于被指责，皇帝甚至受到崇拜。

恩格斯接着研究了奥地利正在发生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着，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机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奥地利，也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业务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资产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危险的部分，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维也纳的大门口。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当时反政府还不可能，而是一种不满情绪，产生一种实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受过较

多教育的官员本身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他们宁愿要这位皇帝的进步和开明的专制，而不愿要梅特涅的“严父般的”专制。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支持资产阶级，至于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对政府）不满的下层阶级，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支持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 1843 年或 1844 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适应这种变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站住了脚，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商的这桩生意“十分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治秘密；奥地利人本身通过波希米亚边境上进行的大批的走私而获得了这些出版物，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当然，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设计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对奥地利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善良的奥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可能

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形成，并且至少使奥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息。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或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是由它自己出资（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的。至于大银行家和公债持有人，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日益加强的反对派，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定无疑地走向伟大的变革，而这时法国突然爆发了事变，它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

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断语。】

在这里，恩格斯同样运用了唯物史观对奥地利的变化进行分析。首先是生产方式即人们谋生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变革，其次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变革而导致的相应的思想变革，再次是对外交往的影响。最后，恩格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

06-《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五“维也纳起义”

在研究了德国各邦的基本情况之后，恩格斯开始介绍德国革命。现在涉及的是3月13日的维也纳起义。

首先，恩格斯介绍了维也纳起义的背景：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迫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18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发了激烈程度不同但成果相同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他们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察这许多次起义的细节；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上一篇讲到内外因的综合作用。这里谈到，德国各邦的革命都是由法国革命作为导火索的。恩格斯表明，他并不打算研究所有问题，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是“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其次，恩格斯分析了维也纳起义中各阶级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资产阶级、全体工人，一致立即起来反对大家

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支持它的极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刚刚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已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关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那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衷心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可能产生任何分歧。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审判、新闻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他们至少在 1848 年 3 月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而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

族在这种剧烈的动荡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在上一篇中恩格斯介绍了梅特涅首相对所有阶层都进行压迫的政策，正是这一点使得各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一致起来反对政府。但各个阶层的利益不同，决定了他们注定会走向分化。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革命以后各个阶层的态度：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一旦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付诸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一个时期的话，就一定会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战斗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约4000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成为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分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鼓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决议强加于安全

委员会。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国家不得不花钱雇用他们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该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进行的鼓动和骚动，当然不是如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任”的办法。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分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关系，而这种冷淡关系之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关系，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不安分的活动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不断地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新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以及工人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由于意大利的战争，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确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种种措施，

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还能够恢复别的什么东西，它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还因为不管业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别的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由于维也纳起义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先分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特别是他们与工人和大学学生的分歧所造成的“冷淡关系”。然后，恩格斯分析了革命的敌人——贵族和金融巨头，以及革命的同盟军——农民的不同态度。

07-《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六“柏林起义”

在本篇中，恩格斯分析了1848年3月18日的柏林起义。

首先，恩格斯拿柏林起义与维也纳起义作了对比：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根据前面几篇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一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

必须抓住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组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经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深受资产阶级的欢迎，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奥地利由于首相梅特涅与所有阶级和阶层的对立，虽然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和阶层存在分歧，但起义开始时还能够一起行动。而普鲁士资产阶级由于一开始就对工人阶级抱有提防心理，因此注定了其不彻底性。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内阁的反动性：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告知：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换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极度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

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内阁连微不足道的改革都无法推行。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议会的活动，特别议会中的民主党的活动：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 2500 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 3 月 18 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

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

议会本身存在先天的缺陷，而其内部的反对党——民主党，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然后，恩格斯介绍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36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因此，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根本不同于小资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同于所谓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出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任何以小资产者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

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工人阶级认识到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最后，恩格斯介绍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同盟军——农民的背叛：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般来说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

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先是利用了农民，一当它取得政权，立刻像抛掉抹布一样抛弃了农民。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过于愚蠢，竟然意识不到对同盟军的背叛必然带来削弱自身势力的后果。

08-《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在前面分别介绍奥地利维也纳革命和普鲁士柏林革命之后，恩格斯又把视野放到整个德国范围，研究代表全德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首先，恩格斯对德国两个大邦即奥地利革命和普鲁士革命的情况作了概括：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走马上任，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

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恩格斯指出，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两个大邦中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彻底的。它有两个前提：要么彻底化，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权；要么倒退回封建制度。

其次，恩格斯分析了作为全德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德国国民议会：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个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事变的发展，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然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精华，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

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一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学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从未采取任何

步骤去摧毁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

恩格斯指出，德国国民议会作为全德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机构，本有可能作为“中央政权”的新的机构，结束封建割据状态，但这个国民议会却把自己从属于原来的旧的联邦议会，完全不知道采取措施建立新的行政和军事机构，因此无力把革命推向深入。它只能在想象中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实际上连一张挪动一条凳子都不可能。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由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所导致的德国革命倒退的必然性：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做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这些阴

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一章，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

恩格斯指出，作为全德国民议会，法兰克福议会连各个邦的资产阶级已经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可能做到：各邦的议会至少还做了一些事情表明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只

能通过一些“假想的决议”，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名存实亡。

最后，恩格斯介绍了德国人民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失望：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消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这一可耻行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资产阶级的这种做法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因此德国将会出现二次革命。在介绍二次革命前，恩格斯先介绍了与德国本民族相关的德国境内其他各部分，特别是各被压迫民族。下一次我们就来看这些民族的情况。

09-《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恩格斯先说明为什么在分析德国的二次革命前先插入对其他各民族的介绍：

【从以上几篇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除非 1848 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试图略加阐述的历史问题，性质非常复杂，因此，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恩格斯的理由是：研究德国二次革命需要考虑它所涉及的国际关系。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波兰人与德意志人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 1000 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 10 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卢萨蒂亚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

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武装骑士团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实行的一个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德国，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结果，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与其说属于斯拉夫人，不如说属于德意志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现在，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厂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在边境各斯

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事实表明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审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仅跟随在由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缓慢的但是肯定无疑的非民族化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以后，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由于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 70 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 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在 1772 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疆界以内的国家。的确，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既然德意志人当时曾经那样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体现他们同情心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应不应该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块大块的土地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一个从未证明自己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

民族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如果在东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就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当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党却很清楚地预见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即波兰革命鼓动的中心，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经政府批准而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击溃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复活了。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份无法估量的巨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辛辛苦苦促成的运动。

“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

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 1848 年和 1849 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恩格斯对民族关系的分析，也仍然基于唯物史观：波兰人和德意志人的谋生方式不同，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杂居的地区，波兰人主要从事农业，而德意志人则主要从事个体工商业，德国犹太人则主要从事借贷、酒店、小贩等行业。“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因此，所谓高等职业几乎完全集中在德意志人手中。这意味着原来被占领的波兰人领土已经日益日耳曼化。但 1848 年革命激励了波兰人，使他们重新兴起民族独立的愿望。恩格斯分析了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利弊，以及德国资产阶级背信弃义的经过。德国的镇压靠的是反动军队，而这支军队的壮大则为资产阶级本身的被压迫奠定了基础，因此资产阶级是“恶有恶报”。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关系：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 200 万德意志人和 300 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 15 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

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现在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 400 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 1848 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意志的语言。】

恩格斯指出，如同波兰人和德意志人的职业分野一样，在波希米亚，“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甚至连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也是德意志人。由此可以理解，捷克人试图利用 1848 年革命的机会借以独立的努力也必然归于失败。即使捷克保留了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也无济于事。

10-《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九“泛斯拉夫主

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在本篇中，恩格斯介绍了在德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存在的民族对立。他认为这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导致的。

恩格斯首先分析了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国利益的一致性：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 2200 万，俄罗斯人有 4500 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 800 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 8000 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 Niemetz 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学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事实；这

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斯拉夫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只要被每个俄国农民视为其宗教和国家的真正首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都城，这个帝国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过去 150 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在中欧，人所共知，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有的是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然而必须对波兰人加以赞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泛斯拉夫主义者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因此其主张是反历史的（反动的），但这种主张却容易被俄国专制主义所利用。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两次失败：

【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会遭到惨败。几种斯拉夫语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各不相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发言人都无法讲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于是，这些可怜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他们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后不得不用与会者都听得懂的唯一语言，即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利西亚人的轻骑兵、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波希米亚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 24 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霸权的这些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这个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发动了有计划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明确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下贱地同驱散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应。斯拉夫代表在 1848 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

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他们如果再有所动作，就将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这两次斗争，一次是民间的，一次是官方的，都由于其反历史的特征而遭到了失败。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群众超越民族狭隘性和官方的狭隘性的例子：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问题还有任何疑问，那也一定会引起另一场争端。但是，幸亏没有任何口实，而且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1848年的头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军队，这证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生了与丹麦的战争。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也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两地的居民

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正义在他们方面。三月革命使他們与丹麦人发生公开冲突，德国援助了他们。可是，虽然在波兰、意大利、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战争中，却让部队采取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前进和后撤行动，甚至屈从外国的外交干涉，在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之后，导致了十分悲惨的结局。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由德意志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恩格斯指出，匈牙利和德国边境没有陷入狭隘民族主义，但意大利革命曾经暂时使人们陷入思想混乱。而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同丹麦的战争中，德国政府一开始曾站在正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边，后来却抛弃了他们。可见统治者考虑的只是利益。

最后，恩格斯分析了各民族人民团结的意义，揭露了统治者试图挑起民族仇恨的阴谋：

【虽然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扬扬得意。它们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现在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

在布拉格都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引导到石勒苏益格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真正的作战工具，却得到机会以战胜外国人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做反对较先进的党派的作战工具的军队，刚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翻脸反对自由派，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彼岸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大臣们”的第一批命令时，“这些大臣是些什么人？他大喊道：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注意他。】

本篇主要阐明各族人民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面向未来的联合的重要性。这是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策略的发展。

11-《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巴黎起义。法

兰克福议会”

在介绍完德国的民族关系之后，恩格斯回到对德国革命的介绍，说明它是由外部原因特别是巴黎六月革命引起的。他首先说明了巴黎六月革命前的欧洲革命形势：

【早在 1848 年 4 月初，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洪流已经被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社会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挡住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者。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党派，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 月 10 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两次类似的运动（4 月 16 日和 5 月 15 日）也同样被击败了。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 5 月 15 日一举恢复了政权。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在维也纳，多事的 5 月 15 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

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党派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恩格斯指出，由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导致它们同革命的敌人妥协，这迫使无产阶级起来反抗，但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和领导者缺乏勇气，无论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是法国的无产阶级斗争，都遭到了失败。随后，意大利、德国、匈牙利、波兰等都面临了复辟局面。这说明了反动阶级的国际性和无产阶级的国际性。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

【决定性的战斗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当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推动周围各国发生强烈震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当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为一方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阶级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当战斗以现代内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几天，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被屠戮、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压制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利用外地任何一个小镇发生的任何细小事件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且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斗争了。】

起义失败的后果是反革命者恢复了自信，而无产阶级的强大被证明是一种错觉。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所说的“公平正义”，因为只有这种“公平正义”的结果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它才得到承认，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公平正义必定会被撕碎。有的只是打着“公平正义”之名的赤裸裸的暴力。因此，对“公平正义”的幻想只会让英国宪章运动的领导者、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失去仅有的胜利机会。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巴黎六月革命失败对德国的影响：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党便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并制定明确的计划，甚至抛弃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使德国恢复到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

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 1848 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又使这些理智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扬扬得意，羡慕法国士兵刚刚获得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德国各党派夏季所从事的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多半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和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现在力求同反动派结盟，明天又向比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界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受人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使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众同军队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初战斗发生在

法兰克福。虽然这次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相对于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虚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这个协定不但把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横加报复，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在丹麦战争中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停战协定。在这次表决之后发生了虚假的内阁危机。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停战协定。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们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类似的但声势不大的运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党派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现在也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破产了。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表现。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大臣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

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产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写一篇通讯来加以阐述。】

全世界反动派是一家人。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不仅使法国的反革命者恢复了信心，而且鼓励了德国的复辟活动。他们连由于人民的逼迫而被迫给予资产阶级的权利也要收回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面的篇章中已经指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报应。而资产阶级连自身利益都不敢维护，这种怯懦终于让人民看清了资产阶级的面目。维也纳十月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下一次我们来看恩格斯对维也纳十月起义的介绍。

12-《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一“维也纳起义”

从本篇到下篇，恩格斯用两篇的篇幅介绍了维也纳起义及其失败。现在谈的主要是维也纳起义的缘起和它发生的过程。下一篇介绍的则是维也纳起义者遭到的攻击和背叛。

恩格斯开头谈了本篇和下篇的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即 1848 年 10 月的维也纳起义，它是巴黎六月起义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

恩格斯说明了维也纳起义的地位（巴黎六月起义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以及后果（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

首先，恩格斯对前面各篇做了回顾，在这一基础上介绍了维也纳起义的缘起：

【我们已经看到，3 月 13 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状况如何。我们也已经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交错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阻碍。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奥地利这次最后且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上层贵族和做证券交易的资产阶级是梅特涅政府的非官方的主要支柱，他们在三月事变后仍然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

度上利用了 in 资产阶级当中迅速蔓延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新闻出版法、不伦不类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一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授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制定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拥有代表的反动党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胜利成果发动新的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与此同时，皇帝和他的宫廷却于5月16日离开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在这里，他们被狂热的蒂罗尔人所包围，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自己国家的危险，所以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他们可以依靠驻

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军队的支持，因斯布鲁克就在该军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里，反动党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自己已被击溃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阴谋之网，再次撒向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开始同斯拉夫族领袖们策划阴谋；这样一来，由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势力便形成了，而维也纳的无能的大臣们却只能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即将成立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败坏自己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党派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组织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如果资产阶级能够团结人民群众，他们本来是有可能获得革命的全部成果的，但由于他们害怕群众甚于害怕统治者，因此宁愿与统治者妥协，镇压人民群众。而统治者则在逃离革命中心以后迅速集结自己的力量。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的镇压：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宫廷党在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而且面临着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对手了，于是就越来越陷入厌倦和冷漠，总是呼吁遵守秩序和保持镇静；这个阶级在剧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

业混乱之后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只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爆发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政府组织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 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做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欢迎；宫廷还都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服劳役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 月 19 日，皇帝被安排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扬扬得意。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诡计得逞了。工人阶级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大臣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在 8 月 23 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实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变成了流血的搏斗，而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资产阶级不明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它必须把无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军，因此不理解革命力量团结的重要性和它的实力所在。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维也纳起义爆发的过程：

【匈牙利的事态很快就给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做该国的军政首脑；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领袖，他实际上与匈牙利合法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阻止部队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部队发生了短时间的冲突；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图尔韦森堡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总督，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的奥地利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尔米茨。】

反动统治者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则得意洋洋。他们过于低估了人民的决心。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意图之后，人民被迫起义反抗统治者。起义胜利后，统治者再次逃离维也纳。

最后，恩格斯介绍了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

【宫廷在奥尔米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奥尔米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所包围。在他们看来，这次战役应当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一团一团的军队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部队和原来的首都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结了6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大胆发动决定性攻击的位置了。

这时，维也纳一片混乱与无措。资产阶级刚刚获得胜利，就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生意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获得武

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君主专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公众思想混乱，各领导机构也是一片混乱。议会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自己在奥尔米茨的朋友做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没完没了地开会。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全部时间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和小生意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它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路线。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刚刚解脱旧制度的精神枷锁，刚刚觉醒，尚未认识到而只是本能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路线。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经过整编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士气大振，其人数共有六七万，装备精良、组织良好，尽管指挥不力，但至少总还有指挥官。在城内，人心惶惶，阶级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

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飞语；他们决心战斗，但是至少开始是没有武装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装备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屋顶的时候，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领导委员会既无魄力，又无能力。一切情形都与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一片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那么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虽然由于人民群众的决心，起义暂时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在这之前资产阶级未能抓住时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统治者的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逃离了维也纳的反动势力在进一步集结力量，而维也纳城内却由于缺乏组织和领导而陷入一团混乱中。这种对比预示着起义最终必然失败的结局。

1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二“对维也纳的 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上一篇对维也纳起义的双方势力对比作了分析。如题所示，本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维也纳的敌人对维也纳的攻击，第二部分是维也纳的朋友对维也纳的背叛。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这种攻击和背叛决定了维也纳起义的必然结局。

首先来看恩格斯对敌人的攻击的介绍：

【当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最终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是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军纪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订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做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战斗到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

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敌人的攻击之所以奏效，不仅是由于力量对比不利，更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自私和无能，以至于不能把仅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再英勇，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维也纳的两个同盟者的背叛。首先是匈牙利的背叛：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全新的转变，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个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获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

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后备军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 40 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 1200 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特发动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

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经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找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

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交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而当1848年10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

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作为德国人，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烜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换，是他们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

正如维也纳资产阶级的“尊重财产”一样，匈牙利政府坚持“合法性”。于是，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和法律，人民群众就只能做他们的炮灰。恩格斯对匈牙利的种种借口进行了分析，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然后，恩格斯介绍了德国对维也纳人民的背叛：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

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维也纳人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自己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得越少，说得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最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

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具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珂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

颇。福禄培尔却相反，他认为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定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

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德国本应支援维也纳起义。但是由于德国人民与统治者处于对抗状态，唯一能够支援维也纳革命的是德国的官方政权，包括法兰克福议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政权。但它们都只是分别派了两个专员到维也纳去。这完全无济于事。虽然议会派出的两个专员中有一个（勃鲁姆）在革命中成长为英雄，但对他的牺牲，卑劣的议会却连个屁都不敢放。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愤怒。

14-《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三“普鲁士制宪

议会。国民议会”

从题目可以看出，本篇分为两部分，即：第一部分，普鲁士制宪议会；第二部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关于普鲁士制宪议会的第一部分，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点，制宪议会被解散：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说明这一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势力。

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很快就传开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构成的多数，由于害怕居民中较积极的分子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早已威信扫地。他们承认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起草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细微差别、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制宪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另外，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差不多总是由动摇的“中间派”来决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摇摆，

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推翻了奥尔斯瓦尔德和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村居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这一变通原则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纠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大臣们都撤了职，用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实干家”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可以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约4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他们想把这种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的光荣模仿。柏林宣布了戒严，

但仍然平静无事；国民自卫军被政府解散，它规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议会已被解散时，议会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随后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经死去的议会了。】

在回顾了以前的篇目中已经说过的这个制宪议会的无能之后，恩格斯指出，在维也纳陷落之后，国王试图改变内阁，这使糊里糊涂的议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大难临头，于是通过了一个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而对于国王的反扑，议会关于“消极合法抵抗”的丑剧决定了它必然被解散的命运。

第二点，恩格斯的评价：

【在 1848 年 11 月初进行武装抵抗是否已经太迟，或者一部分军队如果遇到严重反抗是否会转到议会方面来，从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 年 11 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

命运动的议会，不但没有勇敢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4万人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完全出乎他和他的军官们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议会和人民如果进行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采取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最后一句是点题式的总结，可说是非常严厉：没有尽力反抗就丢掉阵地的，只能被视为叛徒。

第三点，解散制宪议会所伴随的后果：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些条款中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一些条款中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批准和修订宪法。】

国王不是根据资产阶级或人民的要求，而是自行确定了新的宪法。不仅如此，国王还试图自己确立两个议院，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做出批准和修订。

在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第二部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又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专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和他们的前任在奥尔米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些专员在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证实柏林居民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

政府的一个专员巴塞爾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类人物就被称为“巴塞爾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便真的站起来赌咒发誓，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个机构完全不能履行其职责，甚至不明白自己的职责究竟是什么。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一群轻信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做议会傀儡，登场演戏，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做法需要保持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现在，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如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一样，全德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只是装模作样地对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而没有采取任何有

意义的行动。恩格斯指出，实际上，人民早就对这个议会失去了希望，因此当维也纳和柏林两个首都的事件发生后，本来也没有对法兰克福议会抱有什么希望。

15-《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四“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本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奥地利和柏林恢复旧秩序，第二部分是代表整个德国的法兰克福议会的活动。

第一部分在回顾以前各篇的基础上，先重点讲奥地利的情况，然后简单介绍普鲁士的情况，最后作个小结。

首先，关于奥地利的情况：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 1849 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一年 10 月和 11 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议会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 3 月 4 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

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灭，因此它们在近 1000 年以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它们的征服者，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现在西属或法属克里奥尔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国人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 1848 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 800 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 1000 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向他们表明，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的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人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

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病弱者称心而倒退 1000 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很久以来为了满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拥护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无知，但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 1848 年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那么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旺代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皇帝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在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专制制度。】

恩格斯先介绍了奥地利解散其议会的过程，然后说明它对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的影响。最后说明奥地利皇帝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是如何无疾而终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对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一种是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一致起来的民族主义即民族平等主义。后一种民族主义认识到各民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因此它反对的是民族压迫，争取的是民族平等；前一种民族主义则承认民族压迫，只是反对其他民族对本民族的压迫，要求把本民族变为统治民族而已。《共产党宣言》曾经提出，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必须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意义上它暂时还是民族的阶级。但在这样做时，无产阶级还需要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坚持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可以认为，民族主义是针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无产者的，全世界无产者是一家。而在列宁以后的时代，可以认为，民族主义是针对本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是针对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全世界劳动人民是一家。

其次，关于普鲁士的情况：

【在普鲁士，各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法。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普鲁士按照国王意愿成立的议院不完全符合国王的心意，因此也被解散了。恩格斯就此总结道：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第二部分，恩格斯介绍了除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大邦之外的其他各个小邦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

恩格斯首先说明为什么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大邦的革命被镇压之后，为什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还能够存在：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各小邦里斗争尚未见分晓，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

福的人民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产生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 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各大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在立宪君主派看到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時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可见，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之所以还能够存在，恰恰是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大邦革命失败后，尽管法兰克福议会极其无能，但这个议会是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所仅存的希望了。另一方面，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普鲁士还希望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沽名钓誉”是怎么回事。

其次，恩格斯说明了法兰克福议会是如何辜负资产阶级的希望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在维也纳被当做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各大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这些抗议书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行政权，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且不管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这件事情。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们既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投入人民的营垒，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这是一伙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当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在不断重复的誓言中寻求慰藉和支持，说什么他们是国家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能够拯救德国。一年的议会生活已使他们变成了道地的白痴，难道在这伙可怜虫中间能找到

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这个议会的无能和自负是成正比的。

最后，恩格斯说明了法兰克福议会是如何帮助普鲁士达成沽名钓誉的心愿的：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制度和军事编制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它虚张声势地应战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这个自以为是宝贝的代议机关，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斥之为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要撤换而没有撤换掉的那些大臣，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的内容。】

在以前的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德意志一个大邦的德意志民族，另一个部分是其他各民族。另外这一部分是不属于德国的。奥地利政府宣布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等于宣告自己从传

统的德意志帝国独立出去，与斯拉夫诸民族形成一个另外一个帝国，这就否定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作为全德议会的地位。于是，在这个无能的议会看来，它就只能求助于普鲁士了。而普鲁士本来正是它的另一个敌人！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恩格斯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称为“悲喜剧”。

16-《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五“普鲁士的胜利”

恩格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革命前的德国，包括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其他小邦；与此对应，在第二部分介绍了第一次德国革命即维也纳起义、柏林起义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第三部分则重复前面两部分的思路，先介绍了第二次革命前的德国状况，特别是奥地利帝国内的民族状况，然后再介绍了第二次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和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丑态。从本篇起进入第四部分，恩格斯把它称为“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

【我们现在来谈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首先，恩格斯介绍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试图建立行政权的难题：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工作情况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践踏它，普鲁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无聊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即将

成为泡影。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行政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行政委员会吗？不行，明智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会使德国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一个“总统”吗？那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尊严。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做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施莱茨—格赖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君主这些二流人物；无论奥地利或普鲁士都不能容忍那样做。只有奥地利或普鲁士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怎样二者择一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现在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出结论。】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名义上全德国的立法机关，它于1848年6月28日通过决议，成立由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但正如这个议会遭到无视一样，这个临时中央政府也不断受到愚弄。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均镇压革命之后，这个议会终于意识到，德国统一之梦将可能遭到破坏，于是它试图通过宪法，并据此建立正式的行政机构。但它害怕人民，不愿意德国成为共和国，但要成为君主国，就必须确立哪个邦的诸侯来做皇帝。小邦诸侯不行，而大邦诸侯有奥地利

和普鲁士两个，他们没有能力决定由谁来做。对议会来说幸运的是，奥地利把自己排除了。

其次，恩格斯介绍了奥地利拒绝法兰克福议会关于德国统一的设想的原因：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会把德国其余部分拉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获得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之后，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丝毫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也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永远也别想拿回它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复活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即被 1815 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 1849 年 3 月 4 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毫不相干。】

在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即由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王共同的祖先建立的帝国传统上由德意志的选帝侯担任名义上的皇帝，但这个帝国 1815 年为拿破仑帝国所灭。现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德国统一设想等于恢复原来的德意志，但奥地利已经把一些非德意志（主要是斯拉夫民

族)的领土和人口,它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认为凭自己的实力,以后可以把德意志其余部分吸引过来。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得不推举普鲁士国王担任缩小了的德意志帝国皇帝的过程: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奥地利摒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式的国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身上。应该提到,这是6—8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更新,这些人把这种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把自己旧日的奇怪念头重新提出来,作为拯救祖国的最后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他们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议会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较进步的派别让步。事实上,很明显,原来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议会已把奥地利摒除于德国之外,但奥地利代表仍被邀请参加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代表的暧昧立场,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

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时又追随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事情。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英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受奥地利专制制度唆使并为它效劳的一些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地说是恶意）而取得的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说来十分暗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他们的毫无价值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开始立法生涯时起，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满怀一种庄严的信念：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有幸以他们为议员的这个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铁道建设、所有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

的事情——同与目前正受到他们可敬的议院关注的那个重要问题紧密联系的那些重大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由于成功地往“帝国宪法”里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便认为自己首先有义务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们抛弃并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部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任何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质，恰好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就他们所能够写出的而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来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德国民主派的这些英雄们的行动足以说明他们自己。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的确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248票弃权和大约29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290票当选为除奥地利之外的德国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的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上

演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剧，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只要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这一大段很容易懂：众所周知，西罗马帝国是被日耳曼部落征服以后灭亡的，其后，罗马帝国就只剩下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而日耳曼部落的首领查理曼（一译“莎乐美”）大帝所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仅限于原来的西罗马帝国，而且很快由他的三个孙子三分帝国为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三个王国。恩格斯所说的类似东罗马帝国的“小德意志”，是说去掉了奥地利部分的德意志，就像去掉了西罗马帝国的东罗马帝国一样。

至于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一事与 1848 年 3 月普鲁士国王自诩德国统一的代表者的联系，在恩格斯看来不过是一场滑稽剧的弄巧成真而已。

17-《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六“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本篇题目为“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讲的是两者的冲突。

恩格斯首先讲了两者冲突的缘起：普鲁士国王带头拒绝联邦宪法。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他在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部宪法提出建议。

这项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居然想不到普鲁士国王会因为不接受资产阶级宪法而拒绝皇冠，可见他们多么愚蠢。面对普鲁士国王把冲突推给法兰克福议会和各邦政府，法兰克福议会居然没有考虑后果，在作出决议必须遵守宪法之后，就以为完成了任务，不是全力从事维护宪法的工作，而是让少数人——他们选出的三十人委员会负责这件事情。

其次，恩格斯讲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维护宪法的行动：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行动，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好自为之，这就是他们立即作出的并坚决执行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各小邦，资产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好像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立刻得到解决。因此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敦促它尽

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在 1848 年春夏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被表决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于高潮。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民主主义的了。进行比较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不愿在道义上自杀，就不能勾销已经通过的这些条款，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去仿造一部帝国宪法。此外，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那是很自然的。这一阶级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来比拥护立宪君主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更先进；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但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它却觉得再舒服不过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无论如何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是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来亮相，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完蛋。

得到这两派——拥护立宪君主制的资产者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者——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符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尽管宪法并不激进，但是相对于反对统治者来说，它已经算是自由主义的了，因而得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拥护。问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知道如何使宪法落到实处。

再次，恩格斯讲了各邦政府反对宪法的行动：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应由它们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

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那些聪明人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会议，即死灰复燃的旧联邦议会，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伊茨纳赫，并且号召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只要各小邦的议院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就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这个榜样做了。】

先是普鲁士带头反对宪法，然后是普鲁士带头恢复旧联邦议会，并且试图对法兰克福议会进行武装镇压。其他各小邦纷纷效仿。

最后，恩格斯介绍了双方的冲突：

【显然，斗争的结局要靠武力来决定，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德国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隆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在普法尔茨、在贝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举行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已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辉煌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力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

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这种怯懦的低能儿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却大有人在。】

敌人已经准备好了武装镇压，人民群众准备好了武力反抗，而议会却毫无心理准备。

18-《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七“起义”

本篇“起义”是上一篇所讲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冲突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首先介绍了新多数派及其面临的形势：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 1849 年 5 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他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这个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

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的领导下，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项事业。虽然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保卫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

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的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地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新多数派之所以成为多数派，是由于保守分子陆续做了逃兵。因此，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以救世主自居。他们的自我感觉与他们的实际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去考虑如何改变力量对比，而是急于自我表现，急于向反动政府宣战。各邦政府的应战成了火星，落在了充满怒火的人民群众这堆干柴（恩格斯称为“地雷”）上。

其次，恩格斯分析了起义的艺术：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

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这一段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政治学的经典段落。很难讲得比恩格斯更精彩，但概括一下，可以分为三点：一是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万万不可在准备不充分时轻易发动起义。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要始终抓住主动权。第三，既要心细，又要勇敢，胆大心细是取胜之本。

再次，恩格斯拿法兰克福议会的做法与以上原则做了对比：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地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由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任凭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表示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他对此要求始终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

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恩格斯根据前述原则先讲了议会应该怎么办，然后分析了议会的实际做法。他们实际做的与应该做的正好相反，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9-《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八“小资产阶级”

在本篇中，恩格斯试图通过对德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研究起义失败的原因。

恩格斯首先介绍了五月起义的地区分布：

【在我们的前一篇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月初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累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以下讲的起义地区都指这四个。

其次，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在起义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主力，即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一部分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在冲突真正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中的大多数青年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军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尤其是喜欢自称为“知识界的代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由于获得军官头衔而被留住，他们便首先抛弃自己的旗帜，可是，他们担任军官根本就不够格。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它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它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事件的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资产阶级在 1848 年所干的那样）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事态发展成为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

可见，工人阶级正是按照《共产党宣言》中的策略行动的。这从工人领袖威廉·沃尔弗的行动中可以看出。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农村居民的动摇性：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部分地是由于捐税过重，部分地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

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农业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农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农村中的农业工人通常支持城市工人，小农则倾向于小资产阶级携手，而 1849 年 5 月起义的领导者正是小资产阶级，因此，本篇剩下的篇幅主要介绍小资产阶级的作用。

再次，关于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恩格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决定了它的自相矛盾的阶级本性；二是这种本性在四个地区的表现；三是这种本性导致的在军事方面的无能。

先看其阶级地位与阶级本性：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认为这个阶级是 1849 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没有一个德国大城市是运动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能走多远，这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德国小资产阶级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能耐也没有。

小资产阶级擅长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旦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使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号召武装起来的高调，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被迫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风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他们不是深信自己会立即被赶下台，并且眼看着他们的全部政策被作为他们的战斗部队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根本改变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恩格斯指出，小资产阶级由于小本经营，一切都透着“小”字，唯有牛皮越吹越大。这个阶级瞻前顾后，没有远见，做事毫无策略，只会放嘴炮。

于是，恩格斯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在各个起义地区的表现：

【在德累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市德累斯顿的小资产阶级、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者又几乎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牢里。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了。

在莱茵普鲁士，实际的战斗规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一旦调集了足够数量的部队，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一个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士兵、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为组织德国南部的运动赢得了时间。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支持起义，等到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

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统治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阉割和摧毁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让布伦坦诺之流的少数狡猾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是在“拯救祖国”。】

可以看出，参加起义的各阶级的表现与他们的阶级地位恰恰是相应的。但其领导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则决定了起义必然走向失败。

最后，恩格斯指出，除了阶级力量对比之外，一个长远看来是次要、而在当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战争艺术的缺乏，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重大原因：

【至于军事方面，从没有见到过比原正规军尉官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指挥的军事行动更草率、更蠢笨的了。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庞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却面对着四倍于己的敌人。所以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在瓦格霍伊瑟尔进行战斗。这一仗虽未打胜但打得很英勇，接着实行了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他便辞职了。像在任何起义战争中一样，部队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许多英雄事迹，但同时也有许多次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人们承认四倍的优势兵力还不足以把它击溃，10万正规军在对付2万起义者的战役中，在军事上对后者如此高度重视，就好像要同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作战一般。

起义在1849年5月爆发；7月中旬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恩格斯曾经专门研究过军事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可以看到，由于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起义在军事方面也乏善可陈。

20-《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九“起义的终结”

恩格斯介绍德国革命时，先讲了两个大邦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情况，然后介绍各小邦，介绍革命也是按这样的顺序，只不过对于各小邦是主要代表全德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角度来体现。本篇通过介绍法兰克福议会的命运，来介绍德国革命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如果说前一篇介绍五月起义在军事上的失败，那么本篇介绍的就是整个德国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

恩格斯首先谈了五月起义后法兰克福议会本来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于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

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否则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 800—900 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 150 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 100 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 5 月中或 5 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

随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退出，国民议会剩下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们本来应该立刻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且武装人民，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先看由小资产阶级所把握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建立政权方面的失策：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话算数，那就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

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待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在政治方面不能指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相反，当无产阶级的代表威廉·沃尔弗提出废除代表自己敌人的摄政、建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火冒三丈，向沃尔弗发起了攻击。

其次，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建立军队方面的失败：

【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大胆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腾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自己人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当法兰克福议会终于不得不废除原来的摄政，形成自己的五人小组摄政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们也认识到建立军队的重要性，然而却是要求自己的敌人给自己建立这样的军队！

再次，恩格斯介绍了议会被关闭和失去作用的过程：

【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从符腾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 1849 年 6 月 18 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

人民群众要求摄政和议会直接参加起义，指挥已有的人民武装力量，他们却拒绝了。议会宁愿迁到表面上仍然支持它的小邦政府那里，直到被小邦政府关闭。

最后，恩格斯介绍了法兰克福议会完败的结局。

【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

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察符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10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士兵，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

被关闭的议会只好逃到起义者中间，但他们所做的仍然是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假装是仍然拥有自主权的政府在那里办公，而对于最重关键、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却丝毫没有参与。随着起义被镇压，这个假装的政府就逃到国外去了。

本篇的结束部分实际上也是整个系列的结束部分，恩格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作了评价：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其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

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预备队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

按照编者的说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没有写成。1896年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都收录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它作为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实际上它并不属于这组文章。
